

底观中国

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

编 /
工潮

底观中国

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

编 /

工潮

gongchao.org

gongchao.org, 柏林, 2023

工潮 [gʊŋ'tʃau]

本书可在线上阅览:

<https://www.gongchao.org/cn/diguan-zhongguo>



本书中个人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仅为个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或代表编者或 gongchao.org 的观点和意见。

STIFTUNG 
MENSCHENWÜRDE
UND ARBEITSWELT

本出版物得到 [Stiftung Menschenwürde und Arbeitswelt](#) 基金会的支持。编辑们要感谢基金会和其他支持者。



本出版物受 Creative Commons 4.0 法规约束: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4.0 国际](#) (CC BY-NC-ND 4.0)。

目錄

前言	5
第一节 现存的矛盾	11
1 董一格	
性别意识的觉醒，照料劳动的危机，以及中国制造 女权主义	12
2 JS Tan	
科技业员工与阶级意识的高涨	32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劳工抗争 和种族歧视	47
3 Eli Friedman、Wen 和 Pan	
疫情中和疫情后的劳工抗争	48
4 Gigi Mei, Kimiko Suda, Shan Windscrip 和 JM Wong	
反抗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族歧视— 亚裔离散族群的组织 and 跨越国界的团结行动	67
第三节 中国边沿	87
5 Darren Byler	
恐怖资本主义：被囚禁在中国西北地区 的维吾尔人	88
6 丘琦欣 (Brian Hioe)	
中美角力时代的台湾左翼	104
7 Promise Li	
正视香港抗争中的右翼	117

第四节 中国在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史.....	135
8 Alfian Al-Ayubby 与 Y. Wasi Gede Puraka 印度尼西亚的中国投资与劳工抗争.....	136
9 Ralf Ruckus 通往资本主义的共产之路：以中国为例.....	152
后记：关于社会位置、代表象征和 实际的团结行动.....	171

前言

经过数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跃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至今日，中国已不止是《世界工厂》，更成为创新核心地，并将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至全球。与此同时，中共和国家领导层压迫国内劳工、女权、环境运动；以高压政策压制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抗争运动；并巩固对全国的操控和监控，防止有组织的抗争并且巩固其统治。

然而，有关中国在全球的资本主义扩张、越发频繁的社会动乱、逐渐铁腕的国家统治的主流分析和解读仍然有所欠缺，经常以《威权主义 vs. 自由主义》这种过于简单又危险的二元政治论述来解读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这种观点在新冠疫情期间越发受到注目，更是正中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全球帝国主义之争的下怀。

在各种不着边际的论述之中，很难找到关于中国草根阶级的解读。事实上，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左翼评论者和组织仍然无法《重新思考》中国和中共，并揭露其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政治手段。他们在引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中共政权的角色时，总是将之置于和美国帝国主义政权相对的位置上，往往忽略了中国政府和私有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共和政府领导层对社会动乱的打压。

在这个背景下，本书汇集了具备批判性左翼观点的行动者和学者，对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中国国内的社会冲突和动员行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书基于2020到2021年之间举行的一系列名为《中国与左翼：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China and the Left – Critical Analysis and Grassroots Activism）》的线上讲座，获得了工潮（gongchao.org）、Made in China Journal、positions politics 和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的赞助。编辑后本书收录的文章涵盖的关键议题包括，女权运动、科技业员工的组织行动、对新疆的打压、台湾的左翼、香港的右翼势力、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和劳工抗争、以及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和有争议的

改革过程的重新审视，对《重新思考》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角色很有必要。¹

该系列线上讲座的念头始于德国。在莱比锡的一群行动者为了抗议欧盟—中国峰会，而打算举行一日抗议行动。峰会原定2020年9月举行，但因新冠疫情而取消。尽管峰会取消了，行动日仍按原计划进行。遗憾的是，由于疫情，来自中国或香港的演讲者无法参加。

行动日结束之后，我们决定筹备线上讲座系列，以审视德国及其他地区中对于中国两极化的论述，并推动中国以外的草根组织和中国内部的社会抗争和行动进行直接对话，培育团结与合作。我们希望藉此削弱全球北方的政府和右翼分子为推动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而鼓吹的反华情绪。

本书的中文版共有九章，收录了线上讲座的内容和讨论。²这九章总计分成四节，第一节集中讨论了现存的矛盾，首章由董一格讲述中国的性别政治（第一章）。在过往十年间，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关于性别和女权的社会争议、草根运动和文化现象。这一波《性别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标志着中国性别政治的分水岭。自此之后，一方面，中国政府收紧了对政治行动的掌控，令行动者的境况越来越困难、甚至无路可进，难以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帜组织运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网络为主、去中心化、以及自发性的女权和性别平等行动的浮现和延续。其中一部分议题更逐渐变得《主流化》，甚至被政府和企业力量所采纳。

在第二章里，JS Tan 讨论了我们可以如何理解中国科技业员工的阶级意识觉醒，以及随之形成的关于工作生态的批判性讨论和科技业员工进行组织动员的力量。中国的科技业员工实行的所谓996的工作文化（即每周六天，朝九晚九地工作）早已成型。在2019年，科技业员工发起抗议996文化的运动，不仅让996这个词变得家喻户晓，也引发了一场蔓延全国的对中国白领工人严苛的工时的讨论。自此之后，科技业员工开始

¹ 线上座谈会系列和播客可在 <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 收听。

² 本书可在线上阅览：<https://www.gongchao.org/cn/diguan-zhongguo>。

用一系列新的词汇形容自己，例如《码农》、《社畜》、《打工人》等。这些词汇显示出科技业员工阶级意识的觉醒。此外，《内卷》、《摸鱼》等词汇捕捉了他/她们感到回报下降、深感无力的情绪。编码员曾被视为是《专业阶级》，但现在他/她们重新审视自身的位置，视自己为工人阶级。

本书第二节的两篇文章讨论了关于劳工问题和在新冠疫情之后兴起的种族主义。过去几年中国发生的一大改变，是经济空间和工业的重组。工人的谈判力量日益减弱。在第三章中，康乃尔大学的Eli Friedman和两名来自中国南方的劳工行动者讨论了劳工组织者可以如何在变幻多端的环境下继续行动、可以使用哪些组织策略、以及中国以外的行动者如何能向中国的劳工行动者表示团结。

第四章探讨了自新冠疫情以降，出现在全球的种族暴力、右翼和法西斯政治思想。Gigi Mei、Kimiko Suda、Shan Windscrip 和 JM Wong 是身处美国、澳洲、欧洲的亚裔离散学者和行动者。她们讨论了疫情如何培育了有色人种社群的组织力量，并分析如何抗衡种族主义、跨越国界共建团结。她们回顾自己参与过的本地抗争，并讨论跨国界组织的可能性。

第三节探讨了中国边沿的情况。在第五章里，Darren Byler 讲述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的情况。他并没有使用《人权》或《民族冲突》等框架来分析问题，而是探讨爆发抗争和暴力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他从其有关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所身处的环境的深入研究出发，描述中国政府如何使用高压的民族-种族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前沿上，建立《再教育劳动营》(reeducation labor regime)。他认为维吾尔族人遭物质上和科技上所遭受的禁闭，可以被认为是《原始积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过程一部分。

在第六章中，来自《破土》杂志的丘琦欣探讨了台湾的进步力量、其历史、多个思潮和倾向，以及使台湾变得进步的可能性。全球的主流媒体主要通过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这个观点忽略了台湾本身复杂的政治发展和活跃的社会运动。

在第七章里，流伞成员 Promise Li 讨论了香港在 2019 至 2020 年之间的抗争运动。这场运动一般被形容为《无意识形态》，受香港社会广泛支持。尽管香港社会极其不平等，右翼思想成为了运动的主流，左翼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则遭到边缘化。Promise Li 指出，香港本土运动中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认同显露出香港自身的殖民历史的真相，并讨论香港对民主和自决的愿景中存在的矛盾。

第四节收录了两篇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文章，以及关于历史性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承传。第八章集中讲述印尼身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点合作伙伴所扮演的角色。近年来，超过一千家中国国有和私有企业在印尼投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能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材料和产品。在这个背景下，Alfian Al-Ayubby 讨论位于苏拉威西岛的、由中国营运的采矿和钢铁产业，而 Y. Wasi Gede Puraka 观察当地工人对此的反应和斗争。他们在随后的讨论中谈到中国在印尼其他地区所做的投资，以及中国和当地资本势力之间的冲突。

在第九章里，Ralf Ruckus 深入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往往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或动乱谈起，然后讲述了 1978 年后的市场改革如何改变了国家轨道、带来了经济崛起。然而，即便 1978 年的市场改革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的裂缝，有一样东西始终不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Ralf Ruckus 介绍了其著作《通向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1949 年以来社会动荡与对动荡的回应如何推动中国的（革命）变革》（*The Communist Road to Capitalism: How Social Unrest and Containment Have Pushed China's (R)evolution since 1949*, PM Press, 2021）的主要论点。³此外，他讨论了我们能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中学到什么，以巩固左翼政治、避免过往犯过的错误。

本书收集的讲座和辩论激发了我们几位编者的思考，因此我们撰写了《后记》，反思我们对中国的运动和草根行动的支持。最主要的是，我们分享有关团结行动的想法和经验：我们

³ 中文版可在此处下载为 PDF: <https://www.gongchao.org/cn/tongxiang-zibenzhuyi-de-gongchanzhuyi-daolu>。

如何理解团结？我们参与过什么类型的实际团结行动、为何参与其中？我们从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学到了什么关于跨国界团结的知识？

最后，我们想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们，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组织线上讲座，转录翻译讲座内容都无法实现。

第一节

现存的矛盾

1

性别意识的觉醒，照料劳动的危机，以及中国制造女权主义

演讲者：董一格

主持人：Ralf Ruckus 与 Jule Pfeffer¹

Jule Pfeffer (JP):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我们将和一格一起讨论中国当前与性别相关的各种议题、草根运动、以及文化现象，我们也将讨论中国妇女的权利问题。我们想先抛出一些问题：中国面临的性别问题主要是什么？女权主义者跟普通女性们采用何种策略来应对这些问题？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代中国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张力之中：一方面，镇压和威权统治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某一些性别问题变得日益主流化，并被中国政府以及企业挪用。

我们会讨论一格与吴晓合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制造女权主义》的文章。²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当代中国有很多女性并不把自己视为女权主义者，但她们对于父权制结构跟性别歧视的政策心怀不满、希望找到应对这些困境的方法。

允许我介绍我们今天的演讲者：董一格。一格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以及全球性别研究系的助理教授。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劳动、性别关系以及抗争政治。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一格积极面向大众写文章、做讲座，普及关于劳动、性别跟中国女权主义的知识。此外，她也是《中国制造》杂志的编辑委

¹ 演讲时间：2021年2月6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on-made-in-china-feminism>。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² Wu, Angela Xiao, and Dong Yige, "What is Made-in-China Feminism(s)? Gender Discontent and Class Fric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4 (2019), 471–492; Wu, Angela Xiao, and Dong Yige, "The Making of 'Made-in-China' Feminism." *Sixth Tone*, November 1, 2019, <https://tinyurl.com/jf8vr56c>.

员会的一员。去年九月我们已经邀请一格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我很开心今天一格能再次加入我们。我期待着与你进一步讨论女权主义以及其他问题。有请一格。

董一格(董): 非常感谢你的介绍, Jule。我很高兴能回到这里, 跟你和 Ralf 一起工作总是非常愉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活动。今天的观众中有我的老朋友跟同事, 也有我不认识的新朋友。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 我会试着总结一下我想表达的几个观点, 然后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更深入地讨论这几点。

我认为在过去十年中, 跟性别以及妇女权利相关的讨论在中国愈演愈烈。不管是新闻事件、社会争议、还是耸人听闻的故事, 与性别议题相关的媒体报道与日俱增。我相信对大多数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来说, 2015 年的《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以及这个事件引发的席卷全球的声援活动, 是当代中国性别政治的分水岭时刻。³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一方面, 随着中国政府对政治运动的控制日益严格, 行动者们几乎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自己是女权主义行动者的旗号来组织关于性骚扰、家庭暴力等议题的公共运动。走上街头行动尤其变成了一个禁忌。但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去中心的女权运动正逐渐在互联网上形成。2018 年初的米兔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更宽泛地说, 我们可以注意到跟性别及妇女权利相关的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主流化。其中一些议题甚至被政府跟企业选择性地招安、挪用。为了解释这种性别问题主流化的现象, 我与吴晓发明了《中国制造女权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当代中国那些并不自居为女权主义者、但非常关心性别问题的女性们的崛起。在当代中国, 就算你不自居为女性主义者, 你也会对女权主义者们关注的很多问题产生共鸣。换句话说, 关注女性的权利跟利益并不是一小撮激进的运动者的特权。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年轻女性——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

³ Dong Yige, “Does China Have a Feminist Movement from the Left?” *Made in China Journal*, April 18, 2019, <https://tinyurl.com/mr23phe9>.

很多学者，包括中国女权主义者，已经就这个现象做了不少分析。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是：中国妇女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她们觉醒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其中一些最为勇敢的女性，甚至直接站出来对抗强大的政府。

对于这个讨论，我想从我的角度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即这些蕴含着女权意识的政治话语跟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认为目前的讨论尚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过去四十年，中国被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体制之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跟财富积累。这导致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跟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财富积累制度，容易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当然，社会再生产理论不是我发明的。它有着悠久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传统，并且最近在许多女权主义圈子中——特别是在全球北方——重获新生。我认为这套理论目前在全球各地都非常有影响力。

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依赖于对劳工的剥削，例如剥夺劳工应得的保护跟福利待遇。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跟对劳工的剥削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实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然而，中国政府并不能够在养老、医疗、育儿、住房等方面为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支持。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把农民工的社会再生产的重任留给他们的故乡来承担。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说，这样可以降低政府支付的成本。

在全国范围内，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以社会主义工作单位的形式为城市工人提供的跟社会再生产相关的服务逐渐消失。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照顾三岁以下儿童的方面的开支为零——中国是其中之一。公共资源的缺乏导致社会再生产被迫转移到了私人市场领域。此外，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导致社会再生产的成本飙升。例如，在中国农村，为了娶一位新娘，新郎家必须花费差不多四万美元来买房和买车。

在城市地区，尽管独生子女政策早在 2015 年底就被取消了，生育率却在稳步下降。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多数家庭难以负担抚养一个以上的孩子所需的费用。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在 1.3 到 1.8 之间，虽然这个数据不无争议，但它不仅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作为参考，美国的生育率为 1.7。韩国——全世界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 1.2 或 1.3。

那么，中国政府和资本如何分别应对这场危机？它们的态度非常简单、粗暴跟实用主义，即：《糟了，我们在积累到足够多的财富之前，忽然碰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突然缺乏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了。》为了解决人口危机，中国政府一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忽然开始鼓励生育、鼓吹建立育儿友好型社会。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弘扬家庭价值，强调妇女在照顾家庭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私营企业非常聪明，它们积极利用这场人口危机谋利。很多企业抓住了小家庭缺乏育儿支持以及父母们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感到焦虑的现状，发展出各种产业。例如，产后护理服务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月嫂和保姆供不应求。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这一点。⁴ 此外，学前教育和课外补习这两个市场都非常火爆。

那么，谁最受到社会再生产的危机的影响？就这点来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两个方面来说，中国的女性农民工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负面影响。首先，服务业已经超越制造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就业市场。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大的服务业市场。出外务工的农村妇女大多从事照料工作，但她们的的工作至今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规范或保护。大部分女性农民工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由孩子的祖父母照看，她们由此产生了我所谓的《对家人的愧疚如同债务一般越滚越大》的心态。⁵ 一方面，为了赚更多的钱来资助她们的家庭，她们

⁴ Dong Yige, “Spinners or Sitters? Regim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Urban Chinese Workers’ Employment Cho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61, no. 2–3 (2020), 200–216.

⁵ Dong Yige, *The Fabric of Care: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Livelihood in Industrial China* (book-in-progress).

必须独自在城市打拼。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的孩子被迫成为留守儿童，她们在情感上对孩子有很多亏欠感。与此同时，农村的妇女也好、城市的妇女也罢，都被视为照料劳动的免费提供者，不断被催促着回归家庭之中。中国政府以及媒体话语都积极鼓吹这一点。

对于负担不起昂贵的私人育儿服务的家庭来说，她们的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你的孩子越是没钱参加课外活动或补习班，她/他越不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获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观察到有很多第二代农民工要么已经放弃了学习，要么已经彻底抛弃了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希望。大家可能看过一部叫做《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它描绘了第二代农民工是如何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失去了希望，靠着临时工为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寄托在其他方面。⁶

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对于社会再产生的危机的反应。那么，中国女权主义者以及大部分普通女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为了节省时间，我暂时略过不谈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史中的不同阶段，等会儿问答环节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我想直接开始讨论我跟吴晓合写的文章《中国制造女权主义》。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篇文章，我推荐你找机会读一下。这篇文章有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及大部分女性们对自身权益的认识，跟上一代相比有巨大的差异。在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中，面对不断威逼利诱女性们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声音，当代女性们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奋起反抗。这一流派之所以被称为《田园女权主义》或《中华田园女权主义》，正是因为它不是由一小撮运动先锋所领导的，而是由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女性们自发组成的。这个流派的一大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采取加入了反婚反育的运动之中。她们积极谋求个人能力的发展，希望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她们宁愿依靠自己的——而非男性伴侣的——经济成就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我认为上述这些特点概括了中国制造女权主义的本质。

⁶ 这部纪录片的英文片名是《We Were Smart》。详见：<https://tinyurl.com/yncbw8dz>。

中国制造女权主义可以细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所谓的《不合作派》，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创业派》。从表面上看，创业派对主流的性别观念亦步亦趋。她们不仅不避讳谈论结婚，甚至热衷于讨论如何通过婚姻实现阶级流动、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但事实上，这些女性对异性恋婚姻制度的态度非常犬儒。她们选择结婚，不是因为相信浪漫爱，而是因为它们认为参与并利用婚姻制度是在目前的性别和阶级结构中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好方式。她们的目标是通过跟有钱有势的男性结婚来实现阶层飞跃。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等会儿可以在问答环节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快速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那么强调政治经济学之于中国性别问题的重要性。我这么说既有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策略性的原因。从理论角度说，我认为只有当我们重视阶级问题跟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的女性们为什么会对现状感到不满，以及为什么中国男性们会对中国女权的崛起如此反感跟排斥。从策略性角度说，围绕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性别议题进行分析，可以激发很大的政治潜能。

我刚才说过，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视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运动。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纷纷开始围绕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性别问题。我认为这个理论跟中国非常相关。中国是资本积累无法长期维系的极端例子，因为它一方面依靠社会再生产劳动而不劳而获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却不断试图破坏社会再生产劳动维系下去的根基。虽然这种矛盾并非中国独有，我认为中国代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围绕社会再生产理论去理解、组织我们的反抗，具有相当多的政治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社会再生产是一个重要的斗争场所。

在这里，我想提出几个议程。首先，家务劳动市场目前仍旧是相当不正式的、缺乏系统规范的。截至2016年，中国约有两千一百万家政工，其中90%为女性农民工。然而，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原因，她们很难拥有类似于工会的权力。然而，如果没有家政工，中产阶级家庭将无法维持日常的运作。由于她

们提供的照料工作供不应求，她们具有 Beverly Silver 以及其他学者所说的《结构性因素所赋予的议价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事家政工确实很赚钱。如果我们善用家政工所具有的这种结构性因素所赋予的议价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帮助她们建立一个有保障的、且有最低限度的监管的工作环境的。

此外，近年来法律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变化。随着米兔运动的出现，中国发生了好几起引人注目的案件，包括弦子控诉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朱军对她进行性骚扰。我认为女权主义者可以在法律领域有所作为。我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中以对话的形式谈论大家的问题。

JP：谢谢你精彩的演讲。我想率先提出一个问题。在你的讲座中，你提到了弦子对朱军的诉讼。能否请你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女性们遭受着何种基于性别的排挤、歧视跟性暴力？此外，这个法律事件对于广大普通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董：谢谢你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在讨论性别歧视时，必须考虑到它跟中国的权力等级制之间的关系。厌女症以及性别歧视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些现象与中国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朱军——中国最出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你基本上是刀枪不入的，没有人能奈你何。连弦子本人也说过：《我知道我很可能不会胜诉。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利用诉讼来向普罗大众表明我的立场。》

这不仅仅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可以说，弦子要打赢这场官司简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刘静尧告商业大亨刘强东强奸的案子。由于刘强东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静尧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顺便说一下，我在一篇关于共产党内的女性干部的文章中读到，权力越集中、越根深蒂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权力的可能性越小。⁷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状。如果你不分析宏观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问题，你是无法真正理解基于性别的排挤跟歧视问题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

⁷ Shen Lu, "Pretty Lady Cadres." *ChinaFile*, December 21, 2020, <https://tinyurl.com/vn37xrwy>.

JP: 我想顺着弦子诉朱军案再问几个问题。中国女性们是以何种方式应对这种等级制和父权制的合谋的？她们又是如何应对或反击基于性别的歧视跟暴力的？举例来说，米兔运动在中国的回响相当大，对吧？你认为这种形式的运动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有什么样的限制性？

董: 好问题。我要重申我非常敬佩她们采取的策略。对于参与米兔运动的每一个人来说，首要目标是为她们个人的案件伸张正义。其次，我认为她们选择通过法律渠道来反抗，表明她们对中国的法律系统仍然抱有信任。与此同时，我相信大家都很聪明，都知道在目前的制度之下，受害者很难把法律制度当成解决所有不公不义的终极武器。许多参与米兔运动的人深知这一点，因此她们诉讼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这些广为人知的案件来推动中国性别文化的长期改革和转型。回到弦子的案子，正如她所说的，她知道她很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但她把此案视为促进性别文化的变革的契机。我认为弦子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在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之后，中国的女权主义先锋们的总体策略从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变成了在文化领域的深耕细作。这是我迄今为止注意到的最突出的运动策略。

JP: 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了结构性因素所赋予的议价能力。有一位听众想问你：是否有可以让家政工们聚在一起、组成小规模的组织，帮助彼此寻找新雇主？

董: 出于两个原因，我觉得家政女工们想要形成这位听众所说的这种纽带是很困难的。首先，从横向角度来说，我们如何才能把所有家政工组织到一起？这是世界各地的家政工面临的共通问题。家政工们在一个个小家庭中独自工作，她们是非常孤立的、原子化的。换句话说，家政工们无法像在同一家商场工作的小商贩们那样容易地认识彼此。此外，招聘中介机构也促成了家政工们的原子化。家政工找工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有一些人会从中介公司寻找客户，但是代理机构通常会收取20%到30%的佣金。为了节省这笔佣金，很多家政工——尤其是那些已经建立了口碑的女工——会直接联系潜在客户。这个策略实际上使得家政工变得更加孤立。这是第一点。

其次，从纵向角度来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女性雇主——不管是年轻的女主人还是年长的外婆或奶奶——跟家政工之间产生矛盾。即便雇主跟家政女工都是女性，由于她们所处的阶级不同，她们之间鲜有姐妹情谊、多有冲突。归根到底，她们在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女权主义的发展。我认为对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来说，阶级差异阻碍了女性们结成同盟。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认为上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者留下的思想遗产非常重要。我这里想重点提一下女性农民工以及由于结婚而失去了土地继承权的农村妇女的权利。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时至今日她们仍在坚持。这方面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叫做《农家女》。我认为这种实践给建立跨阶级的女性联盟播下了种子、打下了根基。但问题在于，鉴于目前中国政府对女权运动的镇压，我不知道这个种子何时才能发芽、结果。我不得不承认，来自不同阶级的女性之间想要建立同盟，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JP：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关于《中国制造女权主义》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制造女权主义跟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思潮相比，有哪些地方别具特色？包括户口制度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儒家父权制，是否影响到了中国制造女权主义的形成？此外，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制造女权主义的形成是否也有影响？你能具体地说说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吗？

董：谢谢这位听众提出这样一个复杂、全面的问题。我想邀请你读完我们的文章。我不是想拒绝回答你的问题，我只是想强调你问到的好几个问题，在我跟吴晓合写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答案。简单来说：是的，无论是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还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两者都很重要。细讲的话，我们提出中国制造女权主义这个概念，绝不是想把中国文化或者当代中国女性的主体性本质化。相反的，我们是想把这个巨大的黑盒子拆解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篇文章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切入，我们试着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了各自的重要性。

关于社会主义的遗产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即便在社会主义时期，父权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被纳入制度之中。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妇女解放，但遗憾的是这个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亮，它在现实中并没有实现。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是否彻底、是否只是动动嘴皮子，直至目前仍有不少争论。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审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仔细分析这一运动的矛盾和内在局限性。

我认为跟当代中国最相关的社会主义遗产，是诸如《同工同酬》之类的观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女性普遍相信她们只有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无论你怎么定义女性解放。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宣扬的这些理念与相应的制度的设置，直到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笃信女性必须工作、女性必须与男性接受一样的教育、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男性竞争。由于这样的思想跟政治传统，如果一位中国女性选择辞职回家、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她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点与全球北方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发达国家一开始采取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直到1970年代，女性才开始走出家庭、加入劳动力队伍。即便在今天，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如果一位女性选择成为全职主妇，她不必为自己辩护。这跟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所以我认为，《妇女赋权离不开经济独立》这个深入人心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实践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虽然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观点仍然很有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描述的中国制造女权主义这个思潮中，有很多女性笃信并拥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即个体超群的能力以及阶级的向上流动是实现幸福的最佳途径。

就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作为一种文化话语在中国确实一直存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辨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是谁在宣导这种价值观？在近代中国，儒学曾经多次遭受知识分子或政府的猛烈攻击（例如五四跟文革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男性精英通过挪用儒家的说辞来弘扬性别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女性必然受制于儒

家的规训、被其影响。我认为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解释力甚微。

最后，让我们谈谈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转向只会加剧如下事实：一个人想要保证他/她的社会经济地位，就必须具有阶级流动的能力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女性都相信经济独立是她们唯一的依靠。

JP：你在演讲中已经谈到了再生产的问题，并提出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这个想法有一部分可能是受到南希·弗雷泽的影响，对吧？你在你的写作中也提到过弗雷泽。我想问一下，除了来自中国的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你还受到了哪些人的启发及影响？

董：太棒了，谢谢你的提问，我很喜欢你这个问题。由于南希·弗雷泽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她在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当然，她既不是唯一一位、也不是第一位讨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学者。但我认为，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她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

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是上野千鹤子，一位日本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她写过关于厌女症、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文章。但是，我认为上野的读者仍然是中国女性中极小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关心性别问题、阅读量较大的女性才会接触到上野的作品。如果你问一位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中国女性，她心里中最有名的女权主义者是谁，我相信她的答案大概率是西蒙·波伏娃。

所以，在当代中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和当代女权运动之间有一些有趣的并存现象。一方面，在1980年代时，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被介绍进中国。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公跟996工作制，劳动问题不再只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所面对的问题。对于中产阶级跟白领来说，她们也需要应对超时加班、劳动压榨、以及金融跟债务危机等问题。由于经济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变得越来越相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吸引到了很多受众。

此外，我想指出国外女权主义学者的写作并不是中国女性所能摄取到的唯一的知识养分。并且，中国读者并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外国学者的分析。事实上，从豆瓣到知乎，本土女性的写作颇受欢迎。不幸的是，学术界的翻译往往是单向的。出版商只会把外国学者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很少出现相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这背后有实际的原因。）通过翻译一本已经广受学界认可的书来讨论这些敏感问题，在政治上比较安全。如果你生活在中国，通过发表自己的原创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不仅是危险的、甚至是完全不被允许的。

我个人从阅读中国互联网上的讨论中获益匪浅。这些文章往往是由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比我年轻的女性写的，其中很多人有社会学或性别研究的学位。她们有很多非常具有原创性的评论和文章。我想向大家推荐几位创作者。吕频是近年来最有创意的女权思想家跟作家之一。她尚未用英文发表过她的写作，我很期待她的作品有朝一日被翻译成英文。另一位广为人知的自由女权主义者是赵思乐，又名 Alison Zhao，她出版了一本名叫《她们的征途》的书。⁸此外，很多著名的女权主义组织及自媒体（例如女权之声、女声、新媒体女性等）出版了数以万计由不同作者创作的文章。可惜的是，这些文章暂时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若想促成跨国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结盟，很重要的一点是促进原创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我还在等待这一刻的发生。

JP：非常感谢。我等一下会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作者整理出来分享给听众们。现在有请 Ralf 主持接下来的活动，他有更多的问题想要问你。

董：谢谢你，Jule。

Ralf Ruckus (RR)：听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今天我们恐怕没有时间一一作答。有好几位听众提到了中国女性内部的阶级分化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差异是如何把中产阶级的或者更富裕的女性们跟其他女性割裂开来的。在你看来，

⁸ 详见：Cheng, Nathanael, “Zhao Sile and her Battles.” *New Bloom Magazine*, January 13, 2021, <https://newbloommag.net/2021/01/13/zhao-sile-profile>.

不同的阶级背景在女权主义辩论中起着什么作用？来自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是否为了打破这种分裂的局面付出过努力？

董：我认为这里包含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关于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结盟的问题。由于这个是在进行中的现象，我的观察跟判断肯定是非常不足的，请大家见谅。几年前，很多人批评年轻的中国女权运动家大都来自于城市特权阶层。当时我还跟这些人争论说：你们不应该指责中国女性的声音过于城市化跟资产阶级化。我甚至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这种论述。我指出在著名的女权五姐妹中，有两到三位出身于农村，她们曾为农村妇女的权利问题积极发声。但时至今日，当我面对那些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和权利的都市女性时，我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改变。例如，最近中国有非常激烈的关于代孕的讨论，其中流露出了鲜明的阶级偏见。又如，对女权议题的讨论时常会忽略不计那些提供基础服务的底层女性以及女工。

但这不代表我跟吴晓在《中国制造女权主义》中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依然认为我们不应该指责那些怀有阶级偏见的女性，因为根本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她们。你不能居高临下地跟个体的女性说：《你太狭隘了，你应该为更伟大的事业奋斗，为广大的无产阶级女性着想。》我认为这既不切实际又天真。而且，这种指责起不到任何作用。我跟吴晓指出，鉴于政治控制越来越严、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窒息，在这样一个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权力与父权制纠缠在一起的僵化的结构中，任何一种试图挑战现状的声音都是珍贵的。

就培养女性之间的联盟来说，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一些所谓的先锋理论家或原创思想家，因为她们可以用独出心裁的视角剖析我们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强调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再生产这个视角是可以把在社会跟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女性们聚集在一起的。因为无论我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作为女性，我们都被视作照料工作的主要提供者以及下一代的繁衍者。

RR：有几位听众提出了关于中国妇联的问题，我想把她们的的问题延伸一下：你在你的文章中写过社会主义遗产对中国女性的影响。那么，妇联在当代中国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在回

答这个问题时，能否顺带着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时期妇联扮演的角色？

董：谢谢。首先，我想向大家推荐王政的书。⁹ 她的英文著作《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对于关心中国女权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书。这本书，正如其副标题所示的，讨论的是中国的国家女权主义。它详细回顾了妇联的历史。王政的书从 1940 年代晚期横跨到 1960 年代。当时，妇联曾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试图在党和群众们之间建立联系的伞状组织。女性党员们积极地游说男性领导人、促使他们对妇女问题产生更多的兴趣。

岔个题外话，我正在写一篇文章，讲的是 19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包括向警予跟杨之华在内的先锋女权主义者是如何将女权主义的元素带入党内的。

说回妇联，我认为如王政所分析的那样，当中国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之间转向资本主义之后，妇联变得非常官僚化。后来加入妇联工作的很多女性根本不在乎性别问题，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当然，她们不能代表所有人。即使在今天，妇联内部仍然有一些真正关心妇女问题并实行《隐埋政治》的人。《隐埋政治》这个概念是王政创造的，它指的是在党内工作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常常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通过表面上服从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来获得重要政治人物的支持、暗地里推进女权主义的发展。因此，当我们讨论妇联时，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你不能只用一个死板的标签来描述妇联的性质。要知道，妇联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

虽然妇联存在很多问题，不得不说，在政府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管理妇女问题的分支机构，仍然带来了许多好处。2015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尽管有很多民间的女权主义者、非政府组织的女权主义者、律师以及记者参与到了推动立法的运动之中，最终是妇联这个拥有法律及政治地位的机构促成了这项法律的通过。如果你只

⁹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是一个来自民间的组织，你没有能力实现这么重大的成就。正是民间组织跟妇联内部的干部之间从2000年底到2010年初之间的合作，才促成了这项法律的通过。我想这就是妇联在当代中国的作用。

然而，今天的局势并不乐观。国家女权主义越来越受到打压，在妇联之外的人想要跟妇联内部的人合作越来越难。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现实。

RR：谢谢。有几位观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想特别询一个有关生育政策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独生子女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最近刚刚推出的二胎政策、以及你在演讲中提到的日益降低的生育率问题。很明显，中国政府想要鼓励甚至强迫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女权主义者们如何讨论这个问题？你个人对此怎么看？

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我刚才提到的不合作派在这一点上有旗帜鲜明的态度，即不婚不育。这些女性很清楚政府对于女性的身体抱以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国家和制度唯一关心的是作为女性，你能繁衍出多少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近年来热衷于恢复女性作为照料工作的提供者的角色。这些不合作派的女权主义者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她们斩钉截铁地表明：《我绝对不会落进这个陷阱之中。我不希望我的子宫被这个系统绑架。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学习上，或许我未来可以出国读书。或者，我可以努力工作，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财产、有一个房子可以栖身。我要靠自己。》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合作派的女权主义。

另一方面，我认为现在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等实在是太离谱了。政府想要实行的不仅仅是二胎政策，而是三胎政策，或者干脆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越多越好。所有这些关于人口政策的决定都由男人说了算。人口问题在中国引起了这么激烈的争论，但女性几乎从不被邀请参与到对此问题的讨论之中。我们所能听见的女性对此问题的想法，全部来自互联网或社群内部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生育政策如此令人发指：对生育问题的讨论彻底把女性的声音排除在外。

我想说的是，政府和雇主对于女性们的工具性态度跟女性们对保持自主权的渴望，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只会日益激化。我认为中国会采取越来越激进的促胎政策，这只是时间问题。说实在的，如果个人或者集体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我并不认为低生育率本身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特别是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低生育率对于追求高生产力的国家跟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一个问题，但这是他们需要担忧的问题。

RR: 上次我们跟你对谈时，聊到了中国的女权运动以及性少数群体运动。当时韦婷婷也在。¹⁰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运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你谈到了不合作派跟创业派这两个中国制造女权主义的分支，以及网络女权的蓬勃发展。这些思潮是否囊括对非二元性别者的讨论？她们如何看待拒绝遵循二元性别规范的人？

董: 因为就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写过专门的文章，所以我想抛出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供大家参考。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与性少数群体之间的结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我的观察主要基于那些被别人认定为女性的群体，我认为这些人的处境与那些购买代孕服务的男同志大不相同。

但是，我觉得异性恋女性和同性恋女性之间有很大的潜力发展出同盟。因为不管你的性取向是什么，在政府眼中，你不过就是一个照料工作的提供者以及下一代劳工的繁殖者。很多女性都因为被父母催婚、催生而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就算你告诉你的父母你对异性不感兴趣，他们仍然会试图说服你结婚并生儿育女。因此，那些被外界视为女性的人们的处境非常相似。

相反的，有子宫的人跟没有子宫的人，或是有子宫的人跟想通过代孕服务来获得下一代的人之间不仅关联越来越少，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子宫的人面对着相似的处境。因此，我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性少数群体和非性少

¹⁰ 详见：<https://www.gongchao.org/2020/08/17/online-discussion-series-china-and-the-left>.

数群体之间的结盟抱持乐观态度。这是我对这个提问的非常诚实的回答。我的想法还很不成熟，姑且抛砖引玉。

RR：让我们再次欢迎 Jule，由他来主持最后一部分的关于团结的讨论。Jule，请问吧。

JP：我想问你几个关于团结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其他运动（例如环保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形式的合作？我知道你的著作中对工人运动亦多有着墨。

董：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做几点回应。因为我非常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形式，所以我想给大家最诚实的答复。过去曾有人问过我：女权运动如何建立与其他运动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我想反问：环保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何才能建立与女权运动之间的联系？环保运动和工人运动应该如何意识到自己在性别议题方面的盲点、让自己变得更具包容性？

就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的女权主义朋友和同事不仅仅对性别及妇女问题感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关怀社会正义的人，你会非常自然地对各种各样的议题产生兴趣。但很多时候，当女性投身于跟性别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运动中时，她们时常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我在工人运动中亲眼见过这样的现象，在其他类型的运动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共产党的历史其实也表现出了这个问题。女性们积极参与共产党早期的运动，她们牺牲了很多、担负起了很多关键的职位。但渐渐的，她们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被边缘化。这个现象到现在仍然很普遍。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团结应该是相互的。我们不应该只要求女权运动积极地与其他运动产生联结，我们也应该要求其他运动意识到自己在性别议题上的盲点。我认为最好的策略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我们应该继续坚定地做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不必感到自我怀疑，也不必内疚。过去有许多女权主义者被指责为分裂主义者，这在共产党内部是一个消极的贬义词。但我认为在现阶段，这种所谓的分离主义未必是坏事。我们首先需要把女性们团结到一起，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响亮、被更多人听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厌女症跟性别歧视的社会文化。等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我们再来谈论如何实现一个海纳百川的社会运动。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必要仓促地加入别人领导的行动，因为你的议程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被遮蔽。

JP：很多人都很关心跨越国境的团结跟反抗该如何实现。我们是否有可能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联合在一起？

董：抱歉，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JP：我的意思，在目前存在的反抗压迫的跨国合作中（例如对人权话语的使用），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问题或者变化？

董：因为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我的回答会比较简短。我对跨国结盟这件事情抱持乐观态度。在海外华人内部，我注意到了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趋势。我现在在美国生活，我在日常生活中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认为关心社会正义的海外华人正在稳步增加。比如，现在在美国和欧洲，在占领华尔街事件发生之后，又出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等一系列的社会抗议运动。非常多中国年轻人积极投身于这些运动中，她们跟上一代的华人移民的精神面貌非常不一样。举例来说，中国米兔运动的发起者罗茜茜是硅谷的一名员工。她因为受到美国#MeToo运动的启发，在中文媒体上讲述了她在中国遭受性骚扰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把不同的社区联结在一起、建立同盟。当我们谈论全球南方跟北方的团结时，我们不应该把它理解成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术语。它必须由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来实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华人构成了希望的火种，我认为她们有能力构建这样的桥梁。虽然严格的审查制度跟漫天飞舞的假消息都是真实存在的困境，暂居海外的华人们在这点上享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她们面对的审查相对较少、也更有机会摄取可靠的信息。因此，我在这个群体里看到了活力跟希望。我想推荐一篇跟这个现象相关的文章，即赵蒙眈 2021 年发表在 *Critical Sociology*（批判社会学）上的文章。¹¹ 这篇文章讨论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进行的社会运动，以及她们在美国面临的重重障碍。

¹¹ Zhao Mengyang, "Solidarity Stalled: When Chinese Activists Meet Social Movements in Democracies." *Critical Sociology*, vol. 47, no. 2 (2021), 281–297.

最后，我想再次重复我的观点：语言以及原创性思想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不幸的是，即使对于许多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她们也抱持着《女权主义是舶来品》的观念。这并不是事实。早在一百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像何殷震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在这次活动结束前，我想最后强调这一点。

JP：我们的活动已经到时间了。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分享的话？

董：感谢所有在这个活动待到最后的人。这种活动的形式对我来说非常新颖，我真的非常享受今天的讨论。我最后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请试着读一读中国女权主义者——无论她们在中国生活或侨居海外——写的文章。此外，现在有很多出色的女权主义播客。事实上，在短短三、四十分钟内跟大家介绍中国女权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中国女权主义不仅在迅速发展，也在日益变得多样化。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好现象。我就说到这里。

参考文献

Cheng, Nathanael, “Zhao Sile and her Battles.” *New Bloom Magazine*, January 13, 2021, <https://newbloommag.net/2021/01/13/zhao-sile-profile>.

Dong Yige, “Does China Have a Feminist Movement from the Left?” *Made in China Journal*, April 18, 2019, <https://tinyurl.com/mr23phe9>.

Dong Yige, “Spinners or Sitters? Regim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Urban Chinese Workers’ Employment Cho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61, no. 2–3 (2020), 200–216.

Dong Yige, *The Fabric of Care: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Livelihood in Industrial China* (book-in-progress).

Shen Lu, “Pretty Lady Cadres.” *ChinaFile*, December 21, 2020, <https://tinyurl.com/vn37xrwy>.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Wu, Angela Xiao, and Dong Yige, “The Making of ‘Made-in-China Feminism.’” *Sixth Tone*, November 1, 2019, <https://tinyurl.com/jf8vr56c>.

Wu, Angela Xiao, and Dong Yige, “What is Made-in-China Feminism(s)? Gender Discontent and Class Fric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4 (2019), 471–492.

Zhao Mengyang, “Solidarity Stalled: When Chinese Activists Meet Social Movements in Democracies.” *Critical Sociology*, vol. 47, no. 2 (2021), 281–297.

推荐资料

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a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ershatter, Gail,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Li Zhuoran and Jennifer Lee, “Chinese Feminists Caught Between a Rock and the Party.” *The Diplomat*, July 15, 2022, <https://tinyurl.com/yfmrhdj9>.

Liu, Lydia H., Rebecca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arwana (林徽), “Hooligan Sparrow: 15 Years of Feminist Struggle.” *Chuang*, May 14, 2020, <https://chuangcn.org/2020/05/hooligan-sparrow>.

Peng, X,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Repression, Recuperation and China’s New Women-only Metro Carriages.” *Chuang*, July 4, 2017, <https://tinyurl.com/yndk8dvv>.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fel, Lisa,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科技业员工与阶级意识的高涨

演讲者：JS Tan

主持人：王星¹

王星 (王): 今天我们邀请了 JS Tan 来谈谈中国的科技业员工。JS 以前曾在美国的科技业工作，他写过很多关于科技、劳工和中国的文章。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行业的飞速发展，科技业员工面临着超时工作的巨大压力。这个被称为 996 的工作制（即从早上 9 点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 6 天）在中国科技行业非常普遍。

2019 年，一群中国科技业员工在网上展开了对 996 工作制的抗议。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白领工人的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的讨论。在过去几年内，中国的科技业员工采取了一套新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沮丧，这可能表明一种新的阶级意识正在形成与高涨。

作为一个专业技术阶层，中国程序员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伴随着科技行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亿万富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科技业员工萌发的阶级意识？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形成？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科技业？

JS Tan (JS): 我的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科技业员工的阶级意识的高涨。我想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讨论：劳工以及世界各地的科技业员工如何与中国的科技业员工建立联盟。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名叫《科技业的集体行动》组织的一员。这是一个支持科技业劳工运动的媒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4 月 17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tech-workers-in-china>。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体和研究组织。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努力推动一场全球性的科技业劳工运动。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前，我曾是微软的软件工程师。当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公司内进行劳工组织，特别是围绕气候正义和反军国主义这两个议题。反军国主义是微软内部的一个大话题，因为微软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不少合同。所以今天我主要是从一个在美国从事劳工组织多年的科技业员工的角度来分享我的观点。

2019 年由中国科技业员工组织的反 996 运动是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的科技劳工问题的契机。996 意味着每周工作六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由于这个工作日程是中国大多数大型科技公司的常态，当反 996 运动展开之后时，它迅速席卷了各家科技公司。中国科技业员工纷纷加入这场运动，抗议不合理的超长工作时间。

这场反 996 运动是在 GitHub 上进行的。GitHub 是程序员共享代码、收藏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互相合作的一个平台。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你肯定有一个 GitHub 账户，并且经常使用 GitHub。为了让大家了解反 996 运动有多么流行，我想举一个例子：在短短几周内，反 996 运动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多被人收藏的 GitHub 项目。它比任何主流的开源项目或著名图书馆都受到关注。

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讨论中国科技业员工面临的困境，我们就无法全面地看待科技劳工运动。我一边观察着反 996 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边思考美国的科技业员工有没有可能向中国发生的运动表达支持。通过与微软的同事的合作，我为美国的科技业员工创建了一个单独的 GitHub 项目，以表达对反 996 运动的声援。

这个声援运动是有史以来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业员工第一次进行合作，它引起了轰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技业员工签署了对中国科技业员工的声援声明。由于该声明登载在 GitHub 上，中国的科技业员工也能看到它。当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时，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关注中国科技业员工的工作环境。根据我的观察，除了少数小公司外，反 996 运动基本上失败了。没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最终同意撤销 996 工作制度。少数公司甚至进一步延长了工作时长，导致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

例如，在两年前规模仍然不算大的拼多多，现在要求部分员工每月工作 380 小时，这相当于每周每天工作 12 小时。除此之外，员工们抱怨说公司给他们提供的食物是变质的。在某些情况下，拼多多还要求员工在国定假日期间上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位拼多多的员工不幸自杀身亡，另一位在凌晨 1:30 下班回家的路上猝死。此外，我还听说有员工在上班时突然晕倒、被送进医院抢救。这些事件的发生与拼多多严苛的工作情况分不开关系。拼多多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人们把这家高科技公司发生的惨剧拿来跟富士康公司 2010 年爆发的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做类比。

另一家引起众怒的公司是抖音的竞争对手快手。根据内部消息，快手在卫生间里设置了计时器，以监视员工们在卫生间内停留的时间。拼多多也卷入了这场争论中。上海拼多多办公室有些楼层有多达一千名员工，但只有八个卫生间坑位。员工如果想上厕所，要么排队几个小时、要么跑到最近的商场去上公共厕所。更有甚者，拼多多特地在卫生间安装了切断 WiFi 和手机连接的设备，以阻止员工在上厕所时使用手机。

面对这些严酷的工作环境，科技业员工想出了很多新词来描述他们在这个行业中的感觉。其中一些新名词值得讨论，因为它们表明科技业员工出现了阶级意识的转变。在程序员中流行的一个术语是互相称呼对方为《码农》，意思是编写程序的农民。或《打工人》，一个通常用来描述在工厂工作或从事其他低薪蓝领工作的农民工的词。互相称对方为打工人，即使只是开玩笑，也说明程序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不仅令人难以置信地疲惫、重复，甚至是不需要那么多技术含量的。

另一个流行词是《摸鱼》。这个词的意思是看起来在认真工作，但事实上在偷懒。例如明明不渴却一再去饮水机打水，在手机上玩游戏，或者翻阅社交媒体。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一个你被迫要工作 996 的企业文化中，为什么像摸鱼这样的词

会如此流行。在网络论坛上，你也可以看到科技业员工戏虐地称他们的办公室为《互联网大厂》，意思是大型互联网工厂。尽管在都市的摩天大楼里工作，科技业员工已经开始把他们的编程工作类比为在工厂工作。

过去一年人气最旺的流行词是《involution》或《内卷》。虽然这个词并不源起于科技产业，它引起了广大科技业员工的共鸣。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向里面翻卷》。仅仅看到这个词，你就能得到一种螺旋式向内旋转的感觉，一种无处可去的感觉。对于科技业员工来说，这个词准确描述了科技业员工残酷的超长工作时间、有限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彼此之间激烈的竞争。

我认为内卷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词，它精准描述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大趋势。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词反映了消费技术生态系统的停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科技产业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它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中国庞大的人口纷纷开始上网。但显然，这种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我们可以在电子商务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国电子商务繁荣的早期有两个重要的参与者：京东和阿里巴巴。当时，这两家公司并没有费尽心力互相竞争，因为它们的重心放在鼓励更多中国人进行网上购物。然而，如今电子商务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发展更多新客户，而是如何把竞争者的客户变成自己的客户。拼多多是电子商务竞争的另一个好例子：拼多多清楚地认识到大城市的市场已经被京东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公司占据，因此它专攻小城市及农村，在那里发展新客户。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两大食品配送平台：饿了么和美团。它们分别得到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支持，在这个利润极低的食品配送业务中处于竞争关系。从这一点看，这两家公司与优步跟来福车之间的状况很相似，因为它难以盈利。一旦有了这些强大的金融支持者，饿了么和美团在业务上投入大量资金，使得订购食物变得极其便宜，几乎无法达到企业的收支平衡。这一切的发生，其实是因为它们在一个有限的食物市场里互相厮杀。换句话说，由于饿了么和美团试图在价格上碾压对方，它们无

法向顾客收取更多的费用，导致这些公司不得不自己承担成本，或者，让自己的员工承担成本：据饿了么和美团送货司机们称，他们的收入逐年下降。

以上的状况说明了为什么作为个体的工人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苦苦挣扎，并且被困在这样残酷的零和竞争中、没有出路。我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每个人都在超乎寻常地努力工作，为的不过是在不断缩小的馅饼中占有一小部分。对我来说，这就是内卷的核心：每个人都在 996 制度中宛如溺水一般苦苦挣扎，但是当你想游上来喘口气的时候，你突然被竞争淘汰了。

现在，我想回头聊聊科技业员工的组织工作。随着中国科技业员工在 GitHub 展开反 996 运动，美国科技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阶级意识高涨现象。在过去的几年里，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在其他科技领域工作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本质上属于工人阶级。我们在以下两个例子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的员工加入工会，Google 的员工创立字母工人工会。

随着美中两国科技领域都阶级意识的提高，我不禁思考：如何才能帮助两国都科技业员工建立联结、彼此合作？尤其是在政治家们大谈《AI 军备竞赛》或《科技冷战》的当代世界，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业不能被动地让政客和技术精英掌控。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领导只是增加了互联网的分歧、加强了双方的军事化。《技术冷战》一词表明了我们正在行进的方向是多么的危险。与其让政客和技术精英牵着鼻子走，我们需要思考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业如何才能共存？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中美科技业员工之间的关联？我先讲到这里。

王：非常感谢你简洁的演讲。我想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提问：你能否给我们描述一下，一个典型的中国科技业员工是什么样的？你会如何描述他/她？

JS：我从没在中国从事过科技业，所以我的回答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即使我们把科技业员工严格限定为与白领相关的工作岗位（工程师、程序员、程序经理等），我希望提醒大

家记住科技工作是非常多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它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

举个例子，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现在在上海做科技业员工。与残酷的 996 工作制相反，他每周只需工作 40 到 50 个小时。然而，他任职的公司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公司。另一个例子是，我在阿里巴巴采访过的一位科技业员工是一个级别较低的经理，他的工作制为 996。他说他前一份工作是能够摸鱼的，但现在的工作根本不给他任何偷懒的机会。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公司内部，也存在多样性。华为有一个项目专门雇用功成名就的工程师，他们的月薪约为 10 万元人民币，这个薪水跟在美国科技行业看到的一些高薪持平。这些工人可能也需要服从 996 工作制——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但是与大多数科技业员工不同，他们可能正在研究、试验他们感兴趣的東西，因此 996 工作制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痛苦，反而带来愉悦。

另一方面，有些科技业员工的月薪只有七八千元人民币。这些人可能参加过短期培训项目，借此在前端工程或数据库管理方面发展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几年前，Echowall 将这种现象描述为《IT 金字塔》。我认为这个术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个行业内部，甚至在同一家公司内部，有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有些员工的收入大约是同事的十倍。

这里也有人口统计学的面向。科技业对单身的年轻员工情有独钟。如果你年轻，刚刚大学毕业，你更可能接受 996 工作制。但你一旦有了家庭、孩子，事情就变得麻烦许多。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性别因素：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科技业员工的女性伴侣将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工作。在许多在线论坛上，你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笑话：35 岁对科技业员工来说是一个坎。你在 20 岁出头的时候开始担任软件工程师，在几年内你或许可以升职。理想情况下，也许 34 岁时你已经是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了。但是当你 36 岁的时候，你突然变成了一个送货司机，因为你已经被公司解雇了。

王：我想深入谈谈你刚才提到的科技业员工的多样性。这和 996 工作制及内卷之间有何关联？有没有某一个类别的人，对

996 工作制的感受更强烈，并且可能更有可能接受并拥护 996 工作制？

JS: 我认为这里有好几个因素。你在这个 IT 金字塔上的位置是一个因素：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高达 10 万元人民币，你可能会觉得 996 工作制是公平的，你从努力工作中得到了回报。但如果你位于 IT 金字塔的底端，你可能跟位于顶端的人一样努力——如果不是更努力——但你赚到的只够糊口。位于 IT 金字塔的底端的人，更有可能对超长的工作时间感到不满。另一个因素是员工的所在行业。例如，百度并不需要员工服从 996 工作制，因此相对于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来说，它是一个较为轻松的公司。也有许多西方公司在中国设有办事处，例如威睿或微软。这些公司也不会要求他们的工程师加班。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种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

王: 在讨论阶级意识之前，我想再问一个关于 996 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 996 运动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人们读到并了解到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组织形式似乎非常不透明。幕后有许多组织者，几乎所有的组织者都是匿名的。在你能分享的范围内，你能否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抗议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在组织者保持匿名的前提下，他们是如何做到不断动员其他科技业员工的？

JS: 我也不知道反 996 运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我第一次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反 996 运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如你所说，组织者几乎都是匿名的，这是因为反 996 运动对非常多科技公司及其创始人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批评，每个人都害怕报复。这次运动导致了科技业员工在 Slack 上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很多新的动员工作都是在 Slack 上发生的。

王: 听众们对于科技业员工使用的词汇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一位听众问道：科技业员工自称打工人是否必然有助于他们培养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

JS: 就在现在这个阶段而言，我不认为科技业员工真心认为自己跟在工厂打工的工人属于同一个阶级。我觉得打工人这个词更多的是开玩笑或自嘲。但是，即使只是开玩笑，这个词汇

表现出科技业员工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变。然而，想要看到科技业员工和其他蓝领工人之间的团结，恐怕尚需时日。

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互联网上的用户经常用自嘲的词汇来描述自己或者他们所做事情，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你能分享一下这些科技业员工是如何开始使用这些自嘲性词汇的吗？这是在最近两三年刚刚出现的现象，还是你之前就看到过的现象？此外，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

JS：我的观察对象主要是自反 996 运动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对在那之前的科技领域的阶级意识的了解很有限。然而，据我所知，直到反 996 运动爆发之后，科技业员工才开始大量使用这些自嘲性的话语。

是什么样的历史状况导致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在 2018 年末或 2019 年初，科技领域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当时，京东开始大量解雇员工，以降低成本。这场危机打碎了科技行业给予员工的承诺：只要你努力工作，你总有一天会过上美好生活。我认为这是反 996 运动兴起的部分原因。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业员工工作状况的恶化。此外，我猜想中美贸易战恶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

王：我们等下一定更深入地谈论中美贸易战。有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关于阶级意识的好问题：打工人跟内卷这样的词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集体经验？你是否有注意到科技业员工面对着个人主义跟集体化思维的张力？在中国科技业员工中，哪种思维方式更占主导地位？

JS：我想通过对比美国对《科技业员工》的定义跟中国对内卷的定义来回答这个问题。内卷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它强调的每个人跟其他人竞争。相比之下，科技业员工这个词经过美国科技业劳工运动的洗礼，成为了一个包容四海的概念：它包括合同工、软件工程师、甚至在科技公司的自助餐厅售卖食物的服务员。所以《科技业员工》这个词，本质上有一个强调集体的面向。

在中国科技领域，我认为个人主义倾向比美国更强。与美国相比，中国更为崇尚精英政治。因此，它实际上未能为不同类型的科技业员工提供更多团结的机会。

王: 根据你的观察，有没有科技业员工使用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语言来讨论自己的困境？你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否有影响到中国科技业员工采用的话语的形成？

JS: 在知乎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技业员工经常分享他们对 996 的看法或者他们自己的工作状况，其中出现了你所说的情况。几年前，人们认为马云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现在，当人们讨论他时，你会看到像《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样的留言。

虽然这种批判的规模较小，声音却很洪亮。大多数人更多的是想表达不满，而不是呼吁团结。作为一个在美国组织科技产业的劳工运动的人，我真心相信一对一的交谈以及与你的同事面对面谈天所具有的力量。虽然在网络平台上对社会主义政治表示认可是一件让人感到欣喜的事，但它肯定不能说明科技业员工所使用的话语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它也不能表明科技业员工在未来有团结合作的潜力。

王: 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关于个人和集体叙事的问题。在深圳、北京和其他城市工作的人，往往需要在工作跟租房上竞争。京东和腾讯有不同类型的员工，他们从事的工作有高低等级之分。你认为这种等级差异是否导致了科技业员工更偏好个人主义叙事而非集体主义叙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认为有可能在等级不同的科技业员工之间建立团结吗？

JS: 我想借着我对美国的观察来回答这个问题。从文化上讲，学者们用《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这个词形容在互联网泡沫发生之前的美国科技业。这个词指的是对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尊崇。对许多科技公司来说，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坚守进步价值的同时，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获利。然而，在过去四五年里，我们看到科技产业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挣六位数工资的科技业员工突然把自己视为工人。在美国科技劳工

运动的早期，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科技业员工》？我们在哪里划定界线？

2017年，脸书的职员、上班族、软件工程师等纷纷对脸书餐厅服务员组建工会的运动予以声援。看到高薪的上班族和餐厅的职员形成联盟，对我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前者认可后者是他们的同事。从那时起，科技业员工联盟不断拓宽《科技业员工》的定义，使之更具包容性。作为科技业员工联盟的一员，我们把优步的司机和亚马逊的仓库工人的抗争视为我们更广泛的抗争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这是美国科技业一个非凡的时刻：《科技业员工》一词被用来团结科技行业中各种各样的部门与人员。

我们必须记住，分散的工作场所有利于企业家管理劳工。工作平台化是这种分散现象发生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是美团这样的送餐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你很难把送餐的快递员当成你的同事，因为你和他们从来没有互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科技劳工运动的关键是用包容各种各样的科技业员工的方式进行组织。

王：你所描述的这个建基于广泛的身份认同上的科技劳工运动在美国已经出现。相较之下，你觉得类似的运动会在中国发生吗？我们看到在中国，白领科技工作者以及蓝领快递员分别组织了自己的抗争。你觉得建基于广泛的身份认同上的科技劳工运动在中国有发生的潜力？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诸如打工人之类的词语上，你觉得这些表述方式是促成了还是妨碍了更广泛的联盟的发生？

JS：我个人尚没有看到跨越等级之间的联盟。尽管如此，平台工人的抗争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此外，美团或饿了么的一些员工的薪水跟送货司机的薪水差不多，他们同处于「IT 金字塔」的底端，因此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结成同盟。我现在说的都是我的推断，毕竟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跨职业的联盟。但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看看美国科技业员工是如何将优步司机或亚马逊仓库工人视为他们的一员的。

王: 反 996 运动后, 中国科技业员工是否讨论过其他组织集体抗议行动的理念和方法? 例如, 他们是否讨论过罢工, 成立工作委员会或工会? 我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在线抗议运动, 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线下的、在工作场所展开的运动。

JS: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线下的运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 反 996 运动的组织者全部匿名, 这表明很多科技业员工担心自己遭到报复。今年 1 月, 拼多多程序员王太虚 (化名) 在脉脉社区 (一个类似 LinkedIn 的网站) 匿名分享了同事因工作过度而被送入医院抢救的视频, 结果遭到了拼多多的解雇。拼多多的管理部门查到了他的真实身份, 并解雇了他。当我们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线下行动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发声可能会导致失业。

在反 996 运动之后, 一些组织者制作了一个关于 996 的工作状况的手机游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 你可以在任何一家科技公司扮演一个员工的角色: 你必须面对管理层人员, 你必须面对加班的问题。这个游戏在反 996 运动发生一年半之后发布。另一件事是, 一些组织者号召大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放入信封中寄给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上述的两个例子的组织者, 几乎全都是匿名的, 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很难真正建立关联。我认为, 我们必须得对这些行动的有效性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王: 中国政府在科技业员工跟科技资本的关系之间扮演什么角色? 在某些方面, 中国确实对金融和技术资本进行了约束, 当 996 工作制引起广泛关注时, 国有媒体迅速对超时工作文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骚扰和警告任何试图组织劳工运动的人。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科技业扮演的作用? 你认为它跟中国政府在制造业或其他行业扮演的角色, 是否有所不同?

JS: 反垄断政策或金融法规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国家的逻辑的例子。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从根本上反对阿里巴巴或美团这样的公司的运作方式。不过, 当政府看到这些企业以不

可持续的方式运作，或者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会对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造成威胁时，它会积极进行干预。

就送货司机而言，中国政府一方面赞扬这些公司的扶贫工作，另一方面又批评这些公司缺乏安全措施。他们最关注的归根到底是稳定问题。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平台对中国境内的电子支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以中国政府认为它的风险很大。中国政府为了阻止它上市，强行通过了多种金融限制。中国政府最在乎的是稳定。

王: 下面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些跟中美相关的问题。你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中美科技之战？主要的争论点是什么？

JS: 科技战争，特别是政治家或科技精英们所说的，有五个方面：半导体，网络基础设施（例如 5G）、操作系统、平台以及内容。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来自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比如中国的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中国公司是中国人民政府的傀儡，或者中国实施了很多保护主义政策。因此，在许多美国政客看来，中国科技行业的崛起是中国公司不遵守国际自由市场规则的结果。

但我认为，中国针对美国的科技之争更具战略意义。在我看来，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公司一直主宰着世界各地的互联网服务。如果你看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使用什么在线服务，你会发现脸书、谷歌、优步以及其他由美国人创立的消费者网络服务是常态。此外，大型企业依靠 IBM 或微软提供的服务运行。现在，随着中国科技行业的崛起，他们挑战了硅谷过去几十年所享有的霸权。这场科技之战之所以能得到美国政府和科技精英的支持，是为了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

王: 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相关问题。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业员工如何抵制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用途？此外，什么样的物质基础才能使得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JS: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技术冷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美国和中国看似有着截然相反的利益，但我们不要忘了全球科技基础设施是多么的高度整合。我认为这一点结构可以成为跨国联盟的基础。

网约车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风险投资公司软银主导了整个网约车行业。他们不仅拥有优步的中国合作伙伴滴滴的股份，还拥有优步的股份。此外，优步持有滴滴 19% 的股份。这意味着，对中国网约车司机的剥削，为优步的盈利做出了贡献。

我们还可以看看技术供应链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的。苹果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工厂是苹果供应链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在加州的苹果办公室上班的工程师，和在深圳的工厂里组装 iPhone 的工人，他们被同一个老板剥削。还有一个例子是半导体。中国公司在美国设计的芯片上花费了大量资金。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中国每年进口价值超过 3000 亿美元的芯片。

但并非所有的科技资本都是相互关联的。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消费者互联网成为了一个与美国技术精英的利益毫无关系的技术资本的集中地。毕竟，华为受到了制裁，抖音几乎被美国禁止，中国基本上已经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作为优先事项。鉴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都在转向内部发展，并积极利用民族主义话语煽动本国国民的爱国情绪，中美科技业员工之间的团结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跨国联盟的基础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民族主义在两种情况下的运作方式和部署方式。纵观历史，民族主义一直被用来掩盖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固有的阶级矛盾。这意味着工人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把阶级利益放在一边，让精英们更容易逃避一切。科技产业也不例外。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科技精英们用民族主义言论来证明 996 工作制是中国独有的优秀制度。例如，华为总裁任正非对美国制裁的反应是：华为必须抓住这个机会防止员工偷懒。

在美国，科技公司用民族主义来为各种可怕的行为辩护。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与贝宝的彼得·泰尔等高管都曾以《为了确保我们领先于中国》为借口，反对反垄断监管或合法化暴力军事合同。顺便说一下，军事合同和 996 工作制，刚好是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业员工抗议的对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美二国，民族主义都被用来破坏该行业现有的劳工组织。

我想说的是，中美两国政府刻意炒作民族主义叙事，来使两国人民彼此对立。如果美国的科技业员工能够与中国的同行发展更牢固的关系，就有可能对抗这样的政治操弄。

推荐资料

996.ICU: https://996.icu/#/zh_CN (中文); https://996.icu/#/zh_US (English); https://996.icu/#/zh_DE (Deutsch).

Lin, Kevin, “Tech Worker Organizing in China. A New Model for Workers Battling a Repressive State.” *New Labor Forum*, vol. 29, no. 2 (2020), 52–59.

Tan, JS, “Tech Workers Lie Flat. Why is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Putting an End to the Grueling Schedules that Have Fueled so much of its Growth?” *Dissent Magazine*, Spring 2022, <https://tinyurl.com/3j3cwjdz>.

Zhou, Viola, “The Dream is Over for China’s Tech Workers.” *Rest of World*, July 12, 2022, <https://restofworld.org/2022/china-tech-layoffs>.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的劳工抗争和种族歧视

3

疫情中和疫情后的劳工抗争

演讲者：Eli Friedman、来自中国的劳工行动者 Wen 和 Pan

主持人：Daniel Reineke¹

Daniel Reineke (DR): 回顾过去几年，特别是 2015 年以来，中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劳工组织者以及草根劳工团体的打压，也对整体公民社会予以压制。与此同时，过去几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经济的地域和产业重组，这一方面代表制造业工人的议价能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代表服务业和物流业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今天会通过探讨一系列议题来评估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我们旨在询问劳工组织者应该如何在中国的现况下继续进行组织工作。在中国能用什么策略？国外的行动者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来声援中国的劳工？中国的劳工运动又如何能回应新冠肺炎所带来的不断的挑战？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讲者，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第一位讲者是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康奈尔大学国际及比较劳工学系的副教授。Eli 多年来一直研究和撰写有关中国工运的文章，他将会概述中国工运的现况。第二位演讲者是 Wen，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的工运行动者，ta 撰写了很多关于广东工运的文章。在其演讲中，Wen 会探讨中国工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之后的情况。第三位讲者是 Pan，也是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的工运行动者，并有丰富的在地劳工组织的经验。Pan 会分享 ta 本人的经验和有关工运行动者在今天所面对的情况的观察，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针对中国工运行动者越发严重的压迫。

Eli Friedman (EF): 谢谢你，Daniel。我想感谢所有组织者，要组织这样一场演讲并不容易。《中国与左翼：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这一系列线上讲座缔造了跨国联结的可能性。能和来自北美、欧洲、亚洲的讲者对话，实在令人激动。

¹ 演讲时间：2020 年 9 月 26 日。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我想对过去十年中国劳工抗争的动态做一个概述。首先，我想表明：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充满了不同的社会分支，其经济也十分庞大、有各式各样的形态。我主要会谈论农民工，并主要集中在私营经济这个方面。1990年代末起，伴随着国有部门私营化，劳资纠纷大幅上升，但这些纠纷在2010年时逐渐消失。这并不是说这些工人不再重要，而是工人运动的焦点转移到了私营经济这个方面，主要由农民工推动。

在2010年刚开始时，中国的劳工运动充满积极正面的情绪。这是因为仅仅两年前，在2008年，有一系列的法律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律赋予了工人一系列新的权利。对于工人权利意识的抬头，坊间有很多讨论。《合同法》被视为是对于2000到2010年间越来越多的工人运动的回应。中国从2008/2009金融危机中恢复得很快。金融危机导致了失业率高涨，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就恢复了，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因此从结构上来说，工人处于优势。

由共产党操控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着中国的官方工会结构。这个组织非常保守，经常采取反对工人运动的行径。但这个组织有一点做得还可以：他们试着回应由下而上发起的工人行动。我在研究中深入分析了这个现象的限制和可能性。²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有人尝试组织工会，更有人尝试进行集体谈判——这被视为中国尝试缓和越发严重的劳资冲突所做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当时罢工不绝，我们确实能感觉到中国——特别是在中央层面——非常害怕劳资纠纷的加剧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因此，他们尝试回应工人的诉求。在那段时间，中央层面——地方层面比较复杂一点——总体来看是在往支持工人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央通过了新的政策，并容许工会进行比较自由派的一些改革。

关于源起于2000年代、并在2010年代进入全盛期的工人抗争，我想谈一谈它的特色：抗争主要发生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上海周边的长江三角洲。罢工全都是未经工会批准的野猫罢工。人们通常有一个误解，以为罢工在中国是非法的，但事实

² Friedman, Eli,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上不是如此。虽然邓小平在 1982 年从宪法中移除了罢工权，但中国的法律并未就罢工作出任何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非法罢工》这四个字并不存在于中国法律之中。即便如此，每当工人罢工，他们都缺乏法律保障，代表这些罢工往往并非由工会组织。这些罢工通常只出现在特定的工作单位，针对紧迫的、具有时效性的职场问题。我们既没有看到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也没有看到由工人控制的有自主权的工会。因此，即使中央对待这些罢工活动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建立正式的工会来代表工人仍然被视为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对于这些罢工的政治取向，大家有一些争论。对于在工作场所直接抗衡资本的行动是否应被界定为政治行动，也有一些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农民工之中，反老板的情绪非常普遍。纵观世界各地的工人传统，反老板的心态向来是政治的核心。我认为，农民工普遍怀有阶级意识。

这些都是正面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工人若想建立长久的政治组织以对抗工作场所内的资本或工作场所外的国家，面对着很多阻碍。在 2000 到 2010 年之间，在企业内部发生的罢工通常得到一定程度的成功。很多罢工都关乎违法事件，例如没付薪水、超时工作、没付社会保障金等。我们确实见到了一些改进，但很难保证法律在这些方面一以贯之地施行。事实上，中国在施行法律以保护劳工的权利这方面一直以来的情况都非常恶劣。2010 年的大型罢工潮带来的改变中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工人不仅要求加强法律对他们的权利的保障，更想争取到超越最低法律保护的要求，³ 例如工资要在最低工资的水平以上。中国政府素来不支持关于最低工资的诉求，这代表工人很可能遭遇打压。不过，在部分个案中，工人最终争取到了大幅加薪。另外，越来越多工人组织了关于社会保障的罢工，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最典型的例子是 2014 年发生在裕元工厂——一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一所大型制鞋厂——的罢工。⁴

³ 关于 2010 年的罢工潮，详见 Butollo, Florian, Tobias ten Brink, “Challenging the atomization of discontent: Patterns of migrant-worker protest in China during the series of strikes in 2010.”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3)(2012), 419–440.

⁴ Schmalz, Stefan, Brandon Sommer, Xu Hui, “The Yue Yuen strik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ur unres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lobalizations*, 14 (2) (2017), 285–297.

由于以上这些事件，当时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大家对工人运动抱有乐观态度。大家都相信未来会更好，中央政府会回应大家的诉求，工人的政治能力会继续扩宽。可是，在过去五年习近平的威权统治下，这种乐观情绪逐渐消失。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的政治整体向右转。他经常表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这些言论让支持工人权利的人倍感困惑。习向右转的思想倾向可以从他强硬地反对工人的劳工政治中看出来。除此之外，有一些经济因素也在阻扰工人。首先，工人的抗争围绕着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展开，而这些制造业的生产地已经转移。很多工厂已经关闭，或迁移到中国内陆、东南亚、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导致工人被调去四面八方、原有的社群被摧毁。因此，越来越多工人在打防卫战以抗议工厂关闭。另外，工人在生产线上的角色逐渐势微，这也和自动化有关。总体而言，劳工力市场不再像2010到2012年间那样供不应求。中美贸易战对出口市场影响深远，新冠肺炎使得情况更复杂，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对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

比起经济，政治的转向所扮演的角色更大。习近平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异议，在现行的政治结构中，地方官员并不愿意承担任何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中国针对非政府机构（NGO）进行了严格的打压，我们稍后会更详细讨论这一点。在部分罢工之中，NGO为工人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位于广东地区的NGO被打压的极其严重，部分NGO的工作人员被判监禁。从2000年开始的微小的改革就此结束。中国政府甚至放弃讨论集体谈判，闭口不谈对于罢工合法化或独立工会合法化的讨论。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对在2018年的佳士事件中提供协助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的打压。⁵我们就此可见，政府不单怀疑所谓的《外国》或《西方》影响通过NGO传入中国，就连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思想主义者的人，只要他们加入劳工运动，就会遭到打压。

以上这些都是坏消息。我希望以比较正面的方向结束我的演讲：好消息是中央仍未解决野猫罢工的问题。我们很难得知

⁵ Au Loong-Yu, "The Jasic Mobilisation: A High Tide for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4) (2018), 12-16.

到底有多少场罢工，又有多少场被镇压，因为并没有官方记录。但我们明确知道随着资本流出中国，同时流出制造业、转投服务业和物流。工人抗争也跟随资本进入新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办法像二战后的西方那样，利用政治工具来创造长久的解决方案、解决阶级问题。因此，工人抗争的问题会持续下去。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

DR: 非常感谢你，Eli。接下来我希望 Wen 能够稍微分享一下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工人所面对的情况。

Wen: 大家好，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分享自 2020 年 1 月至今（2020 年 9 月），新冠疫情下中国工人的情况。首先，我想给大家一个概述。如大家所知，在中国，疫情基本控制在湖北省以内。因此，大部分工人并未感到自己有染病的可能性。相反的，疫情期间，至今为止，工资仍然是劳资双方的角力关键所在。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1 月至 8 月的集体劳工纠纷仍然围绕着工资展开。⁶ 这与欧洲和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当地来自不同行业的工人之所以抗议、罢工，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导致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希望有保护措施。

为使我的演讲更清晰，我将 1 月至今（2020 年 9 月）的这九个月分成四个部分进行分析。

第一部分是疫情初期（2020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武汉封城后，全国开始抗疫。很多关注工人问题的网上团体开始一一组成，包括：

(a) 口罩供应群组：它关注卫生行业不安全的工作状况，并向清洁工人提供口罩和设备；

(b) 呼吁在网上组织和进行民意调查的群组：它呼吁政府延长春节假期；

(c) 保护工人返工时的权利的群组；

(d) 以及其他资讯共享群组：它分享有关疫情的发展趋势、防护措施和政府政策的信息。

⁶ 详见：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Map, <https://tinyurl.com/4axjxy2p>。

这些群组的创办人与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和数个左翼行动者有一定的联系。加入到这些网上群组中的工人来自位于中国不同地点的不同企业。由于这些工人不认识对方，也因为这些类型的网上组织不断遭官方打压，令其难以采取任何更有意义的行动。

第二阶段（2020年2月中至3月初）：工人们逐渐复工。严厉的监控措施成功制止了新一波疫情爆发。为了复工，企业必须遵守防护措施，并遵守地方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指令。假如任何工厂出现新的病例，就必须立即停止运作，并隔离整个工作场所、甚至整栋大厦。由于工厂希望可以保持运作，相对于非疫情时期，工人在这个阶段可以较为容易地投诉工厂违规情况。这个阶段主要的冲突为既要控制疫情又要保证持续生产。

第三阶段（2020年3月中至5月）：越来越多人重返岗位。大部分企业选择将盈利损失转嫁给工人，导致工人的薪水下降，这个现象在小型企业尤为常见。因此，工人的不满增多。劳动部已经准备好预防、控制由此导致的劳资纠纷。因此，劳动部加强了本已部署好的力量以解决任何纠纷，并设立了网上调解平台，让地方官员直接进行调解、以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这些措施有效地将工人的集体怨愤化成了个人投诉，因此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从广东省深圳市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一点：在2020年第二季度，上报到地方劳动部门的劳动纠纷数字大幅上升。⁷

在同一时段，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人丢了工作、工厂的生产暂停。在3月份，当疫情传播到欧洲和美国之后，制衣业、制衣业与电子工业遭到严重影响。进行出口处理和外贸的企业所遭受的影响更深。渐渐的，平常习以为常的加班习惯越来越少见，甚至不再加班，生产也最终停止了。对大部分突然失业或被要求停职的工人而言，正常反应是寻找临时工作以补贴工资，或回到乡下以降低生活成本，同时等待情况好转之后再开始寻找新工作。

⁷ 详见：http://hrss.sz.gov.cn/xxgk/tjsj/zxtj/content/post_8187870.html。

第四阶段（2020 年第二季度开始维持至今）：经济复苏期。自 2 月起，中央政府开始引入一系列政策以稳定市场。在第二季度，经济已经从封城中恢复，并重新开始增长。同时，工厂重新开始招人，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但是，由于订单不稳定，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工作或是以时薪计算，或是缺乏社会保障的临时工。

总而言之，职位流失、就业不稳、实际收入下降，都对工人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这些工厂对于工人行动越发忧虑，新一轮工人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打压。但是，中国工人反抗的意愿并未因此改变，特别是那些身处广东省、有丰富的对抗资本家的经历的工人更是如此。

DR: 非常感谢 Wen 的精彩论述。接下来由 Pan 分享，他会介绍劳工行动者现在面对的情况。

Pan: 我是一名中国服务业的劳工组织者。今天我会谈一谈专门处理劳工议题的 NGO，以及在威权统治的打压下，劳工 NGO 在未来如何能够把工人组织起来。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针对劳工 NGO 的打压有多么严重。毫无疑问的，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劳工 NGO 和其他人权组织是国家的敌人。对劳工 NGO 的打压造成毁灭性影响，令我们必须自我反省甚至批评劳工 NGO 过往的工作。因此，在我的演讲中，我会尝试反思劳工 NGO 的角色，讨论需要改变的部分，以及在威权时期组织工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新做法跟新点子。在我的演讲中，我把 NGO 称为《局外人》。对此，我的意思是，在过去，劳工 NGO 是以局外人的角色支持劳工运动，而非以同志或隶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份子的身份加入到运动中。

在过去十年间，劳工 NGO 经历了两个政治特质的发展。第一个是从被政府骚扰变成被政府刑事控诉。在 2012 至 2013 年之间，很多劳工 NGO 已经面对骚扰。他们被租用办公室的房东赶出来，办公室被迫停止运作，但当时没有人遭拘捕。然而，2015 年后，劳工 NGO 开始被检控。最有名的一宗案件发生在

2015年，十几个位于中国南方的劳工行动者遭到攻击，⁸ 其次是Eli刚提到的2018年佳士事件。在2019年，很多组织被打压，很多劳工行动者被捕。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改变了它的政策，开始对劳工NGO的工作进行监控与打压。

第二个发展是从隐形发展到边缘化和扼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所知，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中，劳工议题向来被视而不见。在2015年前，这个议题较多人关注。但2016至2017年出台了两条新法例以监管公民社会组织。第一条法例是201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它对本地公民权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如何进行公开筹款予以监管。根据这条新法例，若无政府发出的许可证，则不可公开筹款。这对劳工NGO在国内筹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第二条法例是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该法例对海外组织为中国的NGO提供财政支援进行监管，它是一个切断境内NGO的海外资金来源的重要手段。

总括而言，利用这两项策略，中国政府尝试控制并限制劳工NGO和其他人权组织的活动，尝试将其从政治上刑罪化，并以财政策略限制它们的生存空间。我认为，运用这两项策略的中国政府非常狡猾。这两项策略至今仍然限制劳工NGO的生存空间。

以前，我们经常谈到劳工NGO所做的三种工作：第一样是服务型工作，另一样是法律援助工作，而第三样则是组织运动，组织工厂工人发动罢工、争取赔偿。然而，由于上述两项新策略的打压，政府严重危害到了工厂中的工人中心的生存空间。现在，很难在工厂之中维持工人中心的运作。此外，政府迫使很多NGO调整其日常与劳工议题相关的活动，甚至强迫它们放弃与劳工权利相关的工作。这导致部分之前关注农民工的劳工组织将重点转移至农民工留守儿童——这个议题在中国比较不敏感。

⁸ AP News, "China detains grassroots labor activists as disputes rise." *AP News*, 2015年12月22日, <https://tinyurl.com/ymyhk3c9>。

再者，由于《慈善法》的发布，所有劳工NGO都被融入至一个官方支持或官方认可的财政支援系统中。这就代表着你必须和政府打好关系，完整汇报所有的行动和财政来源。因此，即使有官方认可的身份，你想要进行任何地下工作都变得非常困难。基本上，在过去五年内，NGO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它们主要关注如何在这段时期存活。目前，只有提供社区服务或法律援助的NGO仍然存在，以往进行集体谈判的NGO已经消失。

我想讨论的另一个挑战是之前提到的一点：以前，NGO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工作。人们批评劳工NGO，认为它们仅向法律问题缠身的工人提供服务和建议，但难以跟进个案。此外，看不出NGO的工作者能为工人培养出什么样的阶级意识。NGO忙于处理危机，但它们对工厂本身以及如何进行长期的组织工作缺乏足够的知识。部分学者甚至认为NGO是反团结的机器。⁹

虽然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NGO在某种程度上，自愿地融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霸权组织之中。有一些NGO尝试鼓励工人向国家和工会提出要求，使后者更负责任，有时候NGO会说服工人同意工会的观点。这令工人陷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工会并不会保护工人。相反的，工会分化工人并破坏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很多劳工NGO视自己为运动的领袖，也就是说它们尝试领导工人，而不让工人自己成为运动的领袖。就此来说，我认为NGO太有野心了。考虑到这些背景，我们正面临重大的挑战。

在这段时期，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定义《局外人》的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脱离服务型工作，进行组织型工作或赋权型工作。我以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为例。过去几年，我们的组织工作侧重于跟工人对日常生活相关的一切，而非任何特定的危机。我们试着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场所中的冲突上。身为组织者，我们教导工人如何在工作场所夺得权力，并协助他们理解他们领导采取的高压的管理手法。我们尝试建

⁹ Lee, Ching Kwan, Shen Yuan,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 Lab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London: ILR Press, 2011), 157-172.

立劳工抗争的文化。我们并没有仅仅关注大型集体行动，而是更关注各样较小的议题，例如加班费和管理层对不当行为。我们尝试提升意识、鼓励《冒犯性的》行动，以抗衡日常发生的小型工作场所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充满微小抗争的新工人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尝试教育工人认识工作场所的结构性权力不平衡，并公开揭露资本主义管理层的秘密。一旦工人明白管理层如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削他们，他们就会自行想对策以挑战管理层的权力。这样一来，工人能超越对管理层的恐惧，通过《冒犯性的》行动夺取权力。

我们组织活动的一大宗旨是：法律并非工人的武器。因为中国的法律并非由工人设计，也非对工人有利，在执法方面也很糟糕。我们尝试教育工人有关抵抗管理层不人道对待的劳工抗争的合理性。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事情是否合法，而是不公平的对待合理化了工人的抗争。这个新的组织方法以及实行的方式强调了 NGO 不再是领导者，而仅仅是辅助的角色。NGO 应该尝试协助工人领导他们的运动。

然而，问题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这种组织方法是否仍然可行。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得到如下结论：过去，我们专注于以行业划分的组织，我们试着将法律教育转化为关于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的教育。我们同时尝试鼓励工人主动冒犯、攻击管理层，以改变工作场所的权力平衡。此外，我们失去了工人中心这个能让工人们聚在一起的场地，因此我们尝试发展线上互助社群、鼓励工人互助。作出这些行动，一部分是为了回应政府的打压，因为政府无法为了组织我们而关闭整个互联网。同时，这个组织方法鼓励工人进行集体行动，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有权力抗衡管理层。

有一些劳工组织和媒体非常值得一提，例如工号 51¹⁰ 和心环卫。¹¹ 它们利用网上平台教育工人，并鼓励工人挑战高压的文化。部分组织和平台仍然存在，但部分已经消失。¹² 必须指

¹⁰ 详见：<https://gonghao51.github.io/>。

¹¹ 详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223105322/http://hwg1026.com/>。

¹² 可惜的是，本文出版之际，这些组织全都停止运作。

出，当 NGO 的组织工作从线下转到线上，并不代表它们放弃了组织工作。相反，它们找到了新方法组织工人，形成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

当然，一些重要的、未解决的挑战仍然存在。我们仍然面对拘留和打压的威胁，我们对此毫无解决方法。即使我们利用前述的线上策略，也只能争取一些有限的时间来进行组织工作。一旦被政府发现，我们就会遭到攻击。同时，我们没有足够的组织者，因为要进行劳工相关的组织工作越来越困难。即使当代中国有越来越多年轻学生向左转，从道德跟政治两个层面考虑，我们不好意思鼓励他们投身劳工运动。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

DR: 非常谢谢你，Pan，也再次感谢三位讲者的分享。有一位听众向 Wen 提了两条问题：《在英国，由于新冠疫情而导致从事低薪临时工作的人被解雇的情况对女性的影响更甚。你能说一下性别因素在疫情中的中国有什么影响吗？此外，你是否能谈一下新冠期间的失业问题？》另一位听众问：《你是否能再解释一下岗位流失和失业问题？当工厂停工，工人是否被解雇？你是否留意到市区有重新聘请工人的情况？当工人在城市里寻找临时工作或从事之前没有做过的工作，他们通常做些什么？》

Wen: 是的，中国女工受疫情严重影响，在家居服务业、餐饮业和部分加工业等女工占大多数的行业的影响尤其严重。一方面，由于行业受疫情影响，很多女性无法继续工作。另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学校停课，很多女性必须待在家里照顾子女。由于失业和停课，她们只能困住家中。在这个背景下，在过去几个月中，很多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都留意到了家庭暴力报告的增多。但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住，学校重新开放了，很多女工重返工作岗位。但是，她们的工资明显下降，就业情况变得不稳定。

关于岗位流失，必须提到，工厂完全关闭的情况不多。大部分只是暂时停工，就算停工，时间也不太长。自 6 月起，很多工厂已经重新聘请工人。截至目前为止（2020 年 9 月），工厂希望聘请更多人，但却找不到足够的人。劳动市场供不应求。

工人倾向找临时工。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很多工人寻找建筑业的或送货的工作，或在制造业做临时工。这是因为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对建筑业进行了大笔投资，导致现在有很多新的建筑项目需要大量临时工。饮食和零售送货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幅上升，因为这个行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工作时间较为灵活，很多工人选择从事这类工作。

制造业方面，在2020年5月后，部分工厂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海外订单。然而，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工厂倾向聘请日薪工人。因此，一般而言，在以主要出口的制造业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失业率下降。工人的就业情况越来越好，这和国家出台的经济政策有关。可是，这一类暂时性的刺激经济的措施治标不治本，并不会解决与岗位流失和失业相关的本质性问题。

DR: 非常感谢，Wen。下一条问题是问Pan的，是关于劳工行动所面临的挑战。Pan，你提到其中一个方法是加强教育工人，让他们理解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平衡。那么，组织者如何才能进行这一类教育工作呢？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你所谓的《局外人》，到底如何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工人的日常生活？

Pan: 我先回答第二条问题。我所提到的《局外人》是过去的劳工NGO，因为我们关注所有行业，角色像是医生那样：你坐在办公室里，等病人来找你问问题，然后你向病人提供标准建议。劳工NGO向来如此。对于前来咨询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工厂工人还是餐厅工人，我们都提供建议。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前来咨询的工人来自哪个行业、哪间工厂，这完全是局外人的位置。

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定义我们的角色，令我们不再是局外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特定的行业进行深入的了解。过往，我们并不了解工人的生活，仅将他们视为需要治病的病人，治完就送走他们。但是，要是我们只集中于一个行业，就能了解到该工种的一切发展进程。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工人日常面对的问题，因为他们会和我们分享。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明白压迫从何而来，工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们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工人不反抗。但是，除非我们理解工人的担忧和

难处，否则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只集中了解一个行业，就能了解得更多。

至于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服务业工作，在这个工种中，要是工人犯了错或被视为是闹事者，就会被管理层罚款。我们的工作鼓励工人不要接受罚款。我跟工人说：《你必须和管理层说，即使无法取消罚款、取回罚金，也必须让他们知道你非常愤怒。你刚刚损失了很多钱，你不能默默忍受。即使你向管理层大呼大嚷、表达愤怒，他们也无法罚你双倍的罚金。》我们也鼓励工人跟同事以及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验。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做，管理层就不会再罚钱，因为工人的行动会大大减弱他们的权威。要是管理层知道每个人都会投诉，他们就会害怕，转而削弱罚金制度。

我还有另一个例子。我们鼓励工人思考为什么他们面对如此多的剥削？我们帮助工人理解这主要是因为管理层。然后，我们鼓励他们向更高级的管理层或向政府投诉有问题的经理。这样，我们就能尝试将不合格的管理层拉下台。一旦我们向高层或政府投诉，下层管理人员就会害怕，就会召集工人开会，试着安抚大家：《好的，我知道你们生气，我们会正视问题。》这样，工人就能利用工作场所的权力结构，通过行动得到改变。

DR: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接下来的两条问题是问 Eli 的。在你的分享中，你谈到习近平时代对工人的管制越发高压。来自观众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越来越高压的主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要维持社会稳定，还是为了将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第二个问题是：看起来中国并无意愿提升工人的谈判力，但中国是否有做些什么来加强监管企业的行为？

EF: 要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固然是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肯定几件事。第一，针对工人的打压并不独特。我在演讲中简单地提到，在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整体向右转，他对所有你想得到的公民社会团体进行了高压管理。

2015年初，就已经有针对所谓维权律师的打压。¹³ 这些律师毫不激进，相反，他们信奉自由主义，信任国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仍然面对很多打压。环保行动者被打压，此外，也有针对女权主义者的打压——大家可能听过女权五姐妹事件¹⁴——但打压并不止于这些。打压的系统针对所有弱势社群，在新疆有可怕的集中营，在内蒙古则有语言的争议。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严重的右倾是为了加强父权统治、汉族统治与资本统治。

谈到资本，事情就更复杂一点，也触及到了第二条问题：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加强。中国再也没有私有化，因为国家试图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过去几个星期，习近平和很多私营企业家举行大型会议，人们都很好奇那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私营企业中都有党的眼线，确保私营企业也要服务于爱国的目的。

部分左翼人士会说：《国有化不是很好吗？》但我对工人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无迹象证明中国政府——更准确来讲是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操控是为了保障工人利益，让工人在工作场所取得更多控制或得到更高工资。

回到第一个问题，关于打压到底是政治性的、还是为了降低工资：打压的首要目的肯定是服务于政治意图。中国在最近15年面对根本上的政治和经济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增加国内消费，这一点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更为明显，当时美国和欧洲出口市场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为了增加国内消费，就要提高工资，也要提高社会保障，让人们不用为送子女到学校、为了退休和医疗等事情而忧心，这些都是中国农民工特别担心的问题。

要是我们看看历史，这一类的阶级妥协——基本上是福特主义的妥协——是如何形成的，就会知道独立的劳工力量是绝对必须的。但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考虑给予让劳工独立。

¹³ Fu Hualing, "The July 9th (709)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Legal advocac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 (2018): 554–568.

¹⁴ Dong Yige, "Does China have a feminist movement from the left?" *Made in China Journal*, 4 (1) (2019): 58–63.

我们可以回顾 2003 与 2004 年，当年温家宝已经谈到要增加国内消费，但是国内消费并没有增加。因此，我认为这是共产党必须要持续处理的问题。

DR: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Eli。我希望探讨另一个议题。自疫情开始，快递平台的工人所面对的艰辛工作环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了中国公共舆论的话题。Pan，你认为中国快递工人有可能组织起来吗？

Pan: 很多快递工人都在讨论要组成属于他们的组织。在各城市有些领导都在尝试组织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尝试为送餐员组织工会，但组成官方工会、融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非好的做法。我们不会鼓励他们这样做。中华全国总工会之所以想组成送餐员的工会，是为了提升关键绩效指标：他们想要在未来的官方工会中融入更多非正规工人。总工会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送餐员的网上行动在过去几年越来越有动力，因此为政府带来很多压力。总工会旨在防止工人反抗。截至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一行业的许多工人都了解资本管理阶层有多么邪恶，工人的工资有多么低，但他们仍然缺乏自行组织工会的条件。

EF: 对此，我想简短地补充一下。我正在和一名学生进行送餐员罢工的研究。¹⁵ 在中国，有两个主要的餐饮快递平台：美团和饿了么，而我们集中研究后者。有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工作，我同样不感到乐观。但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工人反抗运动已经跟随资本的迁移进入了新的行业。在餐饮快递业中，这绝对是正在出现的现象。

饿了么平台上有两类工人：一类是直接为平台工作的工人，但大部分的送餐工作都是经由分包商——也就是由加盟店招聘送餐员——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有很多极小型的反抗。你可以见到只有在同一分包商工作的十至十五人罢工。加盟店设定了很多工作条件，例如将送餐费降低一元或五毛，接着十五个工人就组织起来，在线上组织起来。有趣的是，中国

¹⁵ Liu Chuxuan, Eli Friedman, “Resistance Under the Radar: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s Food Delivery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Vol. 86 (2021), 68–89.

政府觉得不值得打压或审查这些事情。因此，工人在线上进行组织，并进行小型罢工。例如，在午餐时段，他们会离开岗位两小时，强迫老板协商。我们发现了很多这类小型罢工的例子，我认为这些是令人乐观的现象，但当然，它也有政治上的限制。

DR: 很感谢 Pan 和 Eli 的回答。播客节目《打工谈》最近推出了一集有趣的内容，探讨的就是送餐员的问题。¹⁶

下一个题目是关于跨国团结的，希望能听听你们三位的意见。Eli，你以美国大学为基地。你是否有见到外国学者进行任何与中国劳工运动和中国学生行动者相关的团结行动？Wen 和 Pan，关于跨国团结行动，你们俩有什么看法？在你们看来，哪些团结行动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

EF: 这是一个很棒但很困难的问题。关于工人团结，我们脑海中有一个过于理想的画面：它是围绕工作场所问题或政治问题展开的工人对工人面对面的团结行动。我必须说，根据现状，这个是极难做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工运动面对严重打压和越发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组织方式可能更适用于身处美国的人，但欧洲的人也面对相似的情况。

不论我们是工会还是大学的一份子，首要的工作都是意识到日渐严重的反华情绪。这与美国比较相关，在川普政权下非常明显。但找出问题所在是很重要的。问题所在是中国、美国和欧盟都掺杂在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之中，而这个系统并不服务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我认为即使没有直接的工人对工人的联系，或直接的学者对学者的联系，也是可行的。

学者在为辩论建立结构和反抗反华方面，确实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抗议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显然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对中国政府带着批判，但这跟我们反对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逐渐升温的反华情绪、右翼民族主义是两回事。

关于大学对大学之间的直接接触，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康奈尔大学两年前非常关心佳士事件，因为人民大学积极打压

¹⁶ 关于播客节目打工谈，详见：<https://open.spotify.com/show/6kE1WvcbegErlJ4drKRhxX>。

参与佳士劳工运动的学生，我们最终暂停了和人民大学的学术合作关系。¹⁷我们切断这些联系，并清晰地表明了我們这样做的理由，以免有人將我们反对中国政府及大学压迫学生行动者的立场污蔑为反华。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例子，但我确实认为中国大学参与到了很多中国政府所做的令人不屑的行径之中，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工人跟新疆的集中营方面。康奈尔大学在中国有很多合作关系，我绝对不是在提倡跟中国完全切割关系。但我认为，询问你身在中国的同事需要什么、你怎么样才能向他们表达团结跟支持，这是有意义的。

DR: 谢谢。Wen 和 Pan，你们认为什么是可行的且有意义的跨国团结？

Wen: 关于国际团结，现在可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交换资讯，特别是关于工作环境和在不同国家的工人所面对的不同困境的信息。最近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行动：在中国有些义工在写一些中文文章，向中国工人介绍其他国家的工人在疫情中的抗议的方法，以帮助中国工人争取更多权利和保障。这一类的工作应被鼓励。此外，应该有更多像今天这场讨论一样的跨国讲座。我觉得今天的讲座，在交换资讯和建立跨国团结方面是非常好的平台。

Pan: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对跨国合作的前景并不感到乐观，但我仍会试着提出两点想法。第一，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应该从中国工人的观点理解中国政权，而不仅仅从《帝国主义或非帝国主义》或《西方或非西方》的观点出发，这很关键。

第二，我们必须团结全球所有工会。要是你关注侵犯人权的问题，你会发现全球人权组织形成了一个强力的联盟。假如有一人权人士遭到拘捕，这些组织会发表共同声明进行声援。它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揭露恶行，也会在人权人士被释放后继续支援他/她们，并尝试为被捕人士的家人提供帮助。然而，全球

¹⁷ Weiss, Jessica Chen, “Cornell University suspended two exchange programs with China’s Renmin University”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https://tinyurl.com/4smmvun2>.

工会对中国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部分国家的工会甚至支持中国政府。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全球的左翼人士必须从工人的角度理解中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工会，他们应团结起来支持我们。我们这些行动者并不期待特定形式的支持，是财政资助也好其他形式的声援也罢，我们都很欢迎。最重要的是真正地了解中国，这是关键，也是支持我们的起点。理解我们的工作，相信草根行动者，而非全国中华总工会等官方团体。

DR: 非常感谢你们三位的分享!

参考文献

AP News, “China Detains Grassroots Labor Activists as Disputes Rise.” *AP News*, December 22, 2015, <https://tinyurl.com/ymyhk3c9>.

Au Loong-Yu, “The Jasic Mobilisation: A High Tide for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4) (2018), 12–16.

Butollo, Florian, and Tobias ten Brink, “Challenging the Atomization of Discontent: Patterns of Migrant-worker Protest in China during the Series of Strikes in 2010.”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3) (2012), 419–440.

Dong Yige, “Does China Have a Feminist Movement from the Left?” *Made in China Journal*, 4 (1) (2019), 58–63.

Friedman, Eli,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Fu, Hualing, “The July 9th (709)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Legal Advocac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 (2018), 554–568.

Lee, Ching Kwan, and Shen Yuan,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 Lab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London: ILR Press, 2011), 157–172.

Liu Chuxuan and Eli Friedman, “Resistance Under the Radar: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s Food Delivery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vol. 86 (2021), 68–89.

Schmalz, Stefan, Brandon Sommer, and Xu Hui, “The Yue Yuen Strik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ur Unres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lobalizations*, 14 (2) (2017), 285–297.

Weiss, Jessica Chen, “Cornell University Suspended Two Exchange Programs with China’s Renmin University”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https://tinyurl.com/4smmvun2>.

推荐资料

Anonymous, “Mutual Aid and the Rebuilding of Chinese Society.” *Lausan*, July 7, 2020, <https://tinyurl.com/4sf2kbu6>.

China Labor Watch,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hina Labor Watch*, March 21, 2022, <https://tinyurl.com/4j2xwp2t>.

Chuang, “Social Contagion. Microbiological Class War in China.” *Chuang*, February 2022, <https://chuangcn.org/2020/02/social-contagion/>.

4

反抗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族歧视——亚裔离散族群的组织 and 跨越国界的团结行动

演讲者：Gigi Mei, Kimiko Suda, Shan Windscrip 和 JM Wong

主持人：Jule Pfeffer 与 Daniel Reineke¹

Jule Pfeffer (JP): 环顾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现存的种族暴力，煽动了右翼和法西斯政治的浮现。从公开的暴力肢体攻击，到语言上的微歧视，到结构性的歧视，针对全球亚裔离散族群的种族攻击有增无减。暧昧模糊的媒体报道也加剧了歧视性的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切合了冷战修辞和后殖民叙述。当然，种族主义的意识 and 歧视行为在疫情出现之前已经扎根社会，并与性别 and 阶级相联。与此同时，疫情成为了有色人种社群组织跨国活动、抗衡种族主义的契机。

今天的嘉宾包括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地的离散亚裔族群的行动者。通过今天的对谈，我们希望探讨在地的抗争以及实现跨国联合的可能。为此，我们提出如下问题：行动者大多参与哪些形式的反种族主义的组织工作？有哪些成功的例子？又面对哪些挑战？我们如何才能把在地的运动跟其他地区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以实现有色人种行动者及其盟友的跨国团结？

Daniel Reineke (DR): 容我介绍今天讲座的第一位嘉宾：Kimiko Suda 博士。Kimiko 是一名汉学家和社会学家，专注研究华语语系/亚裔离散问题、酷儿女性主义身份认同、以及移民们如何通过运行草根组织跟展现自己的文化实现赋权等主题。在 2020 及 2021 年，她是 korientation 计划旗下的在德亚裔的媒体赋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3 月 6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confronting-covid-19-racism>。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权的一员，² 并于 2011 至 19 年担任柏林亚洲电影节的总监。她刚结束了一项以德国新冠疫情为背景的反亚裔种族歧视的博士后研究。³

Kimiko Suda (KS): 首先，谢谢你的介绍，也谢谢你的邀请。我会先谈一下在德国针对亚裔族群的种族主义的特征。我同意 Jule 所说的，种族歧视并不是新冠疫情以后才出现的。欧洲针对亚洲、亚洲文化、亚裔身体的歧视性叙述早在十三世纪的旅游记录、小说、歌剧以及医学、生物学、人类学等科学书籍中已有踪迹可循。

政治框架方面，首先，必须提到德国在中国的殖民政治、德国参与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在 1898 至 1914 年之间在胶州湾的殖民地。较近期的事件包括纳粹政权对中国人的压迫。在 1944 年 5 月，汉堡有所谓的 Chinesenaktion，亦即是压迫中国人的针对性行动，⁴ 共 129 人被捕，其中很多遭到酷刑。大约 80 人被送到位于汉堡-威罕斯堡的强迫劳动营 Langer Morgen，其他人被送到汉堡附近的集中营 Neuengamme。

柏林围墙倒下、两德统一后，发生了两起至今让德国亚裔族群记忆犹新的事件：1991 年在霍耶斯韦达 (Hoyerswerda)⁵ 和 1992 年在罗斯托克 (Rostock Lichtenhagen)⁶ 的暴力排外事件。

² korientation 是一项（后）移工自主组织以及从亚裔德国人的观点对文化、媒体和政治进行批判的网络组织。关于 MEGA 计划详见 <https://www.korientation.de/mega/projekt-mega-2021>。

³ 关于这些计划的更多资讯请见：<https://tinyurl.com/37tbhvr7>; <https://tinyurl.com/4nda9czf>。

⁴ 关于 Chinesenaktion 的详情，请参阅历史学家 Lars Amenda 的研究：<https://www.lars-amenda.de/2021/05/13/chinesenaktion-13-mai-1944/>。

⁵ 霍耶斯韦达排外事件是发生在 1991 年 9 月 17 至 23 日之间的一连串针对来自越南和莫桑比克等地的移民工和寻求政治庇护者的暴力事件。霍耶斯韦达是位于德国萨克森州东北部的一个镇。排外攻击事件导致 32 人受伤，83 人被捕。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将受到影响的寻求庇护者转移至其他地区，众多合约工人因恐惧种族攻击而离开当地。在 1991 年，ausländerfrei（没有外国人）这个词语成为霍耶斯韦达暴力排外事件的等号。关于这个事件的详情，请参阅：<https://www.hoyerswerda-1991.de/>。

⁶ 1992 年 8 月 22 至 24 日之间，德国罗斯托克-列登哈根发生暴动，这是战后德国发生的针对移民的最为暴力的一次事件。寻求政治庇护者和合约移民工所居住的地方遭种族主义者扔石头和汽油弹。暴动到达高峰时，有多达数百名右翼极端分子参与，约三千多名旁观者围观叫好。

两德统一之后有好几起针对亚裔离散族群的攻击和谋杀，但由于时间所限，我只能提到主要的两起事件。

同时，在德国存在《模范少数族群》的迷思，我想这和美国及澳大利亚的语境非常相似。亚裔人口通常被德国媒体跟电影描述为安静寡言的、融入很得好的、或者是模范学生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被描述为罪犯、性工作者、无证人士。这些偏见使得亚裔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经常遭受区别对待。

在这个背景下，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出现了两个方面：如 Jule 一开始所说，部分德国报章、杂志、电视台利用殖民图片和叙述，将病毒注入文化和种族色彩。在 2020 年，我们可见在公众场所针对亚裔的语言和肢体的种族歧视案件有所上升。很多人打电话或写信告知我们他们的遭遇，德国联邦政府的反种族主义报告中提到了针对亚裔的歧视，此外，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向我们提到了很多类似案例。

除了非政府组织所接收到的资讯，我也参与了一项在 2020 年 10 至 12 月之间进行的研究，我访问了 700 多人，研究了 70 名参与者的日记。百分之五十的被访者说，在疫情期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歧视加剧。这百分之五十的人当中，有八成提到语言暴力等微歧视，有一成面对被吐口水、推撞等肢体攻击、三成面对结构性的排外情况，例如无法在诊所预约等。Korientation 认为，媒体报道对此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以前并没有那么多类似的报道，我们认为这些报道使得一直在发生的种族歧视浮出水面。

这一系列种族歧视事件，使得在德国约二、三十岁的亚裔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利用 #IAMNOTAVIRUS（我不是病毒）跟彼此产生联结，德文的写法是《Ich bin kein Virus》。在 korientation 的我们也支持网站《Ich bin kein Virus》⁷，这个网站由在德亚裔行动者发起，让人们匿名或以实名记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平台收集了很多的个案。这个平台不如美国

⁷ 网站链接：<https://www.ichbinkeinvirus.org/>。可惜的是，由于太多种族歧视的留言，留言功能已经关闭。

的《Stop AAPI Hate》⁸那样大型，但对德国而言，这个概念相对新鲜，也颇有成效。除了这个平台以外，还有更大的网络帮助社交媒体行动者定期见面、以 *korientation* 为平台组织活动。他们开始时都只是个别的行动者，但现在一同进行社交媒体行动。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政府跟非政府组织的邀请，让我们给他们做关于反亚裔种族歧视的演讲。当然，我们希望亚裔可以超越种族歧视的叙述。我们希望可以成为跟不同的族群联合起来一起进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哈瑙（Hanau）的枪击案发生后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起案件，一年前一名右翼分子枪击了九个人。此外，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在德国也有很大的回响。在 *korientation* 的我们抓紧机会谈论反亚裔种族歧视这个特定形式的种族歧视，同时谈论跨越不同族群的团结行动。

DR: 谢谢你，Kimiko。我们稍后会针对你的演讲内容，提出一些问题。现在就让我介绍下一位嘉宾 JM Wong。JM 是酷儿社群的组织者、医务工作者、政策顾问、作家以及宇宙爱好者。她现居于西雅图的原属于 Duwamish 族的土地上。她会探讨美国政治环境中的反华倾向和反共焦虑。

JM Wong (JM): 谢谢工潮的邀请，有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对话，实在令人兴奋。对于今天出现的针对亚裔的暴力，我有几个观点想要分享。我是一位在印第安原住民所说的龟岛——即美国——居住了 20 年的离散华人。我大多数时间都住在 Coast Salish 人民的土地上，即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长期以来，我组织废除警察、监狱、拘留所的各种行动。令我变得政治化的契机，是我作为医务工作者参与的劳工组织。

我想分享关于反亚裔种族歧视、跨国组织和我在西雅图的行动的四点想法：第一点是关于背景。最近很多人在谈论反亚裔暴力的加剧。有鉴于我们生活在越发碎片化的社会之中，我们如何才能拓宽我们的思维、思考现在在全美国乃至全球正在

⁸ 关于这项计划的详情，请参阅：<https://stopaapihate.org>。

⁹ 关于事件的英文详情，请参阅：Ewing, Jack, and Melissa Eddy, “Far-Right Shooting Shatters an Already Fragile Sense of Security in German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20, <https://tinyurl.com/5y63px6e>。

发生什么？我们生活在 Ruth Gilmore Wilson 所说的《有组织的混乱》¹⁰之中，多年以来，公共医疗系统的资金减缩。我认为所有在美国的人都经历了大型的情感操纵，一方面被告知新冠肺炎是非常吓人、致命的病毒，另一方面我们被催促着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失业率上升、越来越混乱的局势、流离失所的人——在美国和西雅图，很多人露宿街头，在谈论这一个时刻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新冠肺炎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我参与到很多互助工作之中，我认为互助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联结，从个人、社区及政治层面重构社会：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反抗？怎样做才能建立一个我们需要的社会：一个悉心照顾每一位成员的社会？有哪些结构性力量在妨碍我们重构社会？

关于跨国组织，我想特别提到新冠肺炎刚刚在美国开始肆虐时，我们在西雅图开展的新冠肺炎互助模式。这个模式把我们在网上和社区中的很多人团结在一起。这个模式源于我们与在中国和香港的盟友交流如何在疫情初期支援在中国的人，当时我们想为他们收集口罩。讽刺的是，不到一个月后肺炎在美国大流行、我们这边出现了口罩短缺。但是，多亏了我们在那段短暂的时间内跟国外的朋友探讨如何照顾远在故乡的家人，我们才能为后来在美国发生的疫情做好准备。因此，我希望探讨在碎片化和紧缩政策为背景下的社会里，草根运动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如何寻找资源、培养力量？

第二点是如何抗议反亚裔运动中我们的被消失和自我幼儿化。也许公开这样说会令一些人不高兴——我也曾经历公开的反亚裔话语，有人叫我滚回家。虽然并非肢体暴力，但仍令我痛心、造成创伤。这些暴力影响到我们的空间感。可是，我并不喜欢人们最近常说的口号《我们不会再沉默了》，因为实情是我们从来都不沉默！有种观点认为亚裔人一直以来都很被动，现在是我们奋起反抗的时刻。这些观点隐含把我们视为顺从、听话的模范少数民族迷思，无视我们的社群中很多亚裔人一直

¹⁰ 详见 Wilson, Ruth Gilmore, “Organized Abandonment and Organized Violence: Devolution and the Police” (2015 年 11 月 9 日的讲座), <https://vimeo.com/146450686>。

反抗，但当权者、政客视而不见。我们要如何反抗美国社会分配给我们亚裔的角色？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的思维漠视了几代亚裔的反抗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

在这一波反亚裔的暴力中，另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有哪些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当我们谈论亚裔群体时，谁的生命比较重要？我知道这里很多人都在做关于东南亚族群跟贫困的中国族群的工作。我所在的社区中也有人被驱逐出境。不久以前，西雅图发生了两起枪击案，两名亚裔遭警察枪击，但当权者没有说《这是反亚裔暴力》。只有当无家可归者、精神病患者、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作出横向暴力时，政府和警察才突然关心我们的安危。谈论针对族群的暴力时，我认为我们必须仔细思考所谓的《仇恨罪》如何把种族歧视问题变成施暴者的个人问题。

几代以来，黑人和亚裔族群之间一直有合作，亦一起组织过抗衡国家暴力的草根组织，但这些在关于针对亚裔的横向暴力的对话中全部被抹去。不知道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有没有听说过，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说《都是黑人在攻击亚裔老人》，这就是在试图抹去亚裔和非裔在废除监狱运动和组织中的紧密合作。非裔群体对亚裔被囚人士的支持远超亚裔对亚裔的支持。我的这些批判并非想否认我们都值得拥有人身安全，而是要问，亚裔群体如何思考安全问题，才不至于将我们亚裔视为这个国家无所不在的暴力的局外人？当警察枪击精神病发作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期望人身安全？面对这个国家对于原住民的种族灭绝，阶级暴力，对有色人种的压迫，我们如何要求国家的保护？我们都值得拥有人身安全，但我们要重新想象获得安全的其他方法——不用国家保护的方法。并且，我们要想办法推动整体的安全，而非只有亚裔拥有人身安全、其他族群仍置身危险之中。安全并非天降下来的，我们必须争取安全。

我想说的第三件事，是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和进步派中的种族主义，这一种种族主义在美国扎根多年，至今仍然肆虐。我分享了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¹¹，它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人的

¹¹ 详见 <https://www.imdb.com/title/tt9351980>。

种族歧视心态。这部纪录片拍的是一所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中国工厂，全片建基于中国工人很顺从，而与之对比，美国黑人和白人工人组织工会反抗肆无忌惮的中国企业。这部纪录片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将中国工人阶级脸谱化，抹除中国工人一直有组织起来反抗中国统治阶级的历史事实。这部纪录片将中国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并无任何差异或复杂性，表现出美国老式的种族主义。我倒是希望这些美国资本家和官僚感受一下中国工人阶级的愤怒。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中国工人反抗的视频，这些工人和他们平常描述在美中国人的面孔是如此的不一樣。我只是想他们知道，我们并非温和顺从的人，而是坚韧的反抗者。

最后，在疫情爆发的此刻，我想讨论一下亚洲和全球范围内对环境的极端破坏。这将带来更多不同的病毒，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极为极端，人口的移动亦非常极端。这些条件让病毒通过动物感染人类变得非常容易，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新病毒？我们必须动员、组织、捍卫我们的亲友和社群。要是这一趋势持续的话，会有更多反华情绪。在这一刻，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亚裔群体，如何才能参与到黑人解放运动和原住民主权运动中去？如何理解我们在这个国家中既是定居者、又是受种族歧视和剥削的族群？如何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反抗精神跟传统？在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如何建立家园的情感？如何抵抗《融入这个国家即等于忘本》以及将你对故土的关注视为异类的思维？

DR: 非常感谢你，JM。下一位嘉宾是 Gigi Mei，她在纽约生活，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平和人权教育硕士。她主要跟中国留学生、1.5 代移民、驻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社会正义行动者合作。

Gigi Mei (GM): 谢谢 Daniel 的介绍，也谢谢 JM 提供的背景，因为我也会谈论美国的问题。我觉得 JM 做了一个很棒的介绍，描绘了亚裔族群——尤其是离散族群所——身处的环境和他/她们的经历。我想深入探讨中国留学生、中国行动者、和部分 1.5 代移民的经验。我会用个案作为例子来探讨美国的疫情，疫情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大众对这些问题的反应。

一般而言，中国留学生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背景，比较不熟悉美国的社会正义问题。尽管他/她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面对歧视，但歧视的程度是没有那么公开和暴力的。但疫情改变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前总统川普把新冠肺炎称为中国病毒。亦如JM所说，疫情初期，在美国疾控中心呼吁大家戴口罩前，很多亚裔离散族群和留学生就已经戴上口罩进行自保。当时，很多留学生和我的朋友都在讨论我们应否戴口罩以保障安全，因为病毒已经在中国和意大利肆虐。但在美国，一戴上口罩，就会成为肢体暴力的目标，所有人都会把你视为带病毒者。我想这是很多留学生第一次意识到被美国的种族主义针对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在校园或其他城市工作时，从未有这样的经历。这些事件令不少留学生开始关心政治，思考什么是种族主义。这个背景有助理解在 George Floyd 事件引起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抗议时，为什么有一些亚裔离散族群发起了《中国人支持黑人》运动。¹² 当他/她们亲身经历过语言和肢体上的种族暴力之后，他/她们明白了种族歧视有多么普遍、不仅只影响他/她们。在此之前，种族暴力已经发生在戴头巾的回教徒身上，发生在很多有色人种的社群身上，发生在黑人、拉丁美裔人和原住民身上。我认为，疫情期间的经历，让留学生理解了美国的有色人种的经历，并对他/她们产生了同情。

我也谈谈一下#ChineseForBlackLives（中国人支持黑人）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在美国的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和离散行动者发起的。身为行动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关心中国事务的人，他/她们自然而然地关心社会议题。当《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整个美国风行时，他/她们发现在中国也好、在海外说中文的社区里也罢，没有太多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你们可能知道，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是微信，上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通常只谈论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暴力层面，例如暴动和抢劫，而不是运动的正面影响，或者人们上街的原因。因此，很多女权主义者开始在群组讨论这些议题，并思考我们可以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做些什么。一群女权主义者很快地动员起了大家、组织了活动，她们进入华

¹² 详见：<https://www.instagram.com/chineseforblacklives>。

人或亚裔聚居的地方，和当地社群对话、和唐人街的中国商铺对话。她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同时帮助我们的社区发展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抗种族主义的方法。我们制作了很多海报、标语，分派给各个中国商铺和商家。我们也拍照并放上社交媒体。我们不仅为抗议活动，也为个别商户创作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的团结标语。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活动颇为成功。

我个人比较晚参与#ChineseForBlackLives 运动，因为我以为肯定有华裔或亚裔美国团体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团体是其中首个做这一类工作的团体，我认为这反映了留学生能参与到第三代或多代亚裔移民组织的活动中，或与其合作。在跟他/她们对话的过程中，有很多第二代移民（即亚裔美国人）组织跟我们说，他/她们希望有中文版的内容，因为他/她们主要使用英文，不太会说中文或其他亚洲语言，也不会跟家人或祖父母说中文。这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懂中英文的留学生一起合作。不止留学生有做出贡献，本地社群也有帮忙。唐人街的人主要说广东话，不会读简体字的海报，不会说广东话的行动者无法和他们沟通。这时候，会广东话的朋友就能帮上忙。他/她们帮我们将简体字的海报改为繁体字，也帮忙联系之前未联系过的族群。

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仍然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种族主义人为建立了很多的隔阂，令不少人感到《我们只不过是留学生，华裔美国人组织的活动和我们无关，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但种族歧视不分国籍。走在街上，就算我没有把中国国旗或美国国旗穿在身上，人们看见我就觉得我是亚洲人、是女人，对不对？他们根本不管你事实上是不是美国人。很多东南亚人虽然不是来自中国，却被种族主义者辱骂、让他/她们滚回中国。这些经历让很多人明白了一点：不管你从哪里来，你们都受到扎根在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的影响。和JM之前说的一样：来自不同背景的我们对抗的是同样的制度，而不是彼此。种族主义制度想让我们内斗，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或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东西。制度试图影响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跟彼此合作，以削弱跨社区的团结力量。因此，创立沟

通渠道、创造合作机会、创造对话机会，就是抗衡种族主义制度的方法。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者沟通交流。

DR: 谢谢你。现在，让我们欢迎 Shan Windscrip, Shan 现居于墨尔本，是墨尔本大学的博士生、行动者以及教育工会组织者。她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日记的历史，她的博士论文马上就要写完了。她会为我们讲解澳大利亚的种族民族主义和她的经验。

Shan Windscrip (SW): 谢谢工潮，我也想向其他几位嘉宾的讲解表示感谢。我从你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也希望在讲座结束后继续与你们保持联系。首先，我想点出我身处的国家建立于从原住民手中偷来的土地。我身处的城市叫墨尔本，属于 Kulin 国族的 Wurundjeri 和 Boonwurrung 人民，他们从未同意移交土地的主权。

老实说，自此进入读博的最后阶段，我就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所以我会说一下我在 2020 年做过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挺活跃的。我想先给你们一些关于澳大利亚的背景信息。在 2020 年 1 月，当新冠肺炎病毒刚刚开始进入澳大利亚的媒体话语时，这个话题立刻被种族化了。不久以后，疫情导致国境封闭，特别是中国人不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当时开始出现针对看起来似乎是中国人的种族暴力，东南亚裔的人也有很多成为了暴力的受害者。新冠疫情加剧了原有的种族暴力、中美冲突以及澳大利亚的反华情绪。¹³

我想强调新冠了澳大利亚引起了一种特定的种族主义的形式或结果，即国籍和国境将澳大利亚的一百万临时移民排除在社会保障系统之外。这包括了大量留学生、背包客、无证移民、难民、寻求政治庇护者。随着 2020 年 3 月全国锁国，澳大利亚发生了什么事？商户倒闭、工人失业，原来生活状况岌岌可危的工人所受的影响更深。政府推出一系列财政援助计划作为回应。可是临时签证的持有人与无证移民无法取得任何财政援助。

¹³ 详见 Ross, Kaz, "China and the Australian Far Right." *The Interpreter*, January 29, 2021, <https://tinyurl.com/y8wd2c7w>。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更在4月初回应批评时称，如果非居民无法承担留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费用的话，就应该回到自己的故乡。可是那时候边境已经被封闭，他们根本无法离开澳大利亚。移民工人和留学生受疫情影响更深。虽然他们往往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却无法享受任何政府援助，因此在财政和住房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

如同Kimiko所说的一样，疫情以来出现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并没什么好让人惊讶的，因为种族暴力并非什么新鲜事。它是的地缘政治为背景，由深入人心的结构上的以及思想上的种族主义所推动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建立在种族灭绝及掠夺之上的殖民国家，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扎根在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之中。更近期的，自2016年起，尤其是在2019年左右，随着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的升级，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影响力》的霸权话语。中国留学生成为被羞辱的目标，被人用诸如《中共间谍》、《摇钱树》、《被洗脑的爱国学生》之类的负面词汇形容。中国留学生的英文水平备受批评，被指责降低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水平。疫情的爆发宛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立刻激活了历史悠久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了所谓国家安全的危机。在这样的氛围中，恐华意识、民族主义、国境意识形态被常态化，加剧了这个国家的极右和法西斯主义运动。

现在，我想说一下我们组织对抗澳大利亚的种族民族主义的两个渠道。正如我所说的，我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大学之中。我们组织的宗旨在于建立跨国界的团结，鼓励对抗权力和霸权话语的政治论争。我们深信，通过分享我们共同面对的不稳定与压迫，以及并肩抗争，我们能够化解不同族群及个体之间的隔阂。

第一个渠道是草根工会。工会是抗衡种族主义的强有力的方法。种族主义会蚕食工人间的团结，而正因为工会是为所有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它非常重要。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工会的抗争是超越某个工人团体的片面利益的，它是建筑在对抗全世界的剥削和不公义这个原则之上的。我们有一个关键的组织原则是利用工会这个组织来挑战工会内部的种族主义。例

如，在 2019 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了一部名叫《摇钱树》的纪录片。该纪录片传播了种族主义的反移民及经济民族主义话语，认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越发依赖留学生和他们所交的学费。留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被描述为不受欢迎的、走后门的移民，他们往往能力低下、英文程度不高、破坏澳大利亚的文化和价值。我们动员学术人员和工会成员发表公开信，谴责这部种族主义的纪录片。我们认为，问题并非出于留学生，而是在于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变得越发企业化、大量雇佣学术临时工。节目播出的 48 小时内，我们的公开信已经收集到全国 160 多个联署签名。不久以后，我们发动校园集会，抗议大学仰赖临时工制度牟利。超过 70 名抗议者加入这个抗议，和留学生一同抵制这部纪录片。留学生们在抗议这部纪录片的同时，抗议大学剥削员工。一个更近期的例子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大学被临时雇佣的学术工作人员要求工会向大学提出为移民工人和留学生发放财政援助。

在我结束我的讲座前，我希望很快地谈一下第二个渠道，也就是在 2019 年我帮忙组织的公共参与计划。在香港的抗争运动发生时，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利用这场运动推动他们的保守右翼政治。在公开的论述之中，他们尝试利用国籍离间不同族群的人，把香港人和中国内地人描述成本质上有着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两群人。我们相信，国际社会若想对香港抗争运动表示团结和支持，就必须积极拒绝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从我的教学经验中，我得知很多内地人其实支持香港的运动。为了回应这种离间的话术，我们与当时成立不久的流伞合作，举行名为《跨界团结》的线上讲座，¹⁴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内地）的学生、学者与行动者。我们的目的是重新思考界线应该画在哪里：我们不希望给强调中港两地文化差异的排他性论述更多注意力，而是希望促进工人和边缘族群的团结，一起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压迫。我们不希望用所谓的种族或民族来定义不同的社群。这次线上讲座的讨论非常热烈且具启发性，从中产生的

¹⁴ Windscrip, Shan, Promise Li, and Jimmy Yan, "Uniting Beyond Borders: A Lausan Webinar." *Lausan*, December 4, 2019, <https://tinyurl.com/39ty4bfa>.

新的跨界讨论和联结至今仍然维持着。我们经常组织读书会，以今年为例，我们仍与流伞合作举办国际读书会，开放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和行动者参与。这就是我想介绍的两种组织方式。谢谢。

DR: 谢谢你的分享，Shan。我们收到了好几条与 Gigi 提到的组织工作有关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先从这些问题开始。一位听众说：《你好，谢谢你分享有关#ChineseForBlackLives 的宝贵组织经验。我有几个问题：这些组织工作仍在进行中吗？要是没有的话，有没有什么后续行动或战略的改变？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去年夏、秋天的时候，这场运动的精力十足，但最近似乎劲头式微。当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我们要怎样继续进行反种族主义的工作呢？谢谢。》

GM: 我想同时回应两条问题，因为这两条问题与我们组织工作的本质有关，并与由志愿者组织的运动及体制化的组织之间的差异有关。去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组织这个运动并得到热烈的回响，主要是因为学生在放暑假，有时间当志愿者、进入不同的社群游说。很多留学生在春假结束后，因各种原因回家，所以运动的势头开始减弱。因为中美的地缘政治，也因为疫情和校园政治，很多人现在身处中国，进行远距离线上学习。根据美国海关数据，相对于 2019 年，近期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人数下降了近九成之多，2020 年入学的新学生的人数下降了三到四成。因此与去年夏天相比，今年大量留学生离开了美国。新学期开始之后，他/她们忙着学习、工作，没时间参与我们的活动。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主要依赖志愿者的帮忙，而没有稳定、专职的员工，因此我们没有太多资源和能力跟进运动并跟社区保持长期的互动。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主要以回应当时的热点议题，并且很去中心化。我们制作了行动工具包，包括海报、读物、解释重点等。这些资料都放在谷歌文件夹中，谁通过社交媒体联络我们、跟我们说：《我想跟我社区的中国商家倾谈》，我们就把文件夹分享给他们。文件夹里有他们所需的一切文件，人们只需打印海报、标语，找个朋友一起进行工作，不需要特别地组织起来，实行起来很简单。现在又有新一波反亚裔的暴力行为，因此我们希望继续进行反种族主义的

工作。去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我们也有参与其中，我们都很希望继续这个重要的对话。我们这些组织者一直有在讨论如何保持并继续推动运动的士气，以及如何继续推动关于种族正义的组织工作。

DR: 谢谢你。Kimiko，你提到去年在哈瑙发生的种族谋杀。你有没有与受到种族暴力所影响的社群合作、进行组织工作？你能否就这一点多谈一下？

KS: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 JM 的演讲。我也看了《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我的想法跟 JM 一样。我除了在 korientation 工作多年以外，同时也是劳动世界这个组织的成员。¹⁵ 现在由于疫情和政治原因，劳动世界难以继续工作，但几年前，这个组织把在同一个企业工作的中德工人聚到一起，让他们面对面对谈、诉说他们彼此的生活，以及讨论如何进行跨国组织。我提起这个，是因为跨国的草根工人组织确实存在。

关于 Daniel 所说的：没错，我们有与其他社群合作，但不仅因为暴力事件的发生。例如，现在我们正与在德黑人群体合作，希望在德国培育起纪念殖民政治的受害者的文化。在很多方面，在发展去殖民战略方面，在德的黑人群体是德国的先驱。¹⁶ 我们希望在柏林的帝国殖民部树立一个纪念碑，但不知道要多久之后才能做到。此外，我们与其他社区组织的代表合作，进行了重访柏林围墙历史的博物馆计划。这项计划从两德统一后，后移民的观点出发，同时希望建立反种族主义的记忆文化。为了将这观点加入现在的博物馆导览内容中，我们邀请年轻人发展关于柏林围墙历史的新内容，并在经过训练之后成为博物馆讲解员。这个计划中同样有在德黑人群体的加入，他们来自 Romn*ja 和 Sinti*zze 社群。此外，也有来自德国土耳其人群体的加入。直少在柏林，我们在很多不同方面尝试跟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互动。当我们被邀请出席大型活动——例如德国政府或其他机构邀请我们时——我们一定会问：《其他这些社群的人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到邀请？》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有这

¹⁵ 关于该计划的详情请参阅：<https://www.forumarbeitswelten.de>。

¹⁶ 例如可参阅“Dekoloniale”计划：<https://www.dekoloniale.de>。

样做。当然，所有跨群体的计划都会有冲突，因为往往要争夺资源和曝光率。但我及我们这个圈子里志同道合的人都认为：无论何时都要尽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努力去跟彼此沟通，不要让跟我们进行的计划无关的事情影响到计划本身的施行。

DR: 非常谢谢你的回应。下一条问题是问JM的，但如果其他嘉宾对此有想法，非常欢迎你们一起回答：《你好，我想请各位嘉宾多谈一下在海外的中国人的阶级差异。我们要如何在海外的中国人群体之间建立阶级意识，让中国人与当地的边缘族群团结起来？》

JM: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跨太平洋互助网络中一直有关于这个问题进行对话。¹⁷ 跨太平洋互助网络是我参与其中的一个位于西雅图的组织。美国神话一直存在，世界各地的人多多少少都相信移民神话。但当移民来到美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霸权，这让人们学到真实的、扭曲的美国历史。身为组织者的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我们需要发展另一套介绍龟岛的历史的方法。大众所不知道的历史，唐人街的历史、东南亚难民的历史、原住民的抗争史、黑人的激进传统……所有这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霸权建制，取代人们因被灌输而熟悉的国家霸权？

我亦认为应该对抗社群中的阶级和性别差异，这是一个谁能代表社群发声的问题。为什么唐人街餐馆的工人不能代表社群，而要一些较富裕地区出身的人代表他们？身为组织者的我们有责任让按摩店女员、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拘留的无证留在美国的中国人们发声。这些人的经验通常没有人谈论。要如何反抗中国社群之中的阶级霸权呢？这个时候，留学生和第二、三代中国移民之间的合作显得特别宝贵。留学生可以熟练使用中文，而第二、三代中国移民熟悉美国社会的规则。我们应该多多鼓励这样的活动，分享不同社群如何进行合作的经验。

¹⁷ PARISOL 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左翼的离散群体，由香港、台湾、中国离散族群组成，主要集中于本地及国际团结、社群建立、文化政治学习、废止运动和反种族主义工作，详情请参阅：<https://parisolnet.wordpress.com>。

GM: 受JP所说的所启发，我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关于在美国一个人数量虽少但声音非常洪亮的团体：中国右翼及保守派。这些人支持川普，在他当选时特别受注目。如同JM所说，在美国的中国人群体非常多元，既有教育程度高的中产阶级，他们往往因为个人利益或反共情绪而支持川普；也有大量属于工人阶级的无证人士，他们努力工作以求三餐温饱。这两组人的差异极大，前者不仅伤害后者，也因为他们有能力主导微信上的内容，而误导了很多在中国生活的隶属工人阶级的人。前者所制造的假新闻比真实的新闻传播的要快。

DR: 谢谢。我想问一个关于大学情况的问题。也许Shan可以回答以下问题：《最近，伦敦大学举办了一场演讲，演讲者是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亚裔学者。他认为‘去上海’这个动词或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并非种族歧视。认为这些话语是种族歧视的人，是他们自己太敏感了。亚裔教授在国际论坛上作出这样的言论，到底亚裔留学生怎样才能在大学里头感到安全呢？》

SW: 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大学里头实在令人遗憾。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澳大利亚。不管是谁都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不管他是不是亚裔人。留学生不应该把这口气咽下去。我认为，关键时要挑战这样的种族主义论述，不管言论是不是由亚裔教授所提出。例如，在我们大学里有讲师在改作业时做出了这种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歧视性言论，这些讲师并不都是白人。最重要的是，不管说话的人的国籍跟种族，我们都要反抗这样的偏见。当然，不论身在何处，很多中国人、香港人都可能无意识地复述并加固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用加固种族主义言论的方式来反抗种族主义。若有当地资源，例如工会、学生会、职员工会等，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应该报告给它们。

DR: 谢谢你，Shan。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在世界范围内组织活动和建立人脉的问题。我想邀请Kimiko首先作答，但欢迎所有人分享你的想法。Kimiko，根据各个族群的现况，你认为哪种形式的跨国组织是必须且可行的？

KS: 首先，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们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行动。这样可以把身处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彼此分享资源。翻译文件很费时，如果有更多人能一起做，会更高效。我注意到有一些想法是被不同的社群共享的。例如，如果我可以收到简体和繁体中文的传单、让我跟德国的社群分享，那我会感激不尽，因为现在我们这边没有人做翻译工作。有如，如果我们举办电影节，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展示其他社群推荐的电影，也希望能推荐电影给你们。这一类资源共享是我们能做到的非常实际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或许有语言障碍，但这不应该成为阻止我们合作的理由。我还有另一个想法，不知道你们是否认同：我们可以一起联系联合国或其他跨国政治组织，要求他们就针对亚裔群体的暴力问题表达立场。如果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政府不愿意批判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话，通过国际组织施压可能有一些作用。在听完各位正在从事的运动后，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SW: 我们应认识到人们面对的是环环相扣的暴力系统，每个人在这个系统中受到伤害的难易程度都不一样。我们在组织大家时，应该清楚指出这一点。不论你是不是留学生，不论你身处哪个阶层，我自己的组织一直以来秉持这个原则来组织人们。我们组织里头有学生虽然能移民到澳大利亚、并被视为是中产阶级，但他们仍然做送餐工作，仍然面对这个国界的种族问题，面对岌岌可危的劳工条件。他们在餐厅里受老板剥削，时薪仅仅 3 澳元。这反映了剥削系统是如此的环环相扣，我们应该对抗这个系统，而不是想《这些有钱的学生来到澳大利亚留学，他们这么有特权，为什么我们要帮他们？》我们与墨尔本的移民工中心合作，捍卫他们的权益，也帮他们追回了被盗取的薪资。

我们该做哪一种的跨国组织呢？我想邀请所有感兴趣的人参加我们每月一次的国际读书会。我们与流伞合作，邀请来自全球的学者和行动者阅读与当代问题相关的读物。我们组织的第一场读书会是关于如何将亚裔离散族群这个概念复杂化。

GM: 我也可以分享几个仍在进行当中的计划和活动。例如心声计划，前称微信计划。¹⁸ 这项计划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由耶鲁大学的几个学生发起。他/她们草拟了一封写给父母的信，阐述了美国反黑人的种族主义历史，以及他们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原因。这封信大受欢迎，广为流传。他/她们认为这一类内容需要有更多的空间，让更多人读到。但由于他/她们的书信是用英文撰写的，所以他/她们与很多中国留学生合作，把信件翻译成中文、分享到微信上。

在微信上有另外一个反歧视的群组，成员包括内地的学者和维权人士，主要针对内地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他/她们经常举办网上讲座，邀请居住在广州、广东的非洲人分享他们每天面对的歧视。

还有一组人非常关注反黑人种族主义如何在跨国语境中展开。这些人很熟悉反黑人种族主义的漫长历史，并有在不同类型的西方学术机构中学习过的体验。他/她们与远在中国的朋友和行动者联系，一同撰写具有批判性的文章。例如，他/她们批判了内地最大型的全国性节目春节联欢晚会中出现的把面孔涂黑、假扮黑人的小品。简单来说，有好几个团体试着在不同社群之间提升对种族主义的批判意识。同时也有一个名为《反种族主义病毒的中国人》的团体，¹⁹ 他/她们是身处英国的行动者团体，做了很多反歧视的工作。他/她们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JM: 我充满希望，也希望进行跨国联结，特别与在欧洲的行动者联合起来。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时刻，国际资金来自中国，劳工也来自中国。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都面对这些矛盾。由于中美角力、中欧关系的紧张，矛盾只会加剧。另一件我在想的事情是，掌权阶级一直在做跨国组织，例如八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视这些机构为常态。那要如何抗衡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跨国的行动能扎根于亚洲的实际状况，扎根于中国的抗争，扎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们跟中国的劳工有一定的联系，但习

¹⁸ 详见：<https://www.xinshengproject.org>。

¹⁹ 详见：<https://www.instagram.com/chineseagainstracistvirus>。

近平政权和疫情导致这些关系出现裂痕。那当前要如何重新理解、想象这些关系？又要如何抗衡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这些问题，不论是身处何方的中国离散群体都必须考虑。这是关于政治取向的问题，我们相信何种政治？我们面对何种当地特有的障碍跟挑战？如何追踪中国工人的动向？很多唐人街的按摩店女工原来在深圳的工厂工作，她们后来来到了洛杉矶、又来到西雅图。不论她们到欧洲、中国、非洲还是北美，伴随着工人阶级的迁徙，我们如何才能持续性地支持她们、追踪她们的动向？继续保持跨国联结、继续支持工人阶级的活动，这是我希望我们能继续做的。

DR: 谢谢你们！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可以成为让行动者们齐聚一堂的契机。活动虽然已经进入尾声，我们希望来自不同社群跟国家（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可以保持下去。

参考文献

Ewing, Jack, and Melissa Eddy, “Far-Right Shooting Shatters an Already Fragile Sense of Security in German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20, <https://tinyurl.com/5y63px6e>.

Wilson, Ruth Gilmore, “Organized Abandonment and Organized Violence: Devolution and the Police” (2015年11月9日的讲座), <https://vimeo.com/146450686>.

Ross, Kaz, “China and the Australian Far Right.” *The Interpreter*, January 29, 2021, <https://tinyurl.com/y8wd2c7w>.

Windscript, Shan, Promise Li, and Jimmy Yan, “Uniting Beyond Borders: A Lausan Webinar.” *Lausan*, December 4, 2019, <https://tinyurl.com/39ty4bfa>.

第三节

中国边沿

5

恐怖资本主义：被囚禁在中国 西北地区的维吾尔人

演讲者：Darren Byler

主持人：Ralf Ruckus¹

Ralf Ruckus (RR):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一系列在线讲座。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新疆。在今天的演讲人 Darren Byler 发言之前，我想简单地就新疆问题做几点评论。此外，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左翼视角分析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又称新疆——发生的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一地区的官方称谓，而一些维吾尔人将这个区域称为东突厥斯坦。新疆的面积和伊朗差不多，人口大约为两千五百万，其中近 50% 为维吾尔人，40% 为汉族人，此外还有少数的哈萨克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农业是新疆的重要经济支柱，主要的农作物包括棉花、水果和蔬菜。此外，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两个产业都是随着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力投资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产业的发展导致了新一轮的汉人移民潮，深刻改变了新疆的人口构成。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由于通往中东和欧洲的运输线路横穿新疆，这个区域一跃而起、成为了国际交通枢纽中心。简而言之，新疆在经济、政治跟军事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定居殖民主义以及汉人对维吾尔人的打压，使得维吾尔人长期存在不满。自 2014 年以来，汉人对维吾尔人的管制进入了一个更为严酷的阶段。在一系列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开展《反恐的人民战争》以图彻底根除伊斯兰恐怖主义。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1 月 9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on-northwest-china-xinjiang>。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数十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他们的一举一动被严格限制。自 2017 年以来，反恐的人民战争不断升级，致使一百万以上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跟监狱之中。中国借着这场反恐运动，成为了一个全景警察国家。

我们注意到，迄今为止，左翼人士并没有积极谴责维吾尔人以及新疆地区其他的穆斯林信众遭到的压迫。这一沉默的现状，跟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得到的热烈回应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有一些人从人权角度对强迫劳动进行批判，但我们尚未看到从左翼角度出发的对资本主义跟文化灭绝、基于性别跟种族的压迫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我们忍不住想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特地邀请了 Darren Byler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

Darren 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亚洲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他的研究关注的是无孔不入的监控和数字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剥夺了中国跟东南亚的穆斯林群体的权利、财产跟自由。他的第一本著作《恐怖资本主义：被剥夺的维吾尔人与阳刚之气——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将于今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考察了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化、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权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织。此外，Darren 正在写他的第二本著作《再教育的技术》。这本书的分析对象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对少数族裔的监控技术。Darren，欢迎！

Darren Byler (DB): 非常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参加我的讲座。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想首先介绍几个关键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西北地区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是如何被物理空间的以及数字媒体的围困彻底改变的。我进一步指出，这种围困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把对维吾尔人的围困，跟世界各地对恐怖主义的讨论以及新型殖民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

为了理解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回到 1990 年代，也就是当中国开始逐步向西方开放的时期。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一步步转向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推动这一新型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

资源跟原材料。因此，中国政府开始思考从何处能够获得石油和天然气。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有 20%来自于新疆。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地区修建包括输油管 and 公路在内的硬基础设施。伴随着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数以百万计的汉人来到新疆定居。²虽然早在 1950 年代就有一些汉人在天山以北生活，天山以南一直是维吾尔人的聚居地，当地有 90%以上的人口为维吾尔人。这个现象随着汉人在 1990 年代大规模移居到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区被打破。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出现了一个新的服务经济，专门用来服务我上面提到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采。伴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圈地的现象日益普遍，当地人民能使用的空间越来越少。这个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伴随着围墙、道路的建立，人们从原来生活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马克思详细分析过这种现象在 18、19 世纪的英国是如何发展的，这跟 1990 年代在新疆发生的现象非常相似。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他们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自由的第一印象。由于很多时候维吾尔人的土地是被强制夺走的，他们等于是被迫进入市场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农业生产已经不再能维持他们的生计，维吾尔人必须选择自己是要挨饿，还是要找工作、赚薪水。他们想要在工厂务工，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导致他们越来越绝望。在这个过程中，维吾尔人被迫变成了无产阶级。

在新疆出现的情况，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这指的是把本不属于经济或市场的物体突然变成一种商品的过程。新疆的自然资源也好，维吾尔族劳动者也罢，都可以通过原始积累的角度理解。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情说明了原始积累并不是一个发生在 18 或 19 世纪的英国的、跟当代世界无关的历史事件。相反的，资本原始积累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一直在发生。种族资本主义的研究非常清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被边缘化的人群在资本主义向新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往往最受其害。与此同时，在新疆发生的一切，本质上是一种定居殖民主

² 请见 Becquelin, Nicolas, "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he China Quarterly* 178 (2004): 358-378.

义。维吾尔人跟汉人有语言及信仰上的差异，他们世代生活在这片被汉人逐步占据的土地上。新疆的状况并不只是 David Harvey 所说的《通过剥夺他人的财产来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即一种基于阶级的、富人对穷人的压迫。而新疆不仅仅是如此，它更像是《通过从文化跟制度上消灭并取代他人，来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也就是说，维吾尔人的生命世界正在逐步被其他东西占领跟取代。

李静君对当代香港的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香港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殖民地的。³ 李静君在研究中指出，通过观察一个地区有多少制度已经被外人接管，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否已沦为了殖民地。当一个地区的教育、金融以及法律系统全部被外人接管，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区已经被殖民了。对维吾尔人来说，这种制度的侵蚀始于 2000 年代。从那时起，汉族定居者开始接管原本由维吾尔人管理的机构。汉人取代维吾尔人，开始管理银行的贷款业务。维吾尔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从事银行内部较为不重要的工作。原本在学校教书的维吾尔族教师，被迫成为门卫。原本在家照顾孩子或老人的人，被迫成为清洁工人。维吾尔社会的基础制度在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大型机构上，也体现在维吾尔社会得以运作的核心机构上：维吾尔家庭开始分崩离析。

2010 年，数字基础设施首次以 3G 网络的形式出现，这似乎给维吾尔人带来了一条出路。他们开始寻找结识其他维吾尔人、组建社群的方法。他们开始使用一个名叫微信的应用程序，这个程序使得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用维吾尔语跟彼此交谈。他们也开始第一次跟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建立联系。在数位革命发生之前，维吾尔人能接触到的穆斯林群体很有限，但现在他们可以跟远在土耳其的穆斯林信众结识。这个契机使得维吾尔族社会出现了文化跟宗教的复兴。

在 3G 普及之初，人们并不知道智能手机不仅仅是探索世界、保持私人联系的设备，它们也是追踪跟监视的设备。2017 年以来，中国的私营科技企业利用智能手机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一

³ 请见 Byler, Darren, “Infrastructural Power, Hong Kong, and Global China.” *China Made Project*, Brief #6 (October 2020), <https://chinamadeproject.net/china-made-brief-6>.

个人在智能手机上做过什么，成为了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的标志。这些数据一旦被滥用，可以被当作拘留平民百姓的证据。现有研究显示，数据密集型产业与官方机构（尤其是警方）的合作，推动了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发展。当代中国的一些私营跟国企公司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方面——例如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们因此跟美国的同类公司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虽然包括亚马逊和 IBM 在内的公司也与美国政府合作、进行数据的采集，但美国或欧洲发展的这套监控系统根本无法跟中国的系统相提并论。美国的系统使得大量没有合法签证的人以及观察名单上的人在地下经济中谋生。⁴与之对比，在新疆，中国的监控系统迫使大量维吾尔人从事强迫劳动。

作为扶贫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向新疆地区转移了大约 100 万个跟纺织工作相关的岗位。由于新疆地区的棉花产量占中国棉花总产量的 84%，将纺织业搬迁到新疆是很有道理的。很多被关押在再教育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被强制送进这些工厂里做工。潘毅对中国华东地区的农民工的研究，对我影响非常大。潘毅分析了在华东地区常见的《宿舍劳动体制》，即工作单位安排农民工住在工厂附近，使得工作空间跟住宿空间高度重叠。新疆的情况和宿舍劳动体制类似，但更为严酷。维吾尔族的劳工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被强制要求住在工作单位附近、不准擅自离开。这个状况跟劳教所颇为类似。

工厂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严密监控着，摄像头无处不在。就连工厂外面也有监控设施，例如工厂入口的检查站。为了确保维吾尔劳工认真、高效地工作，汉人管理者一再恐吓维吾尔人如果他们做得不好，就会被送回再教育集中营里。那些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被送回集中营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依靠这样这样的监控跟恐吓，新疆形成了我在我的著作中所说的《再教育劳动政权》。新疆当地的官员在 2018 年跟 2019 年连续两年指出再教育集中营是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再教育集中营一跃而起，成为了跟石油和天然气一样重要的产业。

⁴ 请参考如下著作：Jefferson, Brian, *Digitize and Punish: Racial Crimin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

上述这一切，都是借着反恐的人民战争这个运动发生的。恐怖主义这个概念是在 2001 年之后才进入中国的。虽然有些时候恐怖主义被拿来形容藏族人或香港人，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信众经常被画上等号。虽然中国的穆斯林信众甚少，他们却被视为威胁国家稳定的第一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放眼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论述跟种族化密不可分。对恐怖主义的批判往往伴随着对非我族类的《他者》的塑造。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国家有权拘留这些《他者》。在欧美语境中，反恐政策导致很多人被流放跟驱逐，这些人被迫在社会底层谋生。⁵但是新疆的案例告诉我们，当反恐政策跟新型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它导致的不只是流放：它彻底改变了特定群体的生命轨迹，创造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无产阶级。新疆的情况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恐怖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分支。特定的人群因为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而被拘留、被迫成为劳工。我先说到这里，非常期待跟大家讨论。

RR: 非常感谢！你的演讲非常有趣。有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跟维吾尔人的抵抗，或中国政府所说的新疆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相关的问题。维吾尔人的抵抗对中国政府真的构成了威胁吗？你所描述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偏执的汉人中心主义的表现，还是针对某些维吾尔人发起的恐怖袭击的回应？

DB: 确实发生过由维吾尔人组织的暴力袭击事件，有一些事件甚至符合国际上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例如 2014 年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以及 2013 年的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案。此外，在新疆本地也发生了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事件是由少数人策划的，并且参与者的意图或动机并不总是那么清楚。有些恐怖袭击者似乎是为了发泄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不满才出此下策。我并不是想洗白暴力袭击行为。我认为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权享受和平的生活，我们不能纵容暴力行为。但是，中国政府跟新闻所

⁵ 见 Roy, Ananya, "Racial Banishment," in *Keywords in Radical Geography: Antipode at 50*, edited by Antipode Editorial Collective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9), 227–230, 以及 Chen, Chris, "The Limit Point of Capitalist Equality: Notes Toward an Abolitionist Anti-racism." *Endnotes*, 3 (2013), 202–223。

描述的新疆的恐怖主义，跟我们谈到的极少数的恐怖袭击事件有本质区别。⁶大多数被描述为恐怖主义的事件是发生在维吾尔人（以男性为主）跟当地警察之间的冲突。举例来说，维吾尔人聚集在一起抗议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并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为了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枪荷弹的警察往往采取过激的、致命的暴力手段。在随后的新闻报道跟政府通报中，类似这样的事件被贴上了恐怖袭击的标签。⁷大多数发生在新疆的冲突都是爆发于维吾尔族的老百姓个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而不是针对其他平民百姓的。因此，这些冲突并不符合恐怖主义的标准。

简而言之，在新疆策划暴力袭击的是极少数人，或许有几百人、一千人。这不应该成为限制 150 万人的人身自由、污名化整个维吾尔族的理由。中国政府的反恐政策是根植于伊斯兰恐惧症之中的过激反应。汉人们非常害怕维吾尔人会发起暴力袭击，即便有很多维吾尔人既不信仰宗教、也不支持暴力，他们仍旧一概被视为危险分子。此外，掠夺了维吾尔人的土地的汉人非常担忧有朝一日维吾尔人会群起反抗、夺回自己的财产。这些恐惧交织在一起，导致汉人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不断升级。

RR: 关于反恐这个话题，我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在 2014 年宣布开展反恐的人民战争。你在著作中指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战略与中国政府在新疆使用的战略存在很多关联。你能具体谈一下这一点吗？

DB: 当然。在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中国把维吾尔人策划的暴力袭击通称为分离主义。中国政府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暴力事件，是因为维吾尔人希望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⁸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维吾尔人并不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而跟当地政府发生冲突，而是为了非常具体的

⁶ Sean Roberts 的新书 *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Campaign Against Xinjiang's Musli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对此有深入讨论。

⁷ Gardner Bovingdon 的书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的索引里，对中国政府是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⁸ 请看 Bovingdon (2010)。

问题（例如土地所有权、就业歧视、不公正的逮捕等）进行抗议。9·11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开始用恐怖主义描述维吾尔人。他们非常关注将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他们称该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当时，这个组织总共只有六位成员，它主要是一个在线上活跃的组织，没有什么线下的活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将这一组织称为恐怖组织可以拉拢中国，让中国支持伊拉克战争。⁹大约有20名维吾尔人在阿富汗被关押，并被送往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但美国军方很快便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他们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这些人最终都获释了，现在在世界各地自由地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开始围绕着反叛乱展开，大卫·彼得雷乌斯提出了一套军事方针(Petraeus Doctrine)来分析如何阻止叛乱的发生。彼得雷乌斯主义将特定地区的人口分为三个类别：有叛乱可能的、中立的、可拉拢的。有叛乱可能的人们的领导者被送入拘留所中，这是《被拘留者》一词的来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拘留了非常多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阻止叛乱的方法是赢得民心，即通过建造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等方式改变当地人民的政治立场。这套军事理论在当今世界被广泛采用，它很快就被引进了中国。此外，在美国，这套军事理论对警察执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我们在新疆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反叛乱理论》(COIN)之外，还出现了一个叫做《防止暴力极端主义》(CVE)的新理论。这是一套以预防为主的理论，它鼓励老百姓如实汇报自己观察到的恐怖主义的迹象。例如你看到某个人正在变得激进化或宗教化，或是某个人对宗教过于虔诚，你应该提醒有关部门、让他们进行干预。

这种行为显示出了对穆斯林信众的偏见。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宗教虔诚跟政治暴力有直接关联。遗憾的是，这种偏见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广为存在，在中国也有很多受众。一些研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理论和反叛乱理论的专家撰写的文献，已经被

⁹ 这个论点是 Roberts (2020)提出的。

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警察应该如何治理维吾尔人提供了理论指导。¹⁰这些理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例如中国政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预测性警务》这样的词汇来讨论反恐战略。中国的反恐战略积极利用社区——社会主义时代的遗产——来对当地民众进行监察。¹¹

这些基层社区，现在承担起了预测性警务的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战略还有一大特色，即复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劳改制度与再教育制度。中国执政者笃信《落后》的人口需要通过体力劳动来洗心革面。社会主义时期的劳改制度跟我们现在在新疆看到的集中营制度非常相似。维吾尔人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关押在集中营中。

中国把从外国学来的反对暴力极端主义跟反恐的知识使用到新疆的语境中。打击恐怖主义在新疆导致的后果是当地民众被划分成很多区块、一一割裂开来。在新疆，执政者更倾向于把在观察名单上的维吾尔人送去再教育集中营。这种情况在公民权利受到保障的国家比较少见。

RR: 你谈到的两重性非常有震撼力。一方面，你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指出中国政府为了完成原始积累而对新疆进行了重塑。中国政府通过创造出一个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隔离制度，把新疆变成了一个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资源跟劳动力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你从种族文化灭绝主义的角度出发，谈到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是如何通过种种措施试图将维吾尔族的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连根拔起。你能否谈谈这种种族文化灭绝主义从何而来？中国政府为何要对维吾尔族的文化认同赶尽杀绝？

DB: 中国的执政者在内部文献中谈到，他们这样做是解决所谓的《新疆问题》或《维吾尔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中国长治久安。所以在他们看来，针对维吾尔人

¹⁰ 请读 Darren Byler 的文章“Preventative Policing as Community Detention in Northwest China.” *Made in China Journal*, October 25, 2019, <https://tinyurl.com/bdzy6uy9>.

¹¹ 请读 Tynen, Sarah, “State Territorialization Through Shequ Community Centres: Bureaucratic Confusion in Xinjiang, China.”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8.1 (2020), 7–22.

的文化灭绝是必要之恶——虽然他们或许不会使用这个术语。我采访过一些打着《看望》维吾尔族家庭的名号对他们进行监视的汉人，这些人跟我说他们明白维吾尔人很难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分开，也很难放弃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但这些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维吾尔人会从这个变革中受益。这些汉人的想法可以被理解为《严厉的爱》。¹²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想法跟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心主义不可分割。汉人面对维吾尔人时，往往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维吾尔文化是落后的、不文明的。汉人时常用轻蔑的口气批判维吾尔人懒惰、缺乏工作技能。正因为维吾尔人无法胜任工厂里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在汉人的指导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人。总而言之，汉人觉得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新疆才能取得经济发展、维吾尔族才能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¹³

与此同时，中国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的论述也促成了文化灭绝主义的发生。伊斯兰教被视为非中国的、外来的，被描述为一种在过去10到20年间借着互联网席卷维吾尔社会的病毒。我猜想持这种论调的人大概不知道维吾尔人并不是在最近这些年突然发现了伊斯兰教并成为了穆斯林信众——从历史上来说，维吾尔人一直是穆斯林信众。但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现象：中国的穆斯林信众开始结识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信众，并试着让自己的宗教实践与后者保持一致。中国执政者对此的看法是：《维吾尔人很无知。他们不明白伊斯兰教有多少坏处，所以我们需要教育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在《可以被容许的维吾尔族元素》跟《必须被消灭的维吾尔族元素》之间做出了区分。新疆菜、新疆舞、新疆的美景属于前者，它们都是被允许的、甚至被鼓励的，因为新疆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产业。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则属于后者，中国执政者坚信维吾尔人必须经历世俗化的洗礼。

¹² 《严厉的爱》是美国的一种教育理念，它认为父母必须要严格对待孩子，孩子才能成材。

¹³ 中国官员在讨论西藏的经济发展时，也用了类似的话语。请读 Yeh, Emily,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RR: 有一位观众提出了一个关于针对维吾尔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问题。有一些报告称，维吾尔族妇女不仅被迫嫁给汉族男子，还被迫实行节育和绝育。你认为这些暴行是不是构成了种族灭绝？

DB: 这位听众提到的例子，是符合国际上通用的对于种族灭绝以及优生学的定义的。¹⁴虽然我不知道汉族跟维吾尔族之间的异族通婚到底有多普遍，但有很多迹象表明异族通婚确实越来越常见。绝大多数异族通婚都是发生在汉族男性和维族女性之间的。想要了解这个议题，最好的办法是关注当地政府发布的公告。我注意到一些村政府的公告里表扬新婚夫妇的婚姻属于「民族团结婚姻」、为其他村民立下了典范。这些公告一般会搭配新婚夫妇的照片，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丈夫是汉人、而妻子是维吾尔人。为了鼓励异族通婚，政府一般会给这些夫妻送上礼物以及经济奖励。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到底有多少维吾尔女性是被迫嫁给汉族男性的。但是，考虑到新疆的再教育集中营以及汉人跟维吾尔人之间巨大的权力悬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很多维吾尔女性面对着逼婚的压力。很多时候，维吾尔女性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嫁给谁，她们的父母会不断试图影响她们的决定。此外，我采访过的一些人曾谈到，他们的单位会在周末组织一些相亲活动，介绍单身的维吾尔女性与单身的汉族男性认识。虽然很难说类似的相亲有多普遍，但关于异族通婚的新闻报道在近年来显著增加。另外，在微信跟其他平台上，时常有一些广告鼓励汉族男性来新疆结识、迎娶维吾尔族女性。据我所知，目前为止关于这个议题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要进行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至于强迫计划生育，我们可以从再教育集中营发布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许多人被拘留的原因是他们超生了、违反了计

¹⁴ 1948年出台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第2条的第E点指出，《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构成了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见 Kurt Mundoff 的文章《认真对待 2E》：<https://tinyurl.com/94rxh6zu>。很多北美原住民根据此条款指出，殖民者在十九跟二十世纪建立的寄宿学校制度——即强迫原住民的孩子们去殖民者设立的学校生活、读书，学习殖民者的文化与宗教——构成了种族灭绝。

划生育法。¹⁵ 当遇到超生的情况时，一般是丈夫而非妻子被拘留。这个报告中还有很多关于给维吾尔妇女进行宫颈检查、安装宫内节育器、执行人工流产的内容。这些都被视为再教育运动的一部分。¹⁶ 从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三年内维吾尔族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目前还不清楚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与强迫维吾尔妇女安装宫内节育器有多少关系。此外，大量维吾尔男性被关押在教育集中营中、导致夫妻分离，这可能也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另外，有很多维吾尔妇女在工厂里工作、生活，平时很难见到自己的丈夫。考虑到以上这些原因，维吾尔人想要生儿育女并不是一件易事。自 2018 年开始在新疆地区开展的打击违法生育运动的目标似乎是要削弱维吾尔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掌控权。在讨论新疆问题时，我们应该思考它跟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少数民族展开的优生学运动的相似性。以美国为例，直到 1960 年代仍然有对针对印第安原住民跟非裔美国人的优生学政策。新疆也好，美国也罢，优生学运动针对的都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非维吾尔族的其他族群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目前在新疆发生的计划生育运动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的。

RR: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各类维吾尔人的组织跟协会。现在新疆以及海外，都有什么样的发声渠道？这些组织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它们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DB: 目前想要在新疆进行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很困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制度，不管是维吾尔人还是汉人，都有不少人对这个制度持保留意见。几乎所有维吾尔人都反对目前的制度，在汉人之中有一些持异议者。维吾尔人觉得目前的

¹⁵ 这份未经删改的内部文件显示，许多人因计划生育问题被拘留：https://shahit.biz/supp/list_008.pdf。

¹⁶ 国家文件表明，自 2018 年开始，新疆地区开展了《打击违法生育》运动。新疆地区的育龄妇女被迫进行绝育手术，安装宫内节育器或采取其他长期有效的避孕手段。此外，育龄妇女必须每季接受体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她们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好公民（见<https://archive.fo/7wyhZ>）。一旦发现非法怀孕的现象，当局要求怀孕者尽早流产。凡是举报他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都可以获得 5000 元的奖励（见<https://archive.is/C97TN>）。

制度既威胁到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又破坏了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汉人则觉得现行制度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并且占用了他们很多时间。¹⁷ 2018年我在新疆做研究时，借着在书店购物、乘坐出租车、在公园散步的机会，不着痕迹地与一些人进行了交谈，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的家人正被关押在再教育集中营里。此外，我最近在哈萨克斯坦做了一些研究。越过边境逃难来此的新疆人告诉我，他们为了躲避监控系统，会在桑拿浴室碰面，在那里他们可以公开讨论彼此的想法。但是，人们对监控的恐惧如此之甚，到了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都不敢妄言、生怕被监控的程度。因此，即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大多数人选择保持沉默、尽量不谈论政治话题。有一些来自新疆的汉人对维吾尔人充满同情，他们希望成为维吾尔人的同盟、帮助维吾尔人。我的书里有一章是关于这些汉人的。不过，我那个章节那是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写的。我不清楚在那之后这些汉人是否仍然能够积极地帮助维吾尔人，例如帮助他们逃离集中营。据我采访过的一些维吾尔人说，他们的汉人邻居好心地把你的手机借给他们、让他们得以把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我们近年来读到的那些关于新疆的外泄文件中，有一些是被痛恨这个系统、想要帮助维吾尔人的盟友流传出来的。

大多数声援新疆的活动发生在中国之外，其中大部分围绕着东突厥斯坦或人权问题展开。大部分活动的重点放在向各国政府进行游说上。最近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是：英国出现了由工人运动家们发起的支持维吾尔人的运动。这些工人运动家从供应链的角度批判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剥削，他们给大公司施压，要求变革。¹⁸从工人的权利以及实现国际主义团结的角度出发声援维吾尔人的运动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我认识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左翼人士（其中一些是研究人员跟记者），在组织这些活动时刻意保持低调，因为他

¹⁷ 想要深入了解汉人对这个制度的观点，以及一位来自该地区的左翼留学生如何看待汉人的观点，请见 Darren Byler, “‘Uyghurs are so bad’: Chinese dinner table politics in Xinjiang.” *SupChina*, June 3, 2020, <https://tinyurl.com/4ny7x3cd>.

¹⁸ 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运动，请见这个网站: <https://uyghursolidarityuk.org>. 此外，作者指出，一个叫做废除维吾尔自治区的强迫劳动的机构，也做了非常多组织工作: <https://enduyghurforcedlabour.org>。

们的家人仍然滞留在中国。这些左翼人士从劳工权利以及反殖民主义角度出发，为声援维吾尔人的运动提供了很多思想资源。跟我合作最频繁的人是我上面谈到的这种人：他们希望从左翼的视角出发改变新疆的现状，但囿于家庭因素，他们无法公开发声、组织。作为非中国公民，我们面对的政治风险较小。因此，我们有义务团结起来为那些背负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人发声，让更多人听到维吾尔人的声音。

RR: 有一位听众想要知道中国左翼人士如何才能支持维吾尔人的反抗？你刚才谈到那些在新疆生活了三代或两代的汉人，跟近年来移民到新疆的汉人之间的差别，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很好奇中国左翼人士跟你谈到的这两类汉族移民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合作？

DB: 当我在 2014 至 2015 年之间住在新疆时，我发现那些关注性少数群体的议题的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处境最为同情。他们会主动向我提及维吾尔人如何受到歧视，新疆的制度是多么需要改变。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本地人或老新疆人，他们对维吾尔人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这些汉人在新疆定居了几十年，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新疆人，他们把维吾尔族的食物视为自己的食物。我的感受是，那些民族、宗教、性取向或籍贯上的自我认同跟主流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更能够对维吾尔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如果这些不同的社群之间能够更多地分享信息、建立更多的团结，我相信某种形式的集体反抗运动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中国组织运动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中国的监控系统太发达，普罗大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太少。

此外，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反伊斯兰教风潮，对一些倡导人权跟民主的中国运动者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这些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和自由的，但他们不认同美国对维吾尔人的声援。他们认为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在新疆问题上他们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由此可见，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围绕着反恐运动产生的一些误解跟偏见。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支持维吾尔人的运动中。

此外，我相信支持劳工权利的中国人一定可以理解维吾尔人的遭遇。被迫提供劳动的维吾尔人的处境，跟华东地区争取工人权益的人们的处境多有相似。因此，我相信二者之间有建立同盟的可能性。

RR: 感谢你的演讲。

参考文献

- Becquelin, Nicolas, “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he China Quarterly*, 178 (2004), 358–378.
- Bovingdon, Gardner,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yler, Darren, “Preventative Policing as Community Detention in Northwest China.” *Made in China Journal*, October 25, 2019, <https://tinyurl.com/bdzy6uy9>.
- Byler, Darren, “‘Uyghurs Are so Bad’: Chinese Dinner Table Politics in Xinjiang.” *SupChina*, June 3, 2020, <https://tinyurl.com/4ny7x3cd>.
- Byler, Darren, “Infrastructural Power, Hong Kong, and Global China.” *China Made Project*, Brief #6 (2020), <https://chinamadeproject.net/china-made-brief-6>.
- Chen, Chris, “The Limit Point of Capitalist Equality: Notes Toward an Abolitionist Anti-racism.” *Endnotes*, 3 (2013), 202–223.
- Jefferson, Brian, *Digitize and Punish: Racial Crimin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
- Roberts, Sean, *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Campaign Against Xinjiang’s Musli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Roy, Ananya, “Racial Banishment,” in *Keywords in Radical Geography: Antipode at 50*, edited by Antipode Editorial Collective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9), 227–230.
- Tynen, Sarah, “State Territorialization Through Shequ Community Centres: Bureaucratic Confusion in Xinjiang, China.”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vol. 8, no. 1 (2020), 7–22.
- Yeh, Emily,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推荐资料

Brophy, David, “China’s Uyghur Repression.” *Jacobin*, May 31, 2018, <https://tinyurl.com/mr2j3vtn>.

Byler, Darren, “Standing with the Oppressed. On Colonialism and Terror Capitalism in Xinjiang.” *nqch.org*, March 17, 2021, <https://nqch.org/2021/03/17/colonialism-and-terror-capitalism-in-xinjiang>.

Byler, Darren, *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Byler, Darren,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Roberts, Sean, “The War on the Uyghurs.” *Made in China Journal*, October 4, 2021, <https://tinyurl.com/2ywxzfz2>.

6

中美角力时代的台湾左翼

演讲者：丘琦欣 (Brian Hioe)

主持人：王星¹

王星 (王):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Brian 丘琦欣为我们讲述台湾及左翼的问题。Brian 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同时也是《破土》杂志的编辑。² 他写过众多关于台湾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文章，此外也写过关于中国跟香港的文章。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不只能揭示台湾和中国、美国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和挣扎，这一点通常被大家忽略。

Brian Hioe (BH): 谢谢你和其他所有组织者的邀请，让我能参与到这个精彩的线上讲座系列之中。我想先简述一下台湾的历史：在民主化之前，台湾曾有一个获得美国支持以制衡中国的右翼威权政府。这个政府就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³ 通过众人的抗争，台湾终于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在民主运动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即民进党，⁴ 它是台湾现在的执政党。

划分台湾政治的方式并非总是以左右为基准，而是以统独为标准，这也是过去七年来主导台湾政治的根本议题。虽然在 2000 年，台湾历史上出现了首位非国民党的总统，八年后，政权再次回归到隶属于国民党的马英九手中。这让人忧虑威权政府会卷土重来。国民党尝试实施让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更密切的政策，尝试推动中台的经济融合以导致更紧密的政治联结。其最终目标是在中台之间达到某种形式的统一。国民党执政期间，遭指控利用威权手段达到目的。例如，在地方层面有许多贪污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3 月 6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on-taiwan-left>。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² 《破土》杂志是一本关于台湾以及亚太地区左翼观点的网上杂志，在 2014 年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发布首刊，请见：<https://newbloommag.net>。

³ 中国国民党在 1945 年内战遭中国共产党打败，撤退台湾。

⁴ 民主进步党（民进党）。

的案例，利用威权时期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动员大家给国民党投票。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有权势的大型媒体企业非常渴望进入中国市场。部分亲中派媒体进行自我审查，以确保台湾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保持正面。这些媒体掩盖事实，将中国描述得非常正面，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导致 2014 年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大家经常把这场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做对比，因为它们在同一年发生，关注的议题相近。此外，两地与中国的关系同样非常紧张。这场学运是针对国民党推动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回应。若该协议通过，中国企业将可以投资台湾的服务业。为了抗议该协议，令众多学生行动者、年轻人、普通人占领立法院长达一个多月。

我与几位朋友在学运期间创办了《破土》杂志，由于左翼视角在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之中时常缺席，《破土》试着为学运注入左翼元素。例如，我们的一些作者既批评中国，也批评美国，并批评自由贸易等。我们希望这些左翼的声音被听到。

由于统独问题仍然是台湾公共辩论中最突出的议题，台湾政治光谱中的左翼或劳工很难有空间探讨其他议题。太阳花运动之后，出现了一批比民进党更激进的第三党派，其中时代力量的规模最大，并赢得了立法会的席位。同时亦有一波劳工抗议。乘着太阳花学运的声势，民进党赢得了 2016 年的总统选举，并在台湾历史上首度取得立法院选举的过半席位。

蔡英文上任后随即推出《劳动基准法》，针对劳动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翻了三十多年的政策。例如取消公众假期、工时延长等。每周不再有两天固定假期，而是一天固定假期、一天灵活假期，后者期间仍可被要求工作。

该项改革引起了很多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年轻进步派行动者的抗议。这些人以往并不参与跟工会相关的行动，而是从事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虽然这些组织处理和劳动议题相关的项目，但它们不是工会的一部分。这个行动是自太阳花学运以来最大型的抗争。

与此同时，出现了工会罢工的浪潮。最突出、也最广为报道的是中华航空的罢工。这是台湾史上首次有航空公司进行罢工。华航罢工引发了罢工和工会行动的浪潮。在交通业中有很多公司跟华航一样接受国家的投资，它们的工会通常会要求国家干预劳工抗争。我们在中华邮政、铁道、收费道路、另一间航空公司的罢工中都看到了这个现象。

然而，出乎意料的，国民党在 2018 年举行的直辖市及县市长选举中大胜。自 2014 年太阳花学运以来，国民党一直被认为在走下坡路、失去声势。国民党的胜利引起了关注统独议题的人的恐慌情绪。由于人们害怕民进党有可能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之中落败，不少此前批评蔡英文政府、曾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年轻进步派行动者，最终都选择加入民进党竞选，成为政府的一员。太阳花学运的领袖林非凡、赖品妤等人，现在是立委。吴濬彦曾经是批评劳动法改革最为激进的一员，现在成为了民进党青年发展部的主任。

尽管国民党赢得了一些席位，民进党在 2020 年再度胜选，保住总统之位和立法院的控制权。台湾左翼政治长久以来面对的问题，就是很难摆脱统独问题。在选举等关键时刻，统独问题再度升温，这导致台湾很难从脱离统独议题的、位于党派纷争之外的角度讨论问题。

在太阳花学运期间，很多学生领袖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都有批评。前者曾为威权党派，因此不受欢迎。而民进党掌权以来，变得越发腐败。民进党曾经很进步，是左翼党派，但它现在背弃了其劳工的背景。统派方面，部分前左翼行动者由于希望台湾和中国统一而转而支持国民党，这形成了统派左翼这个分支。

我认为，台湾左翼面对的问题是两党都把左翼的力量吸纳、招安。最近，这个现象在民进党里表现得很明显，但从历史上说，国民党招安了很多左翼人士。这个问题也显示在中美角力上。民进党被认为是亲美的、对中国很警惕。尽管在某程度上，民进党已经稍微改变其独派立场，但在过去它一直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国民党则是亲中的统派党，宛如中国在台湾的代理。

年轻人对这个可能不太理解：台湾这个国家向来反共。不过，年轻进步派行动者对左翼思潮很感兴趣。即便在民进党之中，也有前激进派担任公职。例如，台中市前市长、现任交通部部长曾经是马克思学生会的主席。他当选以后，不再像以往那样激进。但民进党内部有容纳激进思潮的空间。

由于民进党依赖美国的保护来抗衡中国、以防中国入侵，一旦你加入民进党，就很难对美国提出批评。很不幸的，这造成了台湾部分地区对川普的膜拜。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采取强硬的反中立场，因此在香港也看得到对川普的支持等类似的现象。川普的形象被理想化，大家认为他会保护台湾，但美国保护台湾仅出自自身利益。

这些年轻进步派行动者因此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向来支持同志、劳工、移工的权利，但民进党所支持的川普却是极其右翼的，美国也经历了向右的思想转移。这是台湾和香港左翼共同面对的难题。与此同时，台湾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台湾恐惧中国军事入侵，因此希望加强和美国的关系。

这是台湾左翼所必须面对的历史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蔡英文的第二届任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民进党内的年轻人是否会与民进党渐行渐远？他们会继续在党内行动吗？他们会完全被民进党招安、意识形态变得主流化吗？还是说，有可能开拓新的路径、不陷于统独问题的囹圄之中？我先讲到这里，期待接下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王：谢谢 Brian，你讲解得很全面。就让我们先问你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想问一个关于台湾左翼的问题。在今天，台湾左翼到底代表着什么？台湾的左翼或进步派关注什么议题？还有，你提到了统独问题所形成的政治对立，这个对立是如何撕裂台湾左翼的？

BH：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阳花学运之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左翼。但对于左翼到底是什么，则各自表述、缺乏共识。大部分自诩为左翼的年轻人是独派，但也有少数人是统派左翼。这和过去七十年的广义的身份认同的变迁有关：较年轻的一代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

他们没有祖辈在中国的记忆，也没有父母辈对这个想象中的国度的乡愁。就连所谓的外省人（台湾百分之十的人口是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中国人）的后代也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政治的光谱分成独派与统派，两者与左翼跟右翼的政治分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产生关系。以 x/y 轴做比喻，《左》和《右》在 x 轴上，而《统》和《独》则在 y 轴上。左翼和独派、右翼和统派重合的可能性更高。我认为，民进党是一个倡导社会改变和转型的政党，而国民党则是原地踏步的政党，死死抓住过往威权政治的既有结构不肯松手。国民党非常亲中，毕竟它执政多年以来一直推动中台统一。

独立和统一本质上并非左右的议题，因此左翼和独派、右翼和统派的重合是挺奇怪的现象。台湾政治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总体而言它被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政党主导，但民进党又可以被分成两个政党。民进党内部的左翼和右翼力量在反抗国民党这个共同目标下走到了一起，组成了民进党这个联盟。但这也造成了民进党内部不寻常的张力，这也是我们经常面临的挑战。

王：这非常有趣。你提到民进党之中有左翼和右翼的存在，你能多谈一下吗？在民进党之中，左右两翼有什么议题是立场一致的？又有什么议题是立场完全不一样的？

BH：台湾年轻一代的或新晋的左翼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少数群体、劳工权益、反排外情绪等。台湾在过去二十年间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移民。在民进党之中，确实有反对外来移民的声音。现届蔡英文政府属中间偏左，颇有技术官僚之势，但却将自己包装成进步派，以吸引太阳花学运后加入政治的这一群年轻人。

但民进党之中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进步派这个走向的。例如，最近几年创立的喜乐岛联盟政党由保守的基督徒组成。一直以来，民进党内部都有一股强势的基督徒势力，他们非常反对同性婚姻。他们由富有的企业家组成，可谓台湾本土的资产阶级。他们反对那些游走于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跨海峡的资产阶级，因而支持台湾独立。他们是企业家，因此不支持劳工权益，也曾

经发表过针对东南亚移民的歧视性言论。他们是台湾的本省人，因此不支持来自海外的移民。其祖辈在国民党来台以前就已经植根台湾，说闽南话，也称台湾话，有台湾民族主义倾向。这是他们跟民进党内部的左翼立场不一致的议题之一。尤其是在2018到2020年期间，民进党内部的对立非常严重，对蔡英文构成了重大挑战。

王: Brian，这种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世代的因素？左翼年轻人是否较倾向于独立呢？

BH: 确实是有世代的分野。台湾年轻人很少有人是统派。国民党40岁以下的党员总共不到四千人，因此它正在以一切方式吸纳年轻人入党。年轻人通常较其祖辈和父母辈要来的进步。特别是关于同性婚姻这一类的议题，你可见到明显的世代差异。我认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比较支持婚姻平权。你可以见到一批年轻人抗议不公平的经济状况，他们往往反抗被称为《战后婴儿》的他们父母的政治立场。这个现象也发生在台湾。

王: 民进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这些年轻的左翼人士？这些年轻的左翼人士可能不会投给国民党，但同时也可能对民进党感到失望，是这样吗？

BH: 我认为最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不被民进党所招安，因为民进党很善于拉拢、吸纳有潜力的年轻人。民进党本身是一个靠社会运动起家的政党，它的建立源于台湾的民主运动。它过去确实比较激进，但现在有右倾的趋势。虽然如此，它仍保留了和社会运动的紧密联系，党内有一个专门的社会运动部门。民进党知道如何与社会运动建立联结、吸纳人才、将社会运动的能量化为自己的选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2014至2018年期间，对于民进党的批评声音较多，这些批评大部分来自太阳花学运的行动者。学运期间，民进党来到立法院，抗议者当时很清晰地向他们表示：我们不会让你收买这场运动的。这是我们的学运，你不能利用学运来得益。

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的声势日渐壮大。那些年纪较大的、感到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支持国民党。他们对这群激进的年轻人非常不满，认为是这些年轻人把台湾社会弄成了一副

陌生的模样。人们恐惧民进党落败，因此纷纷加入民进党。现在，民进党又重新掌权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左翼角度出发，推动民进党的发展？

经常有人尝试建立新的党派，或在民进党内组成新的派系。有很多第三政党采取了比民进党更左翼的、更支持独立的政策，但最终都因为内斗而解散。内斗不一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有时候只关乎战术问题。多年抗争之后，第三政党似乎走投无路，所有人都加入到民进党之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个难题。作为台湾左翼，我们一直强调我们需要从两党中独立出来。

王：这非常的有趣。我想继续探讨有关左翼空间的问题，你谈到了第三政党并不成功。除了政党以外，有没有任何你觉得即便无法取得选举胜利、但仍是有效的、最起码方向正确的左翼空间和联盟？

BH：以左翼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左翼空间存在已久，但它们的数量似乎没有在过去这些年中有什么增长。这些组织训练关注社会运动跟劳工行动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掌握跟运动相关的知识与技术。我认为这非常有效，但并不会令左翼的人数增多。

国立台湾大学的大陆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这个学生团体被容许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学习马克思主义。让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最后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团体至今仍然存在。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这之所以是一个挑战，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年轻人和年轻人组织的运动上。这些年轻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他们往往在关注劳工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但本身并不是工会的成员。因此，工会的结构并没有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行动而有所改变，仍然很僵化、守旧。

王：观众提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政治和经济是如何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及台湾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在你看

来，横跨台海两岸的左翼进步力量有没有可能进行联盟？有什么因素阻碍了这一联盟的形成？

BH: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但也很难回答。举例来说，台湾学者吴介民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名为《第三种中国想象》，这本书是十年前写成的。它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讲的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三地的行动者或公民社会联合起来，一起抵抗中国共产党这个共同敌人。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是身处各地的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

跟十年前相比，现在在中港台三地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之间想要保持交流更为困难。过去，中国仍相对开放，公民社会仍然被容许存在。当时，行动者能够往返中港台三地，互相交流。然而，情况在七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发生了改变。香港的行动者很难进入内地，反之亦然。交流往往转移到地下，或者找其他方法进行。这就是三地的行动者面对的困境。

关于工会行动，由于很多中国的企业由中国和台湾的资本家拥有，我们无法将中国和台湾的资本分开来分析。富士康的郭台铭代表谁的利益？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呢？谁都不是，他就是个资本家。为了对这一类人产生影响，我们必须要有两岸合作行动。

我认为在实现跨境合作方面——不论是罢工、全球合作、或在华语地区进行合作——现成的模式不多。确实有工会声援彼此，例如他们会拿着声援的标语拍照、发到脸书或其他社交媒体上。但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合作的方式。你可以打击跨国企业的压力点。由于跨国集团必须依赖多个地点生存，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点对它发起进攻、打击它的痛处。但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很多人在这方面进行讨论。

王: 刚才你提到了围绕劳动法进行的抗争，你也提到了台湾的空服人员罢工。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台湾劳工抗争的前沿是怎样的？是谁在领导这些抗争？我知道台湾有一个隶属国民党的工会联盟，但也有独立自主的工会和联盟。

BH: 台湾的工会自古以来都不是很壮大，这明显是因为国民党的威权主义带来的阻碍。由于工会威胁到了国民党的权力，

国民党自然不希望工会壮大。同时，国民党派出自己的党员渗透工会，以控制劳工跟工厂的产量。有时候，国民党党员会在工会中担任职务以榨取金钱。利用工会控制生产力是一个在全球各处都可以看见的现象。民进党确实尝试过创造一格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但在过去 20 年内，工会本身变得贪腐、脱离了工人运动。我认为很多工会的抗争都是关于特定工作场所的抗争，而非更大型得动员。大部分时候，工人之所以加入工会只是为了取得医疗保险。因此，工人往往并不活跃，导致工会并不是那么的有活力跟抗争精神。

过去几年，位于桃园的工会颇为激进。台湾的大型国际机场位于桃园，空服人员参与了很多行动。这些行动由来自交通业跟国有企业的很多不同的工会组成，你会见到同一群人活跃于所有这些行动之中。在新闻中我们不断见到同一群工运的领导者，领导层一直没有扩张，这或许是个问题。但是，这个现象说明有年轻人或三十多岁的人加入劳工抗争，这令人振奋。

抗议《劳动基准法》的时候，我看到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跟百货公司的售货员等人开始参与政治，这令我感到鼓舞。但是，这并非大规模的趋势。我认为，对年轻人而言，当社会运动发展出一种视觉语言、美感语言或者形成了一套抗争文化时，它最能吸引到新鲜血液。在针对《劳动基准法》的抗议中形成了一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品或抗争演出等。自太阳花学运以来，我们没有见到类似的抗争。要不是行动者开始感到筋疲力尽的话，这场运动本有可能继续发展、壮大。我认为那是一个错失的时机。

王：另一个工运是东南亚移民工的运动，尤其是家政工作者、工厂工人和渔民组织的运动。你能谈一下在台的移民工的情况和他们的工会运动吗？

BH: 移民工工会有好几个，最有名的大概是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有些工会更专门一些，例如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大部分移民工（约 40 万）都在工厂工作，但想要鼓励他们形成工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却很困难。照顾台湾高龄人口的家政工作者和看护得到了很多的注意，因为她们是在城市中的能见度很高的一群人，她们经常在市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聚会。而工厂工人

往往在乡郊地区，与世隔绝。帮助移民工的非政府组织很难接触到他们，因为他们也许没有手机讯号。即便他们遇到什么不公的情况，也很难找到他们。

移民工渔民更难联系到，因为他们在海上工作，往往好几年都不靠岸。他们不上网，就连手机讯号都没有。⁵他们只能在靠岸的时候才能举报问题，但他们很少上岸。他们被分散在不同的渔船上，彼此之间无法合力组织工会。

归根结底，因为移民工人无法投票，所以政治人物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处境跟心声。外籍工人工会经常呼吁即便移民工并非公民，也应容许他们在地方选举投票。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很多人支持这一倡议。很多政客有自己的生意跟投资，这些都受益于对移民工的剥削，因此他们没有改变现状的欲望。我们必须令台湾社会更重视这个问题，不要等到有什么憾事发生之后才追悔莫及。

王：我希望探讨另一个问题。我们刚才稍微谈到了太阳花学运以及应运而生的《破土》杂志。你能否说一下太阳花学运带来的影响或遗产？你认为类似的运动可能再次在台湾发生吗？

BH：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太阳花学运是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它影响到了后来所有的抗争。往后的每场抗争都在模仿太阳花学运来让自己的诉求被听见。例如，很多人尝试占领立法院，相信这可以令他们的诉求得到注意。但是，和太阳花学运一样激烈的抗争就只有抗议《劳动基准法》那一次，但即便是那次抗争也不及太阳花学运的规模大。

每个人都渴望重现太阳花学运的辉煌，这导致人们受制于过往的模式，往往在做同样的事情、用同样的策略。例如，为了争取媒体报道，总是选在台北的政府大楼抗议。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那个区域的抗争接连不断。但我们能做的事情仅此而已吗？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意思维。

王：2019年香港抗争时，你在当地报道。你能否分享一下两场运动的关联？你如何比较这两场运动？

⁵与此同时，台湾政府引入规定，鼓励渔船拥有者在船上安装网络。

BH: 人们往往不知道，早在太阳花学运和雨伞运动之前，台湾、香港和中国三地的行动者早已认识彼此，因为他/她们关注着相似的议题。在行动者变得有名以前，他/她们可以随处走动，可以到中国去和其他行动者见面。十年以前，中国的监控还没有那么严重，香港也是如此。因此，大家互相认识。当这些运动发生之后，你认识多年的、一直在做这些议题的朋友突然变得有名。

过去十年以来三地的行动者们虽然有继续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但很难亲身见面。我认为很有趣的是，因为台湾和香港共同面对和中国相关的问题，两地之间因此形成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团结情谊。港台的情况有很多共通之处，因此行动者可以分享技能和策略。例如太阳学运花之后，2014年8月香港立法会被抗议新界发展的行动者占领。发生在2019年7月初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亦有尝试占领立法会。当时人们在立法会大楼的墙上写上《香港太阳花》的字眼，并在抗争演说中直接把两场运动进行类比。

台湾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支持香港。我记得当时每个周末最少有一场集会，有时候有两场，每一场都由不同团体组织。集会累计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以示对香港的团结。但建立跨国团结力量时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仅表示团结是不足够的。这些集会表示了台湾参与者的同情、支持，但对于有什么实际上的帮助呢？这很难得知。在2019年抗争期间，有人从台湾给香港行动者寄送物资，例如防毒面具和安全帽，但后来由于中国的介入而被迫停止。

王: 据你所知，有没有从左翼角度出发支持台湾独立的论述？你认为是否存在一个不依赖美国政府或美国军事介入的台湾未来？

BH: 不依赖美国的帝国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谈论不与美国结盟或批判性看待中美角力的世界观，呼吁与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合作的人并不多。但我觉得我们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并尝试推动它，但这种思维仍非常的新。左翼人士应承担起提供另一种政治路线的责任，给大家展示不一样的可能性。

王：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性别平等问题上。2019年，台湾成为亚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你能谈一下台湾争取性别平等的抗争吗？在你看来，为什么台湾在这个议题上比起其他亚洲国家更为进步？

BH：很难简单地解释为什么这个发生在台湾。很吊诡的是，台湾在全球遭排斥的处境，反而令其有兴趣尝试吸纳、发展新的事物，尝试变得比其他国家更进步。左翼对此感兴趣，某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同性婚姻是现代世界最进步的议题。为了与世界他国建立联系，我们只能变得比别人都要好。我认为这是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大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有些人批评台湾巩固了同性民族主义。⁶民进党致力于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为了得到首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亚洲国家的名声，使台湾可以将自己和中国区分开来。出于这个原因来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确实很古怪。不过，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民进党党内反对性少数派的保守派愿意妥协。

王：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揭开西方跟中国的掌权阶级彼此之间的隐秘联系。在英港人的团结运动致力于披露中国以及西方的政客和商家之间的关系。例如你刚才提到的富士康背后的台商郭台铭，这群人在中国投资，有政治影响力。对于追踪并揭露来自台湾、中国跟西方的掌权阶级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你有什么看法？这对于与世界各地的激进派建立团结有帮助吗？

BH：我认为这极其重要。重复我之前所说的，一切都相互关联、互有关系。郭台铭和在中国运作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生产美资企业苹果的产品，而苹果产品无处不在。富士康只能在中国运作，和共产党合作。这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我们只针对其中某一部分反抗并没有用，根本没有用。就算你关闭了富士康，另一个企业会填补空缺，在东南亚生产苹果手机。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网络，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运行模式。资产阶级只求在最便宜的地方设厂，因为他们能付少一点工资、剥削工人，

⁶ 同性民族主义指的是以支持 LGBTIQ*性小众群体为借口来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民族排外主义的行为跟思想。

且不会面对任何后果。我们必须将这些议题视为跨国的议题。没有任何企业或任何富人只有一个国籍。只有不被民族国家的框架限制，我们才能真正抗衡资本主义。

推荐资料

Chiang Kuo-yu, “The Taiwanese Left Was Once Rooted in the Radical Labor Movement.” *Jacobin*, December 23, 2022, <https://tinyurl.com/bnuz9jx5>.

Dashorst, Bart, “Baodiao and the History of Postwar Taiwanese Leftist Thought.” *New Bloom*, August 26, 2020, <https://tinyurl.com/438zv8c6>.

Hioe, Brian, “The Pro-independence Left Versus the Pro-unification Left in the Sinophone World.” *New Bloom*, May 19, 2015, <https://tinyurl.com/2p9xt84j>. (中文: <https://newbloommag.net/2015/05/25/pro-independence-left-vs-pro-unification-tw/>).

Hioe, Brian, “A Shared Logic Between the Pro-Unification Left and KMT Apologists?” *New Bloom*, October 1, 2016, <https://tinyurl.com/28z6ckyf>.

Hioe, Brian, “Caught Between Two Superpowers: Taiwan’s Left in an Age of US-China Tensions.”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no. 79 (2021), 24–36.

7

正视香港抗争中的右翼

演讲者：Promise Li

主持人：Ralf Ruckus 与 Jule Pfeffer¹

Ralf Ruckus (RR): 2019 年和 2020 年的香港抗争运动被视为是无意识形态的，它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其实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已经得到了右翼思潮和人物的支持，这一点在美国大选前变得更加明显。左翼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则始终未能成为香港抗争运动的主流。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 Promise Li 来为我们演讲。Promise 来自香港和洛杉矶，既是《流伞》的成员，在民主社会主义跟团结等美国社会主义团体中也非常活跃。此外，Promise 曾是洛杉矶唐人街的租客抗争的组织者。Promise 一直以来都从批判性视角探讨香港抗争对川普的支持和右翼思潮。在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想在今天讨论的话题。² 我们也想谈一下最近针对民运人士、记者和政治人物的拘捕，以及对这些人的压迫意味着什么。同时，我们会讨论香港的抗争如何能延续下去、并突破现有的界限。此外，我们会分析继续支持香港抗争运动的重要性。Promise 会先作一个简短的演讲，随后我们会进行讨论。

Promise Li (PL): 谢谢你的介绍。我预设今天这场讲座的听众们都已经读过了我在给活动组织者发的简介中提到的文章。³ 那篇文章中的很多见解和印象都只是初步的想法，我期待跟大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2 月 20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facing-the-right-in-the-hong-kong-movement>。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² Li, Promise, “It’s Time for Hong Kong to Reckon with Its Far-right.” *Lausan*, November 29, 2020, <https://tinyurl.com/5n6mwtcw> 以及 Li, Promise, and Matt Dagher-Margosian, “Facing down global ‘Trumpism’ and Hong Kong’s far-right.” *Asia Art Tours*, January 9, 2021, <https://tinyurl.com/54969jv3>.

³ 见注 1。

家能对此有更多的讨论。谢谢工潮组织今天的活动，并邀请我来演讲。

首先，我对香港右翼的分析使我受到了一些批判，我想回应其中一个关键的批判：面对来自中国对香港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探讨如此边缘或规模这么小的右翼人士？部分同情运动的人对我提出质疑，他们不认为我们能有意义地探讨香港右翼分子的存在。与此同时，批判香港运动的人认为除了对香港右翼的批判，对其他议题的讨论都没有意义。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右翼思想，对于很多身处香港的人而言，他们甚至不理解右翼的含义。

我说这些，其实是想说，我相信香港对于意识形态的困惑，并不代表着左/右翼之分已经过时。相反的，正是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这些区分在香港变得如此疏离跟抽象。如果无法理解这一点，我们争取民主的运动将深受限制。右翼并非单一的思潮，也非历史中的古董，更非运动的指导中心。对于催生出这个复杂现状的客观情境，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对于如何能立刻将现状变得更好，我并没有答案，尤其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迫。我想先集中探讨几个互相关联的命题。

首先，运动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右翼力量，他们互相对抗。我们不能将他们简化为抗争中的威权中国共产党分子、川普的支持者或仇外分子。首先，右翼中的本土派非常清楚右翼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声量很大，但人数极少。此外，有挪用左翼言论来为国家主权背书的右翼中国共产党官员。最后，有一些不理解政治光谱，但因为川普对中国强硬而盲目支持他的人。这些人就如同在美国选举中针对单一议题投票的人。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右翼势力强化了彼此的观点，尤其是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上。本土派中激进反中国和排外的右翼分子给了中国政府话柄来煽动内地人民的大汉族中心主义，导致内地人民对香港的运动缺乏理解跟同情。在此过程中，中国加强了其充满种族主义的民族情绪，这些思想借助了不少法西斯理论中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主权意识，例如卡尔·斯密特的思想。现代中国政治哲学学者想必知道，参与中国政策制定

的学者（例如強世功等人）非常推崇斯密特的思想。⁴ 对于这些人而言，政治被简化成敌我之争，是那些被包含在中国帝国主义边境内的人和那些挑战帝国主义的人之间的生死搏斗。相对于国民内部的思想一致跟主权的完整这些思想——这两者都是极右国家的核心原则——阶级和其他议题都被视为是次要的。

香港抗争运动中的右翼思潮也有中国右翼的特质，但他们并没有政府的背书。在部分圈子中，《为运动流血》或《香港人》这个身份已经变成得到认可的重要武器和行动的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好好思考如何才能建立一场可持续的、融合本地人和外地移民的运动。⁵ 他们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香港版本。这些人很危险，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一套有逻辑的、自洽的说法。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充满矛盾、缺乏逻辑，所以他们吸引到了很多受众。他们并非意识形态慎密的本地派右翼，而是思维紊乱的、纯粹依靠反应行事的人。他们民粹式地对中国的生活模式和政治感到反感，经常将中国政府、人民和文化混为一谈。

这一点是我的文章中被误读或忽略的关键命题：我认为之所以有这些人的存在，并非源于他们对中国的误解，而是源自于香港跟白人文化之间的未经挑战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哪些实际因素导致香港人更容易右倾？对很多香港人而言，英国的殖民统治被他们想象成政治中立的或比中国好很多的，这一点被 1980 年代的文化战一再强化。当时，有很多香港、中国、台湾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柏杨、孙隆基跟较近期的钟祖康等作家对中国发起深入的批判，认为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无法适应西方的民主观念。⁶ 换言之，1997 年之后的香港在未经省思的西方崇拜的文化中长大，这本身是一个容易

⁴ 详见 Martínez Mitchell, Ryan, “Chinese Receptions of Carl Schmitt Since 1929.” *Penn State Journal of Law & International Affairs* 8, no. 1 (2020): 181–263.

⁵ 见 Chen Yi (陳怡), “Confronting the New ‘Big Platform’—Part 1.” *Lausan*, April 21, 2021, <https://tinyurl.com/2bznhbva>.

⁶ 见 Promise Li,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Debates of Yesterday to the Anti-China Foreign Policy of Today” (从过去对中国《国民性》的辩论到今天的反中国外交政策), *Made in China Journal*, 2022 年 3 月 8 日, <https://tinyurl.com/mtm4fx9r>.

孕育右翼情绪的环境，更何况香港没有本地主流的民主运动传统来中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被香港右翼思潮所吸引的人通常显示出香港反对派政治的核心弱点：政治原子化。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回归后的大型运动通常有一股自发的力量，但难以持久，亦难以进行系统性的批判。香港的政治通常沦为各种各样的监护政治：有别于群众基础广泛的大型运动及街头抗议，香港的政治行动要么是由一小群行动者跟非政府组织推动的，要么仅仅在立法会中发生。中国跟英国不约而同地将香港本地可持续的、民主的、集体大型运动的政治传统连根拔起。当然，在2019和2020年有很多民众自发进行激进民主的思考和行动——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好好记住这些宝贵的瞬间，并继续推动这些行动。

但事实是，这些运动对于阶级结构或大台的攻击，往往导致对大型民主运动和问责制的淡漠甚至拒绝，行动者对于发展连贯的政治思想毫无兴趣。大家唯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推翻中国共产党。换言之，虽然对领导者的批评可以成为民间运动的力量来源，但香港民主运动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对于压迫的系统及其组织的形式缺乏理解与分析。因此，今日香港的右翼孕育出原子化的行动文化并不令人意外。从雨伞运动中旺角的大型街头抗争，到连登论坛，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这一点。⁷

支持川普的香港右翼人士把批评川普的人一概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不断霸凌对川普提出批评的人。考虑到香港运动声称自己不偏袒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个运动内部的矛盾？通过宣称他们的思想是去意识形态的，部分右翼本土派把他们偏激的话语包装为有别于无用的温和派或其他的思想流派的策略性的或实用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运动中的大多数人以保证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团结为借口，拒绝批评这些人。此外，这些右翼人士与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并无本质上的

⁷ 连登是香港的网上讨论平台，跟英文媒体中的 Reddit 很相似。它受到匿名抗争者的欢迎，抗争者在这个网站上交换运动策略和进行政治对话。连登逐渐变成了香港抗争运动中右翼本土派的阵地。

不同，他们都笃信西方个人主义价值所具有的民主潜力。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崇拜西方的程度深浅不同。

或许，香港政治话语中最大的限制和幻觉是相信我们能超越意识形态，相信左/右翼之争并不适用于香港的民主运动。当然，任何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运动的参与者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逻辑连贯的左翼或右翼力量。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就算我们不给某些行为贴上左翼或右翼的标签，这些行为还是会在意识形态层面造成后果。

有一部分行动扩大了推行大型民主行动的空间，而另一些行动扼杀了或延迟了这些可能性。美国大选的结果显示出香港的运动若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识，其后果不只影响到香港。它会使得在香港外的反民主右翼力量利用香港的运动，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不管运动参与者和评论者如何强调右翼问题不足为道，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理解香港运动中的右翼思潮。因为糟糕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法会令压迫者或其他机会主义者乘虚而入，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处境。对香港右翼问题的视而不见，代表我们将这些反民主的范式融入我们自己的运动之中，加速了针对全球最强大的威权政府之一（即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崩塌。

一直以来，右翼都责备左翼分化、限制了香港以及香港的运动。可是却没有人向右翼问责，右翼的思想如此受到注目但在现实中完全帮助不到我们：从我们寄望于川普解放香港人但最终梦碎，到疏远了我们在中国内地的盟友。正视香港的右翼意味着我们对于自由的愿景之中，容不下那些毫不在乎遭受压迫的人的生活、自由和人权的人。

正视右翼，也代表我们必须承认右翼的根源远远超出对川普的支持。我们应反思，身为香港人，我们一直以来是如何理解我们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我们如何可以一同建立起一场可持续的运动？我们为何没能建立起一场可持续的运动？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带来的暴力，和香港运动右翼带来的暴力，在程度上无法比较。在这段被中国共产党噤声的黑暗时期，我们必须诚实面对我们内部可以改变的地方。为了在未来重建

一场更有效的运动，我们可以作出哪些反思和改善？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先讲到这里。谢谢。

RR: 谢谢你耐人寻味的演讲。你提到香港的左翼力量孱弱且分化。在你看来，左翼如何才能改变右翼话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PL: 香港的左翼确实孱弱。但即便如此，香港确实有左翼人士的存在，并且大家的左倾程度不一。在运动之中，每个人因为其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对左翼思想有不同的使用方法。有些组织者活跃于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之中，有些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些人和自治八楼联系较少，⁸也有人活跃于工会之中——所有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做很棒的事情。

但是近年来，香港左翼缺乏行动的平台、联盟和宣传，导致我们无法壮大我们的势力、让香港左翼成为一个既独立但又不脱离香港运动的群体。我的整场演讲都在说右翼是一个问题，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我们左翼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如此黑暗的时期以谦虚的态度尽力寻找机会介入、推动行动，以及如何说服更多人相信我们提供的左翼路径是实现解放的最佳路径。

我认为，尽管运动中的各种思想之间存在矛盾跟差异，不将我们自己从运动中分割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参与是非常简单、基本的第一步，谦虚地从运动中学习也是基本的一步。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全盘接受运动的走势、而不对其进行批评或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平衡，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很多。但这确实是第一步。

第二件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要回到组织之中。提到组织，我并不是让大家组织什么列宁主义先锋党，而是仔细思考民主程序和过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才能培养集体决策的精神。我们不要限制或打击抗争中的革命能量，而是要以更民主、更具代表性、更可持续的方式抗争。我认为这些是当我们从西方、全球南方或世界其他地方吸取左翼思想传统的时候，完全忽略掉的事情。左翼并非只是一种思想流派，它更是动员跟组

⁸ 见 <https://smrc8a.org>。

织。但是，虽然我提倡组织，我不希望听众们把我的话解读为对各类去中心化的左翼行动的批判。我认为，我们若想有效地进行去中心化行动，就要有意识地用集体而民主的方式作出决策。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些程序和组织性结构。考虑到香港的行动者或许不同意我们从左翼视角做出的批判，我们怎样才不会与香港的民主运动越走越远、怎样才能壮大左翼力量？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或者 1970 年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黑人女权运动。为什么这些人认为他们需要强调团结、不应该疏远大型抗争运动？不少 1970 年代的黑人女权团体经历过很多边缘化和排斥，但仍提倡团结。⁹ 那是因为她批判性地思考组成联盟的意义何在，以左翼的身份集结力量的意义何在。尽管她们强调自决原则，但仍然尝试思考她们可以在哪里做出贡献、如何才能介入到广阔多元的大众环境中。

关于新工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攻击，¹⁰ 我们必须问，除了香港职工盟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支持工会的办法？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很多，例如加入讨论群组或参加工会们组织的招募活动来帮助工会吸纳新会员。我们如何能组织一小撮核心人群来支持这些行动组织，但同时保留我们的思考空间来想象新工会的未来？作为工人、在香港生活的人、以及在海外生活的香港移民，我们如何能加入到既有的日常结构之中来帮助他们，同时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好好支持这场运动而不是利用它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议程。

RR: 你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香港的殖民史，特别是一部分人非常强调中国大陆的剥削殖民史，与此同时却选择性地把英国殖民统治视为《更好的过去》。在香港，有哪些团体在推动这一后殖民时代的迷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破除这种迷思？

⁹ 见 Barbara Smith 的著作，例如：<https://barbarasmithaintgonna.com>。

¹⁰ 关于香港劳工组织和工会团结的文章，请参阅：<https://lausancollective.com/2021/11-articles-workers-organizing-hk-china/>。

PL: 我在我的文章中和刚才的演讲中有稍微谈到，从我这一代到现在进行抗争的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一代，对中国国民性的严厉批判并不陌生。我这一代人尤其如此。我想重申，我这样说，并非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并非笼统地提议我们应该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我觉得理解西方文明和价值对我们的吸引力为何这么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种严厉批判中国的情绪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建立的文化话语。对于刘晓波这样的人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从根本上与西化挂钩。这种对政治的文化解读决定了随后几代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的路径和视野。香港人和其他离散者并没有跟草根以及其他对抗西方既得利益阶层的公民社会组织建立联系，相反的，他们与西方既得利益阶层走得很近。这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自由派华人圈子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产物。这些人认为民主运动根本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不是大众运动在反抗西方既得利益阶层时赢得的胜利。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美国帝国主义的历史被抹去。同时，这场运动中有很多人无法辨识美国具有的压迫性。如同我刚才提到的，要是没有很好的组织、好的政治教育，以及行动者正确的动员，这一场仗将非常难打。人们对美国抱持积极正面的看法，很难接受《美国并非中国威权主义的美好替代品》这个论点。这一点深刻地烙印在我们对政治、香港人这个身份、以及民主的思考之中。由于它根深蒂固，我们无法辨认它并对它进行反思。我的批判并非毫无建设性地批评香港的民主运动，而是尝试指出我注意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香港的殖民史？而这段历史又如何决定了我们抗争的界限？除了那些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的香港人之外，还有很多香港人不断试图从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寻找或建构这场民主抗争的起源以及香港身份认同的缘起。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这场民主运动完全被位于香港的英国复辟主义者主导，而是这种对《西方》价值和制度的偏好揭示出了我们这场运动所希望争取的自由是怎么样的、所想争取的政治未来又是什么样的。

与其不断地重复对中国的批判跟对西方的崇拜，我认为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英国的殖民结构如何颇具生命力地在香港不断延续。我们不应在中国或西方之间选择，而是应该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治建立在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跟结构之上。此外，当我们谈到警察压迫这个话题，《流伞》有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的警察部队多年来训练香港的警察。¹¹当然，从皇家香港警察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香港警察部队的转变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虽然主权改变了，但自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建立的警察制度的实质变化非常轻微。香港警察领导层通常在英国受训，林郑月娥一直使用殖民时期的反暴动法来压制抗争。

因此，中国的威权主义跟西方殖民主义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不同。前者融合了后者的殖民手法，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当我们认识到中西两方一直都在借鉴——甚至传承——彼此的统治手段，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新的抗争方向。

RR: 香港运动的其中一部分——让我们叫它比较丑陋的一部分——是针对来自中国内地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的歧视，那些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在香港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尤其受到影响。你认为为什么移民问题如此突出？为什么年轻一代显露出如此强烈的仇外情绪？我认为这种仇外情绪并非仅仅存在于香港右翼之中，而是广泛存在于运动之中。

PL: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所谓的香港右翼和运动中所谓的自由派或中间派有很大的重叠之处。我认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上虽然有连续性，但人们要么辨认不出来，要么未能好好对此进行分析。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之一是分化被统治者。这是十分矛盾的，因为人们一直认为香港是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政治话语来说，香港歧视是一个非常孤立的都市。香港既没有很多已经生成的政治范式让人们借用，也没有很多经验让人们参考。

完全融入香港社会的东南亚移民工人占香港工作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针对这些人的种族主义和歧视屡见不鲜。从某种

¹¹ 详见 Tran, Matthew, “From the Heartland to Hong Kong: The Case for Global Abolition.” *Lausan*, January 4, 2021, <https://tinyurl.com/b9se53tu>.

意义来说，在中国的统治下，这种种族化的结构重塑了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阶级分野。政府维持着不公义的结构，但香港人本身也积极参与到了对这个结构的维系之中。

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因此，香港的去殖民化过程并未完成，特别是在主权移交给中国以后。这些矛盾并非以抽象的、理论化的形式存在，而是很真实地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大家默认《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在香港社会中，《靠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论述非常主流，大部分人对此毫无质疑。这很大程度上是殖民遗产。

RR: 一方面，你谈到左翼论述应更有组织性，例如集体决策。另一方面，我听到、也注意到运动拒绝大台。大家对领导者不信任，也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立场。我起初认为这是一个契机，因为左翼运动的历史中一大倾向是家长式作风：左翼团体或党派总是尝试主导运动。但我现在觉得，你所开的药方，其实在一定程度导致了你的疾病。目前为止，这个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香港的左翼力量非常孱弱。

PL: 同样的，我想强调：我并不反对去中心化，事实上我同意去中心化。我认为这场自发的、去中心化的运动之中，有很多契机。我不反对去中心化，但我担心在去中心化的同时，我们也丢弃了一些有用的组织方法。去中心化为解放提供了更多空间，但与此同时，过去两年的香港运动显示去中心化也显露出某种弱点。我并非要批评这场运动，而是想揭露它的矛盾。大型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充满矛盾。身为左翼，我们尽己所能参与到行动之中，试着比那些保守、反动的行动者组织得更好。¹²

关于这一点，我想推荐中国离散左翼人士 Zoe Zhao 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很多有用的见解，说出了我想说的东西。¹³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匿名性和去中心化并不一定能带来多元的视角。社会运动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并不一定保障平等的参与机

¹² 据演讲者说，“out-organize”这个词在组织者圈子中很常见。编辑将这个词的意思理解为《将反动因子排除在运动之外》（编辑按）。

¹³ 详见 Zhao, Zoe, “Facing Down the Hong Kong Protests’ Right-wing Turn.” *Lausan*, March 28, 2020, <https://tinyurl.com/778fvysx>.

会。匿名组织可能使人难以看见运动的结构性偏见，因此更难去解决问题。

我并不像 Zoe 那样不信任匿名组织，但我认为 Zoe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去中心化和匿名，并不自动保证权力关系就此消失。这种互动模式在连登讨论区上清晰可见，每个人都是匿名的。《流伞》中有另一篇文章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写的，它呼吁我们认清如下事实：在运动的某一时刻，很多人比较偏向非暴力抗争。但突然之间，有一小部分激进的行动者在前线对警察进行挑衅，并且其挑衅程度超出大家所乐见的。这个时候，并没有任何集体的、民主的机制来解决纷争。大家甚至无法在街头抗议的基本策略上达成一致，想就运动整体取得一致意见就更难了。这真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民主运动吗？¹⁴

这并不是说，香港需要党派的民主中心路线，例如由一个组织做出决定、其他人跟随。但是，虽然去中心化让更多声音被听见，同时也限制了一些观点被听见，最终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一大群原子化的人跟一场大型民主运动并不是一回事。民主并不是在个人的程度上做你想做的事情，而是透明地、集体地做出决策并建立民主组织。

当你看着街头前线，或者中文大学跟理工大学的围城，你会看到学生抗议者和坚决烧车的抗争者争论。即使大部分人不想在警察面前烧车，但你如何才能阻止他们呢？有没有机制解决这种纷争呢？运动对《不割席》的强调造成了很多行动者出于害怕造成内部冲突跟分裂，怯于说出自己对其他行动者的批判——这是可以接受的吗？我认为这最终制造出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无法提出不满，只因我们希望团结。当大家害怕对川普、民主运动提出批评，当大家害怕以问责的方式谈论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时，这难道是最优的民主实践吗？

这就是我所指的去中心化的限制。我想清楚指出：我所说的组织并非像是英国工党或正统托派党派，而是香港人自发建立的组织。例如，由学生和普通市民组成的草根关注组是在

¹⁴ 见 Chen Yi (陳怡), “Confronting the New ‘Big Platform’—Part 1.” *Lausan*, April 21, 2021, <https://tinyurl.com/2bznhbya>.

2019 年初最先开始动员大家反对《逃犯条例》的。又如民间人权阵线很有效地动员了多达百万的人上街抗议，提供空间让不同团体聚在一起、共同决定策略。¹⁵ 如果我们能在运动中建立、维持、改变这些组织，而不是将大部分的精力跟资源放在与警察在街头对抗，那会怎样？

要是我们真心希望获得解放，就应该用更多空间进行自我反省。要是不肯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该如何在未来避免同样的问题、重建力量？我们大家一开始认为去中心化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但它可能产生很多问题，例如支持川普的右翼势力。在未来我们要想办法比这些运动中的右翼组织得更好。¹⁶ 我认为，我们早就应该认真反思这些矛盾。

Jule Pfeffer (JP): 我想问一个关于美国政府的问题。美国的拜登总统正在修改其官方政策，旨在制约中国这一全球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这对于香港，特别是香港的抗争运动，有什么影响？你认为在运动之中，有没有对拜登政府及其未来走向的讨论？

PL: 拜登虽然不像川普那样口无遮拦，但他比川普更想巩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的军事势力。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拜登加强美国帝国主义力量以《制衡中国》的策略比川普的策略更有连贯性，后者在香港人中却更有吸引力。我并非支持拜登的政策，但我希望指出极右的话语和表现更能吸引香港人——尽管川普对香港的《支持》并不连贯。他成为总统前，曾批评奥巴马支持雨伞运动，他也曾反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尽管川普在落实很多香港人所期盼的美国帝国主义政策时逻辑并不自洽，这些香港人仍旧支持川普，这表现出香港右翼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运动中出现的极少数的对强烈意识形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是川普治理下的美国？

JP: 在中国内地，有川普支持者反对香港独立。正如你的文章和刚刚所说的那样，香港运动中有很多对川普个人的支持。

¹⁵ 详见 To Chi-kuen, Promise Li, “‘We just Had the Heart to Fight the Boss’: A Hong Kong Leftist’s Story.” *Lausan*, October 17, 2020, <https://tinyurl.com/3hanaarm>.

¹⁶ 关于“out-organize”这个词语，详见注 12（编辑按）。

你如何解释这种对美国右翼政治的信任？为什么香港运动的参与者如此被川普和右翼政治吸引？

PL: 我认为川普代表着香港运动中潜在的一些症状和倾向。一方面——这只是我的猜想——川普的论述和香港泛民主派领袖的论述有相通之处。现在有所谓关键意见领袖的文化，他们通常代表着右翼，而不代表具有组织性的政治团体。例如卢斯达、陈云等人——陈云现在已经淡出——也包括《苹果日报》的各位名嘴，还有陶杰。这些人在川普参选总统前，都已经支持川普的倾向：以论战和反建制话语吸引《非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这些倾向最终发生冲突，在我看来并非偶然。这些人都很健谈，话题性十足，人们自然认为他们说的是真相，而不像那些无趣的中间派和泛民主派（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是雨伞运动失败的原因）。这耐人寻味，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组织模式是由香港的左翼所采用的，例如长毛和他所属的组织几十年来以激进手法进行反殖民和反中国共产党的运动。¹⁷ 多年以来，这些左翼人士决定优先策略性地建立盟友，而不是独立发展左翼组织。这段历史颇为复杂，但长话短说，右翼成功地反送中运动的激进派化为己用。

香港社会的某种话语的存在，令人更容易接受右翼思潮。在运动发生前，香港已经拥有无意识的高度资本主义的思维，容易接纳右翼，不信任乃至攻击身份政治和其他左翼话语。这些早已为美国右翼人士思考、运作及讲话提供了空间。除了川普，美国的极右翼参议员和政客给予香港高度支持。例如 Josh Hawley 在香港街头和香港人拍照，支持抗争等。这些人发出的声音是最响亮的。当然，这不代表民主党人不支持香港，但是全球各地的右翼有针对性地声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极右一直有把共产党以及后共产时代的民间抵抗运动化为己用的传统。因此，香港人先天较容易被右翼话语所吸引，全球的右翼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有组织地巩固他们与香港之间的联系。

¹⁷ 梁国雄，外号长毛，是香港的社会主义行动者。他在 1970 年代从托派运动出身，成为 2000 年代香港最具标志性、最激进的社运人士，并在 2004 年赢得立法会议席。

另一方面，左翼忙着对抗亲中人士。假如左翼最大的声音来自于灰色地带等亲北京的机会主义者和反动分子，那么香港的大多数行动者自然不可能支持左翼。这就是右翼在运动中得势的实际原因所在。

RR: 今年已经有几十名普通百姓、政客跟行动者因触犯《国安法》被捕。这是否代表着香港步上了更加威权统治的道路？香港是否仍有抵抗的空间？那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人们太过害怕，不再敢走出来了？疫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PL: 现在香港确实面临着自主权移交以来最高度的压迫。香港一片惨淡，这既和疫情有关，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加剧惨况。经历一整年的抗争，香港人心力交瘁。他们害怕再做任何集体政治行动，由于担心监控，甚至不敢在网上匿名发言。《国安法》的影响并不是真的要控诉任何人，而是要制造恐惧氛围、让人们不敢组织。

但我想指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本地运动。这些运动不直接和大型民主抗争有关，而是一些草根抗争，旨在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在九龙城有反士绅化的运动，希望争取更民主化的市区规划。又如中文大学学生争取校园福利和学生权益。¹⁸ 到目前为止，似乎仍有一些不会触及到《国安法》的组织活动的空间。当然，何谓触犯《国安法》是由北京指派的法官决定的。但我们仍有空间进行政治活动，埋下种子，为草根行动打好地基。我们仍可以思考如何组织，如何在不立刻推翻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工作。

但确实，目前的情况颇为不妙，草根工作很困难。但我想强调的是离散族群有很多工作要做。运动中不少著名人物都逃离香港，境外的香港人很努力思考如何能从远方帮助香港。左翼尤其应在这一时刻行动，因为假如我们不能从左翼视角出发发展出一种有别于右翼的国际主义论述，那么很多离散行动者就会更加努力地争取右翼参议员的支持，这给了香港以外的右翼团体更多权力。

¹⁸ Foodpanda 送货员在 2021 年组织了一场短暂的罢工，争取到了一些权益。详见 <https://ti-nyurl.com/5538rjjk>。

如同主权移交前香港出现移民潮，这个移民潮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香港人可能会接触到当地的左翼传统和另类组织方法。但另一方面，要是我们不行动的话，这一波的离散人群可能会壮大全球的——特别是美国的——鹰派和右翼力量。这一点，在佛罗里达洲的古巴人口或加州橙郡的越南人口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要是左翼无法吸引国外的香港人，全球右翼便会继续壮大。我认为，这和在香港本地支持民主抗争一样重要。

但据我评估，短期内在香港本地很难有重大的改变，我们必须进行长线思考，思考如何进行政治教育，并反思雨伞运动的不足。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运动的低潮时期来为未来的新一波运动做好准备？在吸取了以前的教训的基础上，下一次我们组织运动时，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不割席》是对雨伞运动之后出现的泛民主派之间的内讧的妥协以及回应。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思考，在毁灭性的内讧和回避面对内部矛盾两种极端之间，如何找到中间点？现在正是一起思考这些问题的大好时机。

RR: 我最后想提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在某种程度上我支持行动者质疑某些传统左翼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你、我和其他人都参与到辩论之中，并和香港左翼行动保持联系。我们能够指出运动的问题，并从政治上批评运动的现状。但同时，这也揭露了一个问题：左翼行动者某种程度上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局外人。他们或许非常具有组织性以及国际视野，很了解不同的运动，甚至有学术背景。这些人如何才能与缺乏这些机会来发展这种视野的香港草根行动者进行讨论呢？

PL: 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当我们这些左翼人士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入批评时，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对我而言，左翼行动的核心是为人们赋权，让他/她们能够免于压迫，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跟自己的物质情况。作为左翼行动者，我们必须抱着谦卑的态度，愿意从大家身上学习。从根本上说，我们所做出的东西——不论是党派、组织、行动还是策略——应该为群众服务。我们如何赋权人们群众，让他/她们根据自己的情况，以民主的手法作出决定，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同意很多针对传统左翼结构的批评。我本人并非出身于正统的民主集中派组织，我也不信任这些组织。但我认为在这种模式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不会让运动者变得原子化或陷入完全混乱状态的可能性，不会因为大家的观点不同而找不到共通之处、因此无法进行行动的可能性。有很多左翼人士在进行草根行动，甚至在前线行动。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左翼人士跟运动非常疏远，并没有做很多事。对我来说，关键不在于批评左翼不团结，而是如何正视不同的左翼人士的情况。人们选择不和香港的左翼联结起来是有原因的。一直以来内斗和外迫的情况同时存在，我们要同情地理解这些。

但与此同时，回到我刚所说的参与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各种机会尽己所能地参与到运动之中。我并不是说你必须走上街头前线。我不同意《越走在前线，越有话语权》这种说法。这种说法问题重重，给予了右翼更多话语权。《你为运动流的血越多，你越有权发表见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主义背书时的论调，它强调《你必须为运动、为国家牺牲》。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一味推崇在前线战斗，而是应该鼓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力为这场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不应该一味批评这场运动，却从不提出解决办法。当然，大家确实心力交瘁。但关键是，我们要找到让自己重返运动的方法，并且同情地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情况。

同样的，回到我刚刚的建议：找到可以进行宣传跟组织的空间，找出最需要社会变革的地方，跟其他行动者一起组织，一起思考运动的过程和程序，并且尽量建立和巩固社群。不停寻找机会，寻找你觉得能够影响的、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从一对一的对话开始，向对方提议《我们一起组织群聊或读书会吧》或者《让我们一起参与支持这个行动吧》。不论是抗议自己的工作单位的小型工人组织，还是抒发与校园相关的不满的学生组织，我们如何能够支持这些行动？我们如何能支持普通的香港人从下而上进行自发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地灌输左翼思想、强迫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组织？与此同时，我们要清晰地思考策略，思考如何策略性地组织抵抗身边的压迫。在行动之中，我们必须寻找平衡点：我们要如何才能兼具清晰的政

治思维跟行动的决心？我所说的行动，并非做运动中最受欢迎的行动，因为那不一定对运动整体产生正面影响。

RR: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解和观点，Promise。你的演讲非常鼓舞人心，我相信我们会——也必须——继续讨论如何面对右翼带来的挑战，如何发展左翼的力量、并创造左翼人士之间的团结。

参考文献

Chen Yi (陳怡), “Confronting the New ‘Big Platform’—Part 1.” *Lausan*, April 21, 2021, <https://tinyurl.com/2bznhbya>.

Li, Promise, “It’s Time for Hong Kong to Reckon with Its Far-right.” *Lausan*, November 29, 2020, <https://tinyurl.com/5n6mwtcw>.

Promise Li,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Debates of Yesterday to the Anti-China Foreign Policy of Today” (从过去对中国《国民性》的辩论到今天的反中国外交政策), *Made in China Journal*, 2022年3月8日, <https://tinyurl.com/mtm4fx9r>.

Li, Promise, and Matt Dagher-Margosian, “Facing Down Global ‘Trumpism’ and Hong Kong’s Far-right.” *Asia Art Tours*, January 9, 2021, <https://tinyurl.com/54969jv3>.

Martínez Mitchell, Ryan, “Chinese Receptions of Carl Schmitt Since 1929.” *Penn State Journal of Law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1 (2020), 181–263

To Chi-kuen and Promise Li, “‘We just Had the Heart to Fight the Boss’: A Hong Kong Leftist’s Story.” *Lausan*, October 17, 2020, <https://tinyurl.com/3hanaarm>.

Tran, Matthew, “From the Heartland to Hong Kong: The Case for Global Abolition.” *Lausan*, January 4, 2021, <https://tinyurl.com/b9se53tu>.

Zhao, Zoe, “Facing Down the Hong Kong Protests’ Right-wing Turn.” *Lausan*, March 28, 2020, <https://tinyurl.com/778fvysx>.

推荐资料

Au Loong-yu, *Hong Kong in Revolt: The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2020).

Ruckus, Ralf, “Out of Control—Hong Kong’s Rebellious Movement and the Left.” *nqch.org*, September 10, 2019, <https://nqch.org/2019/09/10/out-of-control-hong-kongs-rebellious-movement-and-the-left> (中文: <https://grassmediation.wordpress.com/2019/09/28/失控-香港的反抗運動與左翼>).

第四节

中国在世界和 中国社会主义史

8

印度尼西亚的中国投资 与劳工抗争

演讲者：Alfian Al-Ayubby 与 Y. Wasi Gede Puraka

主持人：Alina Kornfeldt 与 Ralf Ruckus¹

Ralf Ruckus (RR): 欢迎参加《中国与左翼：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系列线上讲座。今天我们会探讨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工抗争。我想首先欢迎两位来自印尼的嘉宾：Alfian Al-Ayubby 和 Wasi Gede Puraka。我也想欢迎 Alina Kornfeldt，她会和我一同主持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活动由我来作开场白，接着 Alfian 会为我们讲解在苏拉威西岛莫罗瓦利县——一个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的大型经济区——工作的工人背景以及工作环境。Alfian 的演讲结束后，会与 Alina 进行问答。借着，Wasi Gede 会向我们介绍中国在莫罗瓦利县的投资导致了怎样的劳工抗争。随后，我会跟 Wasi Gede 进行一个简短的问答。在活动的最后一部分，Alina 和我会跟两位演讲者对谈，我们也欢迎观众向演讲者提问。

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印度尼西亚：印尼拥有 2 亿 7 千万人口，它既是世界第四大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1990 年代末，印尼经历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推翻了苏哈托建立的《新秩序》政府。自 1998 年以来，印尼转型成为了总统制代议民主共和国，国会由多个党派组成。虽然在印尼被视为新兴工业国，农业和对天然资源的使用仍然在印尼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严重打击了印尼的经济，但经此一劫之后，印尼的经济持续增长，目前印尼是全球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5 月 15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chinese-investments-and-labor-struggles-in-indonesia>。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第 16 大经济体。根据一些人的预测，在 2030 年之前印尼将成为全球第 7 大经济体。但是，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引入更多投资。因此，在 2014 年上台的总统佐科·维多多领导下的印尼政府，非常重视国内外投资这一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印尼的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印尼政府希望扩建基础设施，发展印尼的工业，并发展苏拉威西岛等边缘地区。基础设施的扩建有一部分依赖于国外贷款和投资。与此同时，在 2012 年上台的习近平主席自 2013 年开始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增加中国与外国的经济互动。目前，已经有多个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计划在印尼展开。此外，中国在印尼的投资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能源业、金属业、交通和房地产这四个方面。

中印关系并非如此一直和睦。在苏哈托执政早期，共产主义中国一直被印尼视为威胁，导致印尼的中国华侨经常被针对，这一点在 1960 年代的反共运动中可见一斑。但自 1980 年代起，中国和印尼的关系逐渐升温。苏哈托在 1990 年代末下台后，新的掌权阶级认为跟中国合作有两大好处：一方面，通过接受中国的投资，可以制衡西方在印尼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可以帮助印尼提升工业水平。自 2014 年起，佐科领导下的印尼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日渐紧密，一带一路计划的引入使得中国在印尼的投资与日俱增。

在印尼实施的一带一路计划之中，有一项旗舰计划：坐落于苏拉威西岛的莫洛瓦利工业园（IMIP）。IMIP 自 2013 年开始兴建，是中国国有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商）以及印尼最大的镍冶炼厂 Bintang Delapan 的合资计划。镍主要用于制造不锈钢，但也有其他的用途。印尼坐拥全球最大的镍矿之一，而苏拉威西岛拥有印尼最丰富的镍储备。IMIP 有各种各样和生产镍相关的设施，例如冶炼炉和钢铁制造设施等。同时，它也有煤发电站、机场等其他设施。IMIP 融合了镍生产前期的矿场以及生产后期的镍工业设施，这些设施生产各种各样的镍产品，例如我之前提到过的不锈钢、镍生铁、电动车所需的镍电池等。

我对印尼的介绍就到这里。现在，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详细谈一谈在 IMIP 以及其他在印尼投资的中国公司工作的工人的背景、工作环境、和劳工纠纷问题。有请 Alina。

Alina Kornfeldt (AK): 各位好。今天的第一位讲者是 Afian Al-Ayubby，简称 Al。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用 Al 称呼你可以吗？Al 是 Sedane 劳工资源中心（又称 LIPS）的一员。LIPS 位于雅加达南部的城市茂物，它研究各种各样的劳工议题。自 1990 年代起，LIPS 记录了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印尼工人运动，并密切观察印尼劳工情况的发展。Al 研究并支持在印尼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人：例如印尼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苏门答腊和爪哇，以及苏拉威西岛和巴厘岛。Al 的演讲是在他于 2018 所做的关于中国在印尼的资金运作的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有请 Al，接下来的十分钟是你的。

Alfian Al-Ayubby (AA): 谢谢你的介绍，Alina，也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分享我的研究和经验。2018 年，当我到莫洛瓦利进行关于 IMIP 的研究时，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地共有 2 万 5 千名工人，其中 5 千名是中国人。但根据莫洛瓦利自己的数据，当时在整个莫洛瓦利县工作的工人总共只有 8 千人。在 2020 年，媒体报道称 IMIP 总共聘请了 4 万名工人，其中 7 千到 1 万名来自中国。然而，莫洛瓦利县提供的官方数据仍显示全县总共只有 8 千名工人。由此可见，官方数据并不可靠。

我们必须承认，印尼政府对这项计划的处理非常混乱。他们不但无法提供可靠的工人数目，关于工人状况的官方报告也存在很多问题。举例来说，当地劳工局的数据显示 2020 年没有发生跟工作有关的意外，可是根据媒体的报道，2020 年 5 月一名中国工人在宿舍里去世。此外，2020 年 7 月，一名中国工人在处理烧煤的残留物的管道里死去。据劳工局官员称，在宿舍里去世的工人死于心脏病，而在管道里去世的工人自身面对很多压力。没有任何后续调查告诉我们工人逝世的确切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自 IMIP 运作开始，有多少名中国工人已经亡故。

在我进行实地研究的时候，IMIP 只有 7 间企业。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两倍。此外，IMIP 还设立了 4 所锂电池工厂。IMIP 的运作规模不断扩张，它获得了越来越多投资、建立起了

越来越多工厂。根据官方数据，莫洛瓦利县最少有 120 所金属厂，其中包括镍工厂。这 120 所金属厂之中的绝大多数位于 IMIP。

最近，我询问了那些仍在 IMIP 工作的工人，他们现在的工作环境怎么样。他们说根据合约，他们每天只需工作 8 个小时，可是他们的工资仅稍高于最低工资，根本追不上通货膨胀、无法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他们必须加班。很多工人在工厂附近租房，有一些房子靠近海边，潮涨的时候很可能被淹。这个地区仍在发展中，因此管理颇为混乱。有些人说：《我有钱，我可以买地建房子租出去。》但他们的房子靠近海边，并不安全。另外，很多工人必须在远离 IMIP 的区域租房。他们早上上班时，就像是走在早高峰时段的雅加达，道路非常挤塞。成千的工人骑摩托车上班，可是道路不够宽阔，应付不了交通需求。

总而言之，中国在印尼的投资虽多，但工人的工作条件并不好。跟其他国家投资的项目相比，中国投资的项目的工作环境糟糕很多。我不仅在莫洛瓦利县观察到这个情况，在位于苏门答腊的、由中国投资的燃煤发电厂也发现了类似情况。

AK: 谢谢你分享你的见解，Al。我相信你有更多洞见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你不仅在莫洛瓦利县、也在其他地区做了研究，我们稍后可以谈一下你在其他地方的观察。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印尼工人通常来自哪里？他们到 IMIP 入职之前，通常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平均年龄多大？教育水平如何？受过怎样的就业培训？

AA: 根据我的观察，工人的平均年龄为 30 岁，大部分来自南苏拉威西省等邻近地区。我采访的工人里有一些在婆罗洲的加里曼丹或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的采矿区工作过。当他们听说了 IMIP 的招聘信息之后，便辞职来到 IMIP 工作。那些曾在采矿公司工作过的工人通常成为生产线的小组领导。

但也有很多工人并没有在采矿公司工作的经验。例如，我曾采访一个工人，他在来到 IMIP 工作之前是一位在伊斯兰学校任教的宗教老师，拥有学士学位。因此，在莫洛瓦利工作的工

人背景多样。但我采访过的大部分印尼工人都属于蓝领阶层，并不需要掌握专门的技术跟知识。IMIP 建成之后，对工人的需求很大，因此它在聘人方面并不挑剔，只要身体健康即可入选。

AK: 我想谈一谈你刚刚提到的那位宗教老师。他为什么选择到莫洛瓦利工作？

AA: 首先，他被 IMIP 相对高的薪水所吸引。另外，他已经做了临时合约老师很长时间了，从未得到永久的职位。他对我说：《我继续教书的话，并没有未来，因此我来到了莫洛瓦利。》

AK: 你的演讲里提到印尼工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很多人住在当地老百姓出租的房子里。那么中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他们住在哪里？

AA: 大部分中国工人住在位于 IMIP 内部的员工宿舍里。那里有一整片地区是由宿舍、运动馆和超市组成的。当时，我没听说过有中国工人从当地人那里租房子住。

AK: 你能否说一下中国工人和印尼工人之间的关系？

AA: 据我所知，印尼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来往非常有限，只有当他们在工厂工作时才会有互动。下班的时候他们毫无来往，因为中国工人回到宿舍里，而印尼工人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我听说因为二者的语言不通，中印工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冲突。有些我访谈过的印尼工人说：《中国工人给我们指示时，声音很大，仿佛在对他们发脾气。》由于印尼工人认为中国工人朝他们大喊大叫，二者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在 2017 或 2018 年，中印工人之间甚至出现过打架的行为。

有极少数的分印尼工人想认识更多的中国工人，并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但语言的不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我的一位印尼同事在新华社工作，在我们开始进行研究之前，他曾到访过 IMIP。虽然他很容易就能进入 IMIP、而且会说中文，但当他试着和中国工人说话时，工人们默不作声。他感觉到中国工人害怕和陌生人说话。

AK: 在 Wasi Gede 进行演讲前，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IMIP 里头有没有女性*工人？如有的话，她们从事怎么样的工作？

AA: 有，莫洛瓦利有女性*工人，我做访问的时候，大部分女性*工人都在做行政工作，只有寥寥数人在钢铁厂工作，检查熔铁的情况。

AK: 谢谢你，Al。接下来，请 Ralf 介绍我们下一位演讲者 Wasi Gede。

RR: Wasi Gede Puraka 是位于雅加达的危机及另类发展策略研究中心（INKRISPENA）的研究员和主任。INKRISPENA 研究的是印尼不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工人和当地社区的影响。INKRISPENA 的研究主题包括农业的扩张、新健康保险计划的引入、印尼自由贸易区的工作环境等。INKRISPENA 的研究员积极跟工会和草根社区组织合作。Wasi Gede 的演讲，来自于他在 2019 到 2020 年之间进行的关于 IMIP 的研究。他的研究内容包括管理工人的策略。

Y. Wasi Gede Puraka (WG): 谢谢，Ralf。我想首先谈一下位于莫洛瓦利县巴活多比镇的采矿业。巴活多比镇是 IMIP 所在的地方的分区。本地居民跟来外来的工人（既包括来自印尼其他区域的工人，也包括来自中国的工人）之间多有冲突。首先，本地人认为外来工人对他们造成了不利。有传言称中国工人是通过非法途径招聘来的、他们的工作不需特殊技能。这些传言导致本地人越发不满，因为 IMIP 引入中国工人的一大理由是他们具有本地劳工所不具备的技能。为了缓解本地人的不满，莫洛瓦利县政府同意在招聘过程中给予本地居民特殊待遇。

在 IMIP 工作的中印工人的待遇差距亦导致了本地人与外来工人的矛盾。两国工人隶属不同的薪酬系统。中国工人的薪酬比印尼工人高，每月的基本工资超过 5 百万印尼盾，总工资是本地工人的两到四倍。因此，为了与基本工资 5 百万的中国工人看齐，印尼工人必须加班。他们平均每天工作 12 至 14 个小时，每周只能休息一天。因此，他们平均每个月工作 28 天。由此可见，IMIP 的薪酬系统具有种族歧视色彩。

尽管跟爪哇的成衣厂的工人相比，IMIP 的工人名义上的薪酬已经高出很多，他们实际到手的工资其实很低。当地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消费水平总体很高，因此工人的工资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如果他们上有老下有小，IMIP 的工资更是杯水车薪。他们每月支出的费用包括房租（这是当地印尼工人每个月支出的最大一部分钱）、食品、饮用水（因为当地水源受污染）、子女的学费、摩托车的分期付款费。此外，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开支，例如摩托车的油费和出租屋的天然气费。

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印尼，工资不是只给工人自己用的，工人们往往会将工资的一部分寄回老家、贴补家用。此外，他们需要一部分的工资来还债。基本上，印尼的最低工资只能满足一名单身工人的生活所需。如果工人有家室，工资便显得杯水车薪，工人没有办法省下任何钱来。跟中国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及印尼工人一直以来偏低的工资，令在莫洛瓦利工业园工作的本地工人感觉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此外，工厂的分工亦隐含歧视问题。几乎所有的镍矿处理厂中，都有中印两国的工人工作。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做同样的工作，但重要的职位都让中国工人占了，例如部门主管、工头、工头手下的工场监工等职位。不过，在镍矿的生产方面，也有印尼工人承担主管、工头、操作员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厂的日常运作中，来自中国的主管可以要求来自印尼的主管提供信息，但印尼的主管却无法向中国的主管提出类似的要求。因此，即便来自两国的工人在生产线上担当同样的职位，歧视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工头和主管有权给印尼的工头和主管发出指令，但后者却不能指使前者。

工作上存在的歧视现象、文化之间的差异、薪酬歧视、工作和休息时段的不一致、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的难度的不同、语言不通——这些全都是职场之中种族歧视的温床。部分印尼工人指出，中国宣导的共产主义思维，是他们抱持反华态度的主要原因。²

² 例子可见 Mulyanto, Randy, “Why Fears of Communism, Anti-China Sentiment Are a Potent Mix in Indones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 2020, <https://tinyurl.com/2u8pbt6w>;

关于职场歧视和沟通文化，印尼工人认为，中国工人和主管常常将工作推托给印尼人。IMIP 聘请了译员来解决中印员工之间的沟通问题，这些译员大多数为来自苏门答腊群岛的 Bantam 和 Belitung 地区的印尼华裔。可是译员数目不足，再加上中国使用的中文和印尼华侨使用的中文之间存在着方言和词汇的差异，导致翻译非常困难。印尼工人常常感到译员无法把双方的意思完全翻译出来。

关于工时和休息时间，中国主管和工头常常责骂印尼工人手脚太慢，或和中国工人的休息时间不一致。部分中国工头和主管不熟悉印尼工人的权益，周五的祈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尼的穆斯林工人每天祈祷五次，中国主管要求他们轮流祈祷，殊不知当地习俗要求工人们同时祈祷、不能单独进行。

印尼工人所租的房子的基础设施，也无法跟中国工人的相比。印尼工人需要收集雨水来洗澡、如厕、煮饭，但中国工人可以直接饮用干净的水、不需要事先烧开消毒，他们也可以随时洗澡。

中印工人之间的分工关系可以视为是《平等中的不平等》。以两国工人皆须面对的惩罚机制为例，当镍冶炼厂的中国管理层发现中国工人并没有向印尼工人提供《正确指导》，导致生产力未能提升，中国工人每月的奖金会因此被取消。所谓的工作指导，指的是让中国工人教印尼工人如何做工、以提升生产力。但是中国工人未能考虑到印尼工人的文化和智慧，在给予工作指导时，缺乏礼貌、对他们呼来喝去。用印尼当地的语言来说，就是 menyuruh，意思是态度倨傲、指指点点。此外，大部分位于 IMIP 地区的公司并没有清晰的职务说明和分工，因此，中国的工头喜欢随意差遣印尼工人。印尼工人哪怕只是犯了一个小错，可能会引来中国工头的责骂甚至暴怒。印尼工人经常因为很小的事情被解雇。以上这些不平等的问题时常导致小规模冲突，例如两国工人打架，并且加强了彼此的误解跟种族歧视。

以及 Tarahita, Dikanaya, and 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 "Understanding Indonesians' Souring Sentiment Toward China." *The Diplomat*, June 6, 2019, <https://tinyurl.com/3ez9a3nf>.

正如 AI 所说的，不管是中国工人也好、印尼工人也罢，有一些人在努力帮助生产线上的双方达成互相理解。例如，中国工人知道印尼工人的工资较低，因此在印尼工人向管理层示威时支持他们。同样的，部分在 IMIP 工作的印尼工人亦支持中国工人向中国管理层的示威。

有一些工会运动者强烈希望可以消除我上面提到的这些种族歧视。部分在 IMIP 的工会维权人士，认为中国劳工导致的问题被印尼人夸大了。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工人的来源问题被扭曲、夸大，最根本的工人权利问题因此并未得到重视。这些维权人士强调：不论种族、宗教、国籍差异，中国和印尼工人面对同样的命运，即他们都遭到剥削。

关于组织工会，在 2014 年之前，印尼工人并不知道组织工会、进行示威的重要性。自 2014 年 1 月遭解雇后，部分工人和县首都的维权人士建立起了联系，催生了工会的建立。其中一位维权人士成为了公司组建的工会的一员，并在工会担当副主席一职。他们的目标是要激进化工会，而且他们成功做到了。例如，在 2014 年 3 月，他们组织了大型示威。工人们甚至成功地使发电厂停运三小时。发电厂一旦停运，当地的工厂就无法运作。不幸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公司解雇了工会副主席作为报复。

RR: 谢谢你的演讲，Wasi Gede！关于你提到的罢工并导致发电厂停运的事情，你可否多解释一下？工人们是如何组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WG: 工人与省级的维权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工人通过集会、罢工、封路等手段争取权益。他们封闭了横贯苏拉威西岛的高速公路（这是一条国有的公路），并在通往 IMIP 地区的主要入口的路段上示威。

RR: AI 提到 IMIP 地区有多家不同的企业，隶属不同企业的人都有参加示威吗？还是只有某一家特定企业的工人进行了示威？

WG: 是的，来自不同企业的人都加入了示威。IMIP 不仅是管理该地区的企业，它更扮演了招聘者的角色。因此，当 IMIP

聘请工人后，会将工人送到工业园的各家公司。如果一家公司的工人罢工，来自 IMIP 工业园的其他企业的工人也会走出来声援罢工。我刚才提到工人们一般都面对相同的工资和歧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广泛存在于所有工厂里。

RR: 你刚刚提到了 2014 年的例子，能否谈一下其他的 IMIP 罢工的例子？

WG: 有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发生在 2020 年 8 月疫情时期。工人们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留在家里，不知道何时能再工作。这是大约 2 千名莫洛瓦利地区的矿工的经历。虽然公司继续给他们发放基本工资，但并没有支付全部劳工福利。通过减少指出，这些公司得以维持利润水平。

在 8 月 5 日，工人们进行了罢工，要求就业保障。公司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并寻找借口解雇工人来逃避支付遣散费。公司经常利用第 13/2003 号法律的第 142 条和劳工局关于非法罢工的法令作为解雇工人的法律依据，特别是解雇工会维权人士。法律要求希望合法罢工的工人和工会必须在罢工前七天通知。尽管遭到解雇的威胁，工人们仍然希望通过罢工来抗议违反劳工权益的行为。公司解雇了三名工会维权人士来防止他们组织更多罢工。在 8 月 6、7、8 三日，公司发出威胁信，警告罢工工人会被视为无故缺勤。而根据劳工局的规定，无故缺勤可能导致解雇。

RR: 中国工人有何反应？他们也有参与吗？

WG: 没有，中国工人一如既往没有加入罢工。他们只是在一旁观察。但根据我们在 2019 年所做的访谈，中国工人对印尼工人的罢工基本上持支持态度。

RR: 也就是说，当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支持印尼工人，但他们不会加入或积极地支持罢工？

WG: 对，他们不会积极支持印尼工人，因为 IMIP 的管理层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参与罢工，可能被驱逐出境。

RR: 据你所知，中国工人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维护劳工权益吗？过去几年来，他们在 IMIP 有自行组织过示威或类似的行动吗？

WG: 我听莫洛瓦利的工会维权人士朋友说，中国工人经常在工业园中罢工，但人数较少，参与罢工的只有二、三十人。他们一般向中国管理办公室示威。

RR: 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

WG: 他们的要求通常和扣除奖金有关。因为，如我之前说的，中国管理层认为要是中国工人没有努力迫使印尼工人工作，算中国工人失职。

RR: 根据《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则报道，在苏拉威西和印尼其他地方的中国工人控诉中国的经济和中介公司违法劳动法，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当中国工人到达印尼的时候，他们被没收护照，并且拿不到工资。³ 这则报道亦提及许多在印尼工作的中国人并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证。你研究 IMIP 时有没有见到类似的情况？

WG: 我经常听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样的情况在 IMIP 发生，但我在当地研究发电厂事宜时，万丹省确实有发生这样的情况。Lebak Banten Energy 是由中国拥有的发电厂，我听说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工人的护照遭管理层没收了。因此，当他们离开工厂或工业园范围时，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证明他们是合法劳工，因此他们可能被误认为是非法劳工。AI 之前提到中国工人通常不离开 IMIP 地区，可能和这个因素有关。

RR: 我还有一个关于采镍矿和冶炼钢铁的问题。这个过程对该地区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环境危害，对处理这些物料的工人和当地老百姓有消极影响。你有听说当地社群对此的反应吗？他们有没有抵制行为？

WG: 基本上，巴活多比镇的 IMIP 工业园自 2010 年开始出现了对环境的损害。例如在 2010 年 7 月，莫洛瓦利突然发生严重水灾。一个月后，有一次突然的山洪暴发。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爪哇以外的群岛上，5 到 9 月是雨季。当这些地区被夷平、用来采矿，就没有森林来控制雨水流量，因此苏拉威西岛的采矿区经常发生洪水。在 2019 年，当地人告诉我，

³ 见 Kuo, Lily, and Alicia Chen, “Chinese workers allege forced labor, abuses in Xi’s ‘Belt and Road’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21, <https://tinyurl.com/xuar8a7j>.

他们过往也经历过水灾，可是过去水灾的水是清的，现在的水是泥黄色的。最大型的山洪暴发发生在 2019 年，当时全国公路的三条主要桥梁都被洪水破坏。当地人对此有反抗，例如 2010 年初山洪爆发的时候，他们在 IMIP 其中一个投资者 PT Bintang Delapan Minerals 的大楼前发起大型示威，烧掉了办公室、大型垃圾车、和其他设施。再之前，他们封闭了桥梁通道，令警察无法进入。示威结束后当地人回到家里，警察不能逮捕任何人。

AK: 下一条问题是问 AI 的。AI，你提到过你也有研究巴厘岛和南苏门答腊的燃煤发电厂中的中国投资项目。你能告诉我们这些项目的工作环境和 IMIP 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AA: 巴厘岛的工作环境不如在 IMIP 或位于南苏门答腊的巨港的工作环境差。巨港的燃煤发电厂的情况和莫洛瓦利的情况一样的坏。这些发电厂是佐科政府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型电气化的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希望全国可以生产出 3 万 5 千兆瓦的电力，其中 7 成的目标电力由苏门答腊和爪哇提供。

我可以补充一下之前你们谈到的关于中国工人的工作许可证的问题：巨港的中国工人也是住在宿舍里，与当地社群的接触很多。我访谈过部分社群成员以及邻近的发电厂的工人，他们说在 2017 年，入境人员突击搜查一所附近的发电厂，检查中国工人的工作许可，部分中国工人逃到了到附近的森林里。这反映了在那时候，有一些中国工人没有工作许可。

你刚才也提到了强迫劳动的问题。我不知道中国工人被迫劳动的情况是否常见，但据我所知，在南苏门答腊发电厂里，中国工人每天被迫工作超过 12 个小时。

AK: 你研究的 IMIP 和其他计划是印尼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策略的一部分。我由此想到 2020 年 10 月通过的《综合性创造就业法案》。这个法案旨在创造更多工作。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法案吗？这个法案如何影响印尼的工人和他们的抗议？

WG: 总的来说，《综合性创造就业法案》是一项将劳动力的灵活性推至极端的计划。例如，在法案颁布之前，劳动法规限制了一个公司最多可以聘请同一个工人做多少次临时工。工人跟公司签约三次，就能取得永久职位。《综合性创造就业法

案》推翻了这一个法规，伺候再也没有类似的限制了。工人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临时工。

另一个例子是拟定工资的方程式。在综合法案宣布前，拟定工资的方程式是由工人、企业、和省政府三方协商的。并且，它需要参考政府做的为了过上良好的生活、人们需要哪些基本的物质条件的调查。在法案生效前，政府每年进行一次调查，但现在每五年进行一次。五年期间，物价怎么可能不增长？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同时，工资却因为基于五年前的调查而没有任何调整的空间。工资的实际价值可能会由于通货膨胀而下降。同时，制定工资的方程式蚕食了原来制定工资的民主方式，因为现在政府不需要考虑三方体制的意见。

RR: 我们看到了一些针对《综合性创造就业法案》的抗议运动，你能介绍一下吗？

WG: 《综合性创造就业法案》通过非常复杂的立法过程才得以通过，社会每个阶层都被立法过程骗了。例如，要是5月15日立法委员提出草案，当我们批评草案时，立法会就说那不是真正的草案，真正的草案在——比如说——5月18号提出。这样一来，制定草案的过程中，任何批评都被忽略掉。我认为这是立法过程的新策略。由于立法过程充满欺骗性，在2020年在没有大型示威的情况下，法案得以通过。⁴ 很多劳工维权人士都被政客们运用的新策略骗了。法案得以通过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利用 buzzers（即印尼的五毛党）在社交网络上进行虚假宣传，通过散布假消息、造谣来混淆视听。

RR: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我们的活动已经到时间了，再次感谢 Al 和 Wasi Gede 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见解和观点。最后，我想给你们俩一个机会向观众们分享一下你们将在哪里出版你们的研究。

⁴ 详情请见 BBC, “Indonesia: Thousands Protest Against ‘Omnibus Law’ on Jobs.” *BBC News*, Octo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5n8vt98j>; 以及 Lane, Max, “Protests Against the Omnibus Law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s Social Opposition.” *ISEAS/Perspective*, November 9, 2020, <https://tinyurl.com/mtk93f48>.

AA: 我们出版了关于在巴厘岛、苏拉威西和北苏门答腊三个地区的中国投资的研究。⁵ 坦白地说, 我们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失: 我们没有访问任何来自中国的工人。我们一开始打算邀请会说普通话的香港和马来西亚朋友跟我们一起进行实地研究、接触中国工人, 但是那很困难。因此,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跟中国工人取得联系, 了解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

RR: 谢谢, Al。你提出的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任何想要同时研究中国工人和印尼工人的情况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大挑战。Wasi Gede, 你有没有什么最后的感言呢?

WG: 2022 年, INKRISPENA 会出版一项最新研究, 其内容是采矿业为了避免给任何违法人权的做法负上刑责而采取的策略和反策略。⁶ 要是这项研究的结果能多加发展、帮助我们多了解中国工人, 我们将非常高兴。例如, 我们想知道中国的管理层利用怎样的策略减少中印工人的互动。从中国工人的角度的研究能填补我们研究的缺口, 补全故事的两面。

RR: 谢谢! 也感谢 Alina 一起主持今天的活动。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AK: 非常望感谢 Al 和 Wasi Gede 今天来到这里。你们作为扎根于茂物和雅加达的研究者, 跟当地的社会运动及工会保持紧密的关系。感谢你们分享真知灼见。

参考文献

Kuo, Lily, and Alicia Chen, “Chinese workers allege forced labor, abuses in Xi’s ‘Belt and Road’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21, <https://tinyurl.com/xuar8a7j>.

⁵ Swanvri, Alfian Al’Ayubbi Pelu, “Chinese Capital Footprint in Indonesia: A Dirty Energy and its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sia: A Labour Perspective*,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2020), <https://tinyurl.com/5yv9rwvm>.

⁶ Puraka, Y. Wasi Gede, “Mining for a Nickel and a Dime: How Worker Rights Are Undermined at IMIP” (Amsterdam/Jakarta, 2022), <https://tinyurl.com/ynshwy3z>.

Lane, Max, “Protests Against the Omnibus Law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s Social Opposition.” *ISEAS/Perspective*, November 9, 2020, <https://tinyurl.com/mtk93f48>.

Mulyanto, Randy, “Why Fears of Communism, Anti-China Sentiment Are a Potent Mix in Indones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 2020, <https://tinyurl.com/2u8pbt6w>.

Puraka, Y. Wasi Gede, “Mining for a Nickel and a Dime: How Worker Rights Are Undermined at IMIP” (Amsterdam/Jakarta, 2022), <https://tinyurl.com/ynshwy3z>.

Swanvri and Alfian Al’Ayubbi Pelu, “Chinese Capital Footprint in Indonesia: A Dirty Energy and its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sia: A Labour Perspective*, published by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2020), <https://tinyurl.com/5yv9rwvm>.

Tarahita, Dikanaya, and 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 “Understanding Indonesians’ Souring Sentiment Toward China.” *The Diplomat*, June 6, 2019, <https://tinyurl.com/3ez9a3nf>.

推荐资料

Anwar, Dewi Fortuna,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Coming Full Circl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9), 145–62.

Apditya, Muhammad Rushdi, Sutomo Pius, Ginting Risdianto, and Masri Anwar, *Fast and Furious for Future. The Dark Side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Components and Their Social and Ecological Impacts in Indonesia*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Dialogue Program Climate Justice, Manila, Philippines, 2021), <https://tinyurl.com/2c8sfp82>.

Dinata, Septa, Muhamad Ikhsan, Mary Silaban, and A. Khoirul Umam, “Mitigating Governance Risks from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The Outcome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Indonesia: Lessons from the Nickel Industry” (Washington, 2020), <https://tinyurl.com/y6e86svm>.

Lim, Guanle, and Hong Liu, “Soaring Garuda Meets Rising Drag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Indonesia,”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dited by Joseph Chinyong Liow, Hong Liu, and Gong Xue, 1–462 (Cheltenham,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21), <https://doi.org/10.4337/9781789908718>.

Sangadji, Arianto, Muh Fardan Ngoyo, and Pius Ginting, “Road to Ruin: Challeng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Nickel-Based Produc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Quezon City, 2019), <https://tinyurl.com/32c9erzd>.

Timmermann, Antonia, “The Dirty Road to Clean Energy: How China’s Electric Vehicle Boom Is Ravaging the Environment.” *Rest of World*, November 22, 2022, <https://restofworld.org/2022/indonesia-china-ev-nickel>.

Tritto, Angela, “Contentious Embeddedness: Chinese State Capital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Indonesia.” *Made in China 1* (2020), <https://tinyurl.com/ypen7k2s>.

Xu, Zhenhua, “For Chinese Workers in Indonesia, No Pay, No Passports, No Way Home.” *Sixth Tone*. January 9, 2022, <https://tinyurl.com/53wy7mk6>.

9

通往资本主义的共产之路：以中国为例

演讲者：Ralf Ruckus

主持人：王星¹

王星 (王)：大家好，欢迎来到工潮线上讲座系列的最后一期讲座。在最后一次活动中，邀请我们讲座的组织者之一 Ralf Ruckus 来跟我们进行对谈是再合适不过的。为了使这一系列的讲座顺利圆满地举行，Ralf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我想先介绍一下 Ralf 和他的演讲主题。Ralf 数十年来活跃于欧洲和亚洲的社会运动之中，并出版、翻译了很多关于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社会斗争的文章。我们俩相识于 2011 年，当时他参与中国和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好几年了。PM Press 将于 2021 年 7 月出版他的新书《通向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1949 年以来社会动荡与对动荡的回应如何推动中国的（革命）变革》。²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因为今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日，距离今天只有两个星期左右。

这本书从草根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Ralf 认为中国的历史虽然充满暗涌和裂痕，但有一样东西始终不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夺权之后，不断进行自我转化。从 1949 年到 1970 年代中期为其社会主义阶段，到 1990 年代中期为间断的或转化改革阶段，自此之后它一直维持在资本主义阶段。Ralf 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是由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扑（包括镇压、让步、合作、改革等手法）形成的。这个见解使得他的新

¹ 演讲时间：2021 年 6 月 12 日。在这个网址上可以看到英文录音：<https://nqch.org/2021/10/16/the-communist-road-to-capitalism-in-china>。本卷的文本经过编辑和缩短。

² 该书的中文 PDF 可在线获取：<https://www.gongchao.org/cn/tongxiang-zibenzhuyi-de-gongchanzhuyi-daolu/>

书非常重要。Ralf 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出现，并非是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或反对社会主义的结果。相反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恰恰源自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不宜迟，让我们欢迎 Ralf!

Ralf Ruckus (RR): 谢谢你的介绍。我将在演讲中提到你刚才谈到的三点，第一点是我在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分期；第二点是我总结的中国政治的模式：自下而上的抗争伴随着自上而下的反制；第三点是过去七十年间的政治、经济和父权社会系统发生的改变。谈完这三点之后，我会做出总结并提出几个问题。

我的新书旨在从政治角度介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辩论——特别是过去几年之间在左翼人士内部日益激化的辩论。我将之称为政治介入，是因为我的书一方面是对社会斗争、政治发展与经济危机的历史解读；另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地尝试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和父权压迫的社会的评估。

我要怎样才能理解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呢？我采用的方法是我刚提到的第一点，即使用特定的历史分期法。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七十年的历史，一方面能注意到众多的裂缝、危机与挣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重要的连续性：整整七十年内，只有一党执政。共产党不仅马上要迎来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也即将庆祝它在中国执政满七十多年。

政治左翼通常用三种不同的观点来定义过往和现今的中国的精粹。第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立场。第二个观点认为中国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你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所书写的一些文本和批评中找到这个论点，但稍后我会提到的一些新的论点也这样认为。第三个观点认为中国既是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在前三十年执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政权是社会主义的；但自 1970 年代改革之后，便转向了资本主义。

我本人的看法，是第三种观点的某种变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存在裂痕和转变，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有两个过渡时期：第一个过渡时期是从1949年建国到1955/56年提出计划经济的方案；第二个过渡阶段始于19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直至1990年代中期彻底转型成资本主义。因此，对我而言，总共有四个阶段或时期：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时期。我的书深入探讨了这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占一章，每章细分为多个小节。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研究和书写本书时所得出的核心观察。在这三个主要时期——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资本主义——中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各种自下而上的抗争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自上而下的反制。这个模式总结如下：每段时期都始于大型社会动荡，工人、农民或学生运动导致政权的反制。反制手法融合压迫和让步，前者是主要的手法，后者亦被重复使用。与此同时，政府笼络反抗者，并试图缓和抗争中提出的问题。抗争过后会迎来更大型的改革，这些反制和改革反过来引发另一次抗争，反制和改革随之而来。在每段时期——社会主义、过渡、资本主义时期——我都指出两个抗争和反制的循环。由于需要的时间太长，今天我不会讲解全部三个时期。我会以社会主义时期为例，向大家介绍我的观点。自计划经济建立以来，在195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第一波劳工抗争和针对政权的批评：在1956、57年发生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一开始，中国政府表示让步；但随后进行了高压镇压，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发生。在1958年，中国政府开展了大型改革运动大跃进，这场运动在各个方面都失败了。之后出现另一场改革，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加剧。

第二波主要抗争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表现形式为某个特定群体的劳工抗争和反抗运动的抗争。同样的，中国政府最初以让步作为回应，部分抗争运动领袖被招安，进入党领导层。随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针对《经济主义》和抗争运动的高度镇压，甚至出动了军队。之后，在1970年代早期出现新的改革，并尝试进行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初失

败了。在周恩来和毛泽东这两位主要领导去世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结束。同年发生了针对所谓四人帮的政变。

下一个时期——即过渡时期——和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后一段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都以一波大型斗争开始。这段时期以 1970 年代中段到末期的劳工抗争和所谓的民主运动拉开序幕。

以上是对这些时期的简要总结。在书中，我详细地按照时间先后分析了这四段时期。

在我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轨迹是由自下而上的抗争和自上而下的反制所推动的。很显然，这个模式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一切发展。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亦涵盖了其他几个主要因素，例如中国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系统中不断改变的状态和角色，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亦探讨了新社会主义领导阶层的建立和转变，以及每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派系和冲突。

接下来，我的第三个论点是抗争和反制的模式形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轴。除此之外，我还探讨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父权系统的变化，由于稍后我会详细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我只想稍微说如下几点：首先，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政治系统。国家制度被引进到中国，不断经历发展，与时俱进。中国的威权政府依靠自己的与时俱进，挺过了所有的震荡和改变。

第二，经济系统在 1950 年代初历经大型改变，包括土地改革、土地集体所有制、工业国有化、以及计划经济的实施等。然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系统的建立跟巩固，新式的不平等和阶级分野浮出水面，不仅成为了随后不断发生的抗争的肥沃土壤，更为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市场化和向资本主义的转型铺路。

第三，自 1949 年解放后，父权系统亦产生了变化，中国女性*的法定地位得到了巩固，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挣取工资。但是，情况很快就明朗起来：女性*权益的进步是有限的。例如，在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工作小组中，女性*仍然遭到系统性歧视，并须负担大部分的再生产劳动，时至今日亦如是。

在转型和资本主义时期，女性*面临新的打击，例如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在城市中的工厂和服务业中工作的女性农民工面临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分工。在每一段时期，女性*和女权运动都极力反抗针对女性*的压迫，为此也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后果。最近的一次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推出的反动的性别政策与对女权运动的打压。

总而言之，我的新书对中国的发展做了一个精简的历史叙述，我特别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下，工人、农民、农民工跟女性*的挣扎。在全书最后，我探讨了几个问题，我想在这里讨论其中两点。第一点是：我们能否想象中国会发生根本的、革命性的转变？不少人听到这个问题可能会笑着说：《当然不可能！》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当前的社会运动和左翼组织状况确实面临重大困难。但是，我认为中国政权并不如它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稳定。再者，相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较为稳定的时期，现在的全球危机和动荡为自下而上的运动创造了可能性。此外，左翼人士往往预想不到新一轮的社会动荡会在何时发生。1960年代中期和2000年代后期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在结论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等待新一轮抗争或革命发生的期间，我们该做些什么？很显然，我们应该仔细分析现状，并积极支持中国及全球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左翼力量的集结。我们不少人已经这样做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时间，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从先前的抗争和革命中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左翼战略，以免重蹈覆辙。这个策略不只应该考虑过往经验的不足，例如阶级划分、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及环境破坏，以上种种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都很猖獗。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全球各地发生的、试图解决上述问题的社会运动。我们应该试着在全球范围内结成联盟、一起行动，建立草根民主运动模式，并且试着同时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国家压迫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歧视。

我希望我的新书能充实关于左翼实践和策略的讨论，并希望这些策略能推动新一轮抗争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争相涌现。

我更希望这一轮抗争能够达到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所抱持的、但后来放弃了的革命大计。

王: 非常感谢 Ralf 为我们精简地讲述了他的论点并介绍了他的新书, 也感谢他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如你所述, 这本书本质上起到了政治介入的作用。记得很久以前你跟我说过, 你主动选择了投身政治活动, 而非进入学术界工作。因此, 我想问你: 你个人的政治背景和轨迹、兴趣和关怀, 如何塑造了这本书以及你所写的其他文本?

RR: 你问到为何我选择不在于学术界工作, 首先我必须提到我在 1980 年代读大学, 并在 1980 年代初开始参与激进社会运动。在我们圈子里, 进入学术界工作是非常不被认可的。当时我们觉得没有理由这样做, 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在搞革命, 主要的目的是达成我们的政治计划, 而不是进入大学教学。某种程度上, 我算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在年轻时经历了这场激进动员, 这个经历塑造了我的人生, 也塑造了我身边的人的人生。我当时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进入学术界。当然, 这情况后来有所改变。

有如下几个原因改变了我的想法和行动。首先, 1960 和 1970 年代开始的辩论。当时仍存在着革命的希望, 革命的可能性广受讨论。这包括针对国家的批判, 也有针对马列主义思潮的批评, 更有针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对于我早期身处的政治圈子而言, 针对后者的批评是全新的角度。当时很多人对亚文化活动产生兴趣, 有人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对其进行批判。当时我深受全球视角的影响。这个视角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并在我们把贝弗里·西尔弗的书《劳工的力量》翻译成德文时加剧,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全球系统方法论的《最为工人》的部分。³ 同时, 自 1980 年代起, 我深受女性主义辩论的影响。

我还想提到另外一件事。我在西德成长, 但和东德以及波兰的激进左翼团体有联系, 它们深深影响了我。我在中国的经

³ 见 Silver, Beverly,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历和教训也是如此。这些经历教会了我实际生活在社会主义政权底下是怎样的感受，工人、女性*、左翼行动者或组织者以及一般人有怎样的经历。

王：你讲到我曾住在东德和波兰，现在也参与波兰劳工运动的团结工作。你如何把你在德国、波兰以及中国所从事的运动串联在一起？

RR：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一般靠临场发挥、随机应变来融合不同的运动。在 2000 年代初开始参与对中国的研究和行动之前，我曾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我从不同的左翼团体、观点、概念与策略中学习。

我尝试打破很多左翼行动者所建立的鸿沟，即《为了挣钱跟生存所做的工作》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分野。因此，我在建筑工地、电话服务中心以及工厂里打过工。我以政治团体的身份介入这些工作场所，与工人建立联系、尝试与工人组织讨论和抗争，并从工人身上学习。这种做法源自意大利文的 *conricerca*，通常翻译成《工人调查》或《合作研究》。我不会在中国这样做，我虽然希望做无产阶级的工作，但身为白人、身为外国人，我在中国很难用这个方法。因此，我必须改变策略，专注进行与工人和行动者的访谈和辩论。那些在地的行动者在做我想做的工作：例如在工厂里工作并与工人交谈。我也专注翻译书籍、口述故事以及其他由中国工人、同志、左翼行动者和学者所撰写的文本。这包括了关于富士康工厂环境的书、关于在服务全球市场的工厂里工作的打工妹的书等。⁴

除了中国的行动，在过去几年间，我在波兰、德国、法国等国参与支持亚马逊工人发起的运动，并将跨国的抗争合并起来。⁵

王：为何你选择在现在这一时刻书写并出版这本书？相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史的经典文本的、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

⁴ Ralf Ruckus 翻译和出版的书籍的清单请见本文最后的附录。

⁵ 有关该议题的早期报告，请参见 Ralf Ruckus 的文章“Confronting Amazon”（对抗亚马逊），*Jacobin*, 2016 年 3 月 31 日：<https://tinyurl.com/3d48t8zf>。若想进一步了解亚马逊员工如何进行跨国组织，请浏览 <https://amworkers.wordpress.com>。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你的书有什么不同？

RR: 迈斯纳的著作、杰奎琳·希恩的《中国工人：新历史》，以及我认为较近期的重要出版物如安舟的《权利的剥夺：中国工业公民权的兴衰》都是很有趣的书。⁶我并不认为我的书在和这些文本竞争，反而是担当着政治介入的角色。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借着此书与来自大中华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讨论我们该如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分的左翼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如何抗衡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感到困惑。对于针对女权和劳工行动者的打压应该如何理解？我的书提供了不一样的观点和角度。

我并不是为了中国研究的专家而写这本书的，而是为了那些难以取得我所用的资料、难以参与讨论的人所写的。这些人希望从参与这些辩论并拥有左翼观点的人那里知道，中国过去七十年发生了什么事。

王: 我想谈一下你的书中提到的历史分期的问题。你观察到了四个时期，能解释一下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吗？这个历史分期只适用于中国吗？能否在其他背景或国家中找到类似的《抗争、反制、改革》的模式？

RR: 最初，当我开始阅读和书写时，我并没有一个严谨的划分时代的方法。我只是希望理解某个特定时期的抗争和政府的反应。我的书中有一个表格显示了不同时期的抗争和反制之间的动态关系，那是在我写成大部分章节后才制作出来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能否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类似的模式。我想是可以的，但我并不认为未来必然会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件时，我们通常觉得我们可以找出一套逻辑跟模式来总结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一直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下去。也许会，也许不会。我提出的模

⁶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Sheehan, Jackie,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Andreas, Joel,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式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为未来更好地做好准备，但也许不会。

王: 这个历史分期法的其中一个方面与战争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西欧和北美新自由主义时期不谋而合。你在多大程度认为中国的这个抗争、反制的模式是全球历史的一部分？

RR: 中国之外的政治发展大大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发展，例如 1950 年代苏联的支援等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以及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殖民辩论和抗争也反映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反映在文化大革命的反抗团体中。有趣的是，阿里夫·德里克曾说，1968 年发生在很多国家的运动对中国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对全球很多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⁷

当然，198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初社会主义世界陷落，除了上星期我们在与 Isabella Weber 的活动中讨论到的休克疗法外，也对中国的改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者，我认为，中国转型成资本主义并非中国领导层经过深思熟虑后产生的计划。那是一个渐进且缓慢的改变，而且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正巧发展到了全球北方国家寻找新的劳工资源的阶段，才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全球北方国家首先进入了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随后进入中国农村挖掘劳动力。在 1990 年代，中国共产党自愿提供劳工任人剥削。这些农民工成为最大的工人阶级，靠着他们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工厂》、实现中国《崛起》。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唇齿相连的。

王: 在书中，你指出 1949 至 1950 年代中期是社会主义建立时期，而 195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然后，你介绍了左翼对这段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形容：他们将之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其他形式的

⁷ Dirlik, Arif, "The Third World," in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edited by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Detlef Jun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3.

资本主义。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社会主义》来形容这个时期，而非《国家社会主义》或其他词汇吗？

RR: 使用某个词汇来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这个决定是很实际的。最近，Karl Gerth 出版了一本探讨中国早期的商品市场和消费的书，他坚持认为那时中国已经步入资本主义。⁸ 这是很有趣的一本书，但我不同意他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有必要刻画出中国在 1950 年代发展出并延续了约二十年的那个特定时期跟后来的中国的差异。

我希望鼓励大家不要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理解为单数，而应将其视为复数：世上有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例如，Tobias ten Brink 就是这样形容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的。⁹ 因此我认为，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它在众多方面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但我仍然承认，即使在特定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中，仍有资本主义的方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轻易地就从社会主义时期转型进入了我所称的资本主义时期。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至 1990 年代甚至更后期，仍然不同于我们在美国等地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有很多人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模式比较，指出两者的分别。同样，我们也应比较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例如德国模式、波兰模式、美国模式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我们应该谈论各种模式之间的差异。

当我们谈到工人阶级的角色以及工人阶级如何看待中国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 195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底中期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有不只一个工人阶级，而是无数分裂的工人阶级。虽然我喜欢安舟最新出版的著作《权利的剥夺》，但我想指出安舟只探讨了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所面对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群工人处于优

⁸ Gerth, Karl,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⁹ ten Brink, Tobias, *Chinas Kapitalismus: Entstehung, Verlauf, Paradoxien* (Frankfurt: Campus, 2013).

势地位。虽然他们隶属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但他们其实是非常少数的一群人，大约八成的中国工人仍然生活在农村。即便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工人，也未必都享受到了所有福利。中国并没有单一的城市工人阶级，而是多个不同的工人阶级或复杂的阶级构成。

我们也必须了解到什么人参与到了 1950、1960、1970 年代的那些抗争之中，哪些人能从维持社会主义结构中获益，而哪些人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结构的维系而受损。某些拥有特权的工人希望维持他们现在的工作条件、职位跟福利等。其他工人从未得到过那些在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所拥有的地位，因此他们倾向改革，对改变抱持希望。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部分农民阶级中。

王: 在 1990 年代中国转型到资本主义时，有一些激进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反对私有化、下岗和关闭工厂。我想问，你对于工人阶级对 1980 和 1990 年代的转型的回应有什么看法？现在的中国人如何回忆那段历史转折时期？

RR: 我们必须考虑到，即便现在三十多岁的人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洗礼。在德国、波兰或其他东欧国家也是如此。年过半百的人记得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并有他们各自的立场。他们也许怀念社会主义，也许对社会主义充满愤怒，认为曾经的制度剥削人民、是威权主义。

1990 至 2000 年代的中国见证着毛左的倾向和组织的崛起。从那时起，有很多毛左人士强烈批判市场改革，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变得资本主义甚至右翼。最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必须更小心，因为中国政权越来越打击左翼团体。人们重新发掘或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下的某种形式，这个情况是很重要的。

在 2010 年左右，毛左群体中出现了世代交接。在此之前，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辩论被参与过文革造反的人主导。他们也曾参与 1980 年代晚期的抗争，并曾在 1990 年代晚期的国有企业中工作。

在 2010 年代左右，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新一代的年轻行动者取代上一辈的行动者。这群年轻人的分析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农民工阶级的崛起。2010 年是农民工抗争的高潮。年轻的行动者开始进入工厂工作，以求更深入地融入到这些抗争中。我曾跟这些年轻人多次辩论我们彼此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我看来，他们的角度往往很扭曲，因为他们崇拜毛泽东和文革中的红卫兵，也对社会主义的特性有着扭曲的理解。

王: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一条问题的第二部分关乎另一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毛左倾向的人一直对重新评估毛时代很感兴趣。你认为他们有带来什么积极成果吗？还是说，他们仍然属于边缘现象，只有一小群支持毛左的学生、行动者或知识分子？

RR: 在中国很难组织这种包含很多人在内的政治讨论，也由于中国政府针对这种政治活动的打压，毛左人士难以发展新的参与者。因此很难说。我的经验是，当你和中国的工人、年轻人、或学生谈话时，他们很多人意识到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从经济问题、政治打压、性别政治、到国家试图告诉女性*该如何生活等问题，人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这不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宁愿批判工作单位的顶头上司或当地政府。

在中国左翼行动者之中，毛左是一个主流的政治传统。一百年以前非常重要的左翼传统，例如无政府主义、托派主义等也存在，也有来自 1960 年代其他国家的运动所带来的影响等。但就文本、思想来源，或其他较年长的同志的支持而言，毛泽东思想是最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其他政治背景、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塑造社会主义的特定形式有保留意见的人来说，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欢迎辩论，并鼓励其他人研究、反思毛泽东思想，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以外的激进或不那么激进的左翼圈子里，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并基于各种原因支持中国政权。我跟这些中国的年轻、草根毛左人士在批判中国政权的资本主义倾向上，有很多共同点。然而，我们在民族主义倾向和父权主义

及其他重要议题的讨论上可能很难找到共同点。但是，我们都认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

王: 让我们讨论一下中国的最后一个阶段（从 1990 年代中期至今），你在书中形容这段时期为资本主义时期。是什么原因驱使你使用这个名称？

RR: 我翻译成德文的第一本中文书是潘毅和黎婉薇在 2006 年编辑、出版的《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这本书收录了很多口述历史。潘毅和黎婉薇访谈了几十名女性农民工，听她们诉说自己的经历。一名年轻的农民工说：《初中时，我们读马克思主义。老师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谈到对工人的不人道剥削。当时，我们不明白。然后我来到深圳工作，自此，我开始明白资本主义如何压迫和剥削工人。》

10

当我们形容中国当前的环境时，我们应该主要考虑这些工人、女性*和其他群体的经验、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农民工的工时非常长。他/她们面对剥削，等级森严的劳工系统，和以性别划分的不公平的分工情况。这些是当你采访她们时，她们的回答。这些内容也记录在她们的故事中。

这本书在 2000 年代中期出版，自此之后，我从未怀疑过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系统。虽然我这样说，但我们仍要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形式和资本阶级的形式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形式的。这体现在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主导角色：中国政府干预经济，控制大部分金融业和货币，并不全面对全球经济市场开放。也许它在未来会开放，但现在仍然封闭。此外，近年我们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操控部分私有资产阶级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制度并非资本主义制度。对我而言，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至少这肯定不是承诺带着我们步入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的那种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系统，不论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也不例外，这些

¹⁰ Pun Ngai, Li Wanwei, *dagongmei: Arbeiterinnen aus Chinas Weltmarktfabriken erzähl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Ralf Ruckus (Berlin/Hamburg: Assoziation A, 2008), p. 149.

地方都必须克服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造了很多苦难，为工人、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人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克服资本主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开倒车、回过头来仰赖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模式。我们需要不同的形式来让人民当家作主。据我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工人国家或工人社会，而是被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层所控制的社会。

和来自中国的左翼行动者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从无异议。我从未遇过任何想回到中国过去的人。我们大家都认可社会主义的未来必定要有某种形式的草根民主系统，由草根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

王: 你说到尽管面临这一切改变和动荡，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当权。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是依靠着怎样的方法，才能与时俱进、在过去七十年间保持地位，并经历建党百年的？

RR: 首先，在很多历史的拐点上，事情都有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多次面对执政终结的威胁，尤其在文革和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假如当时人民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要是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军队没有被两度动员来拯救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很不一样。取决于党内哪个派系当权，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很有可能会走往不同的方向。

我认为你谈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在某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确实发展出了一套方法来重新建构自己、精进自己的策略，以《从练习中学习》。依靠这种方法，中国共产党存活了下来。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灵活性，跟它内部的贪腐和任人唯亲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办法回应挑战。如前所述，他们利用全球资本发展的历史机会，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今天全球经济的动荡中获利。

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依旧灵活、或将来会否继续保持灵活。中国共产党在过往几年习近平的统治下，变得更加威权主义和中央集权，这说明事情产生了变化，也许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灵活应变的能力。党内派系纷争也许为施行不同策略创造了机会，决定哪个派系更能面对当前的挑战。中国经济也

出现了危机，像是泡沫一样，充满不平衡和依赖性。最后，但也重要的一点是，各个工人阶级都对中国的现状满腹怨气。他们期待生活有所改善，但事与愿违，他们至今仍然在等待。

王:如你在书中提到的一样，中国确实有走向不同方向的可能性。但没有改变的一点，就是对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尽管我相信党内真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你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坚持追随马克思主义？

RR: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好：中国共产党确实很重视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承认1950到1960年代所发展出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将马列主义视为阶级斗争之上的。当时的中国对这思想的解读需要我们的批判性反思。

在1980年代发生了重大改变，当时中国政府放弃了部分政治概念。他们改为信仰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虽然他们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概念，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某种科学，可以利用它来领导经济和社会。

我曾从一位香港的左翼同志那里听来一个好笑的故事。他的一名左翼友人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其中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内地学者跟他的友人说：《我听说在西方，人们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不是很落后吗？我们早就不这样做了。》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中国领导利用马克思、庆祝他的诞辰，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大部分左翼——包括中国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部分左翼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所写的文本和行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

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谬，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现象！这些人有私心，利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经济进行管理。

王:在欧洲的语境里面，当欧洲左翼人士想到中国时，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的困惑？

RR:让我们看看过往二十年的改变。当我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我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以外的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有社会抗争。很多人认为中国工人全都很顺从，并用带有

性别歧视的观念把中国工人想象为《娇小的中国女工在工厂里听话地劳动，完全不抵抗》。当时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向这些人指出中国的罢工数量远超世界其他地方，中国工人有漫长的抵抗、起义、削弱当权阶级力量的传统。那是 2000 年代一场重要的讨论。

今天，冲突无处不在。世界经历了那么多转变，中国崛起了，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竞争对手，甚至争取成为世界霸权的竞争对手。我们可以看见左翼有批判和攻击美国帝国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批判当然有理，但他们却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跟美国不一样。这让我想起 1980 年代及以前的辩论，也是这样看待苏联和东方集团。有些人支持苏联，因为他们认为苏联是抗衡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却无视苏联内部底层的抗争、左翼抗议、争取自由的抗争、抗议剥削争取改善的抗争。苏联政权到处打压这些抗争，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样。

对我，对你，对其他人而言，这种批判美国、赞美中国的现象让我们感到疏离跟隔阂。我该如何向我们在中国抗争的同志交代呢？难道我要跟他/她们说：《你不会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左翼的支持，因为抗衡美国帝国主义比较重要》？这毫无道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专注，从草根的观点看待工人、女性*和女权、和环保主义者等其他社会运动的抗争。我们必须想象跨越国界跟政治背景的联合，也必须想象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及由此带来的革命性转变。

王: 对于想要支持中国的社会运动和草根行动的行动者们来说，他们可以从你的研究——即从草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RR: 第一点是质疑关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和时事的主流观点。这包括广泛存在于左翼圈子内的、忽略资本主义剥削或父权压迫的人权讨论。

另一点就是，当我们仔细地回顾中国共产党当初的革命尝试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党派在成立的早期是怀抱着革命的愿景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政权以所

谓《单人制式》管理工作单位、企业，这是从苏联斯大林模式那里复制过来的。随后，中国引进了某种工人共治模式，但并不见效，也没有将生产的控制权转移到工人手上。

很显然的，沉溺在对《过去本该如何》或《未来应该怎样》的理想化的想象中毫无意义。我们必须专注于此时此刻的运动。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各地也一样。但十年前我们也经历了一轮的挣扎。在疫情以前，新一轮的全球抗争已然开始。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爆发，谁知道全球抗争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就让我们结合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分析和对近期经历的分析，让我们邀请中国的同志们带着他/她们的经验加入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全球视角设想革命性的变革。

参考文献

Andreas, Joel,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Dirlik, Arif, “The Third World,” in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edited by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5–317.

Gerth, Karl,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un Ngai, Li Wanwei, *dagongmei: Arbeiterinnen aus Chinas Weltmarktfabriken erzähl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Ralf Ruckus (Berlin/Hamburg: Assoziation A, 2008).

Ruckus, Ralf, *The Left in China. A Political Cartography* (London: Pluto Press, 2023), <https://www.gongchao.org/en/the-left-in-china>.

Ruckus, Ralf, 通向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1949 年以来社会动荡与对动荡的回应如何推动中国的（革命）变革（工潮，2023）<https://www.gongchao.org/cn/tongxiang-zibenzhuyi-de-gongchanzhuyi-daolu>; English: *The Communist Road to Capitalism. How Social Unrest and Containment Have Pushed China’s (R)evolution*

since 1949 (Oakland: PM Press, 2021), <https://www.gongchao.org/en/the-communist-road-to-capitalism>

Ruckus, Ralf, "Confronting Amazon." *Jacobin*, March 31, 2016, <https://tinyurl.com/3d48t8zf>.

Sheehan, Jackie,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Silver, Beverly,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en Brink, Tobias, *Chinas Kapitalismus: Entstehung, Verlauf, Paradoxien* (Frankfurt: Campus, 2013).

推荐资料

Hao Ren et al., *Streiks im Perlflossdelta. ArbeiterInnenwiderstand in Chinas Weltmarktfabrik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Ralf Ruckus (Vienna/Berlin: Mandelbaum, 2014), <https://www.gongchao.org/de/streiks-buch>; an English version was published as *China on Strik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工人主义及其批判：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三卷（工潮，2018），<https://www.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

Pun Ngai, Lu Huilin, Guo Yuhua, and Shen Yuan (eds.), *iSlaves. Ausbeutung und Widerstand in Chinas Foxconn-Fabrik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Ralf Ruckus (Vienna/Berlin: Mandelbaum, 2013), <https://www.gongchao.org/de/islaves-buch>).

Pun Ngai, Ching Kwan Lee et al., *Aufbruch der zweiten Generation. Wanderarbeit, Gender und Klassenzusammensetzung in China* (Berlin/Hamburg: Assoziation A, 2010), <https://www.gongchao.org/de/aufbruch-buch>.

Unruhen in China. Supplement to the magazine *wildcat* #80, 2007, <https://www.gongchao.org/de/unruhen-heft>.

Wu Yiching, *Die andere Kulturrevolution. 1966–1969: Der Anfang vom Ende des chinesischen Sozialismu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Ralf Ruckus (Vienna/Berlin: Mandelbaum, 2019), <https://www.gongchao.org/de/die-andere-kulturrevolution>;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Zhang Lu, *Arbeitskämpfe in Chinas Autofabrik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Ralf Ruckus (Vienna/Berlin: Mandelbaum, 2018), <https://www.gongchao.org/>

[de/auto-buch](#);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后记：关于社会位置、代表象征和实际的团结行动

Ralf Ruckus、Jule Pfeffer、Daniel Reineke 和王星

这篇后记是编辑团队在 2021 和 2022 年经过了数次圆桌讨论之后的产物。我们反思自身在中国各种运动和草根行动中的角色，并分享我们对实际团结行动的想法和经验：我们谈到实际团结行动，对此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做出过怎样的行动，为什么？从本文集的文章中，我们又在关于跨国界团结的哪些方面有所学习收获？关于社会位置和代表象征的问题，又产生了怎样的挑战？我们对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清晰、确定的答案。与之相反，更多新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被发掘出来。因此，希望本书中的讨论能够在读者中得以继续延伸。

I. 关于社会位置、代表象征和翻译

王星 (王)：我们参与到中国的草根行动的起点各有不同，起因也各异，我们更是拥有不同的个人和政治背景。考虑到这些差异，就让我们以下面这个问题展开我们的对话吧：对于正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尤其是对于你感兴趣的议题和运动，你对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Daniel Reineke (DR)：除了身为大学学者以外，我认为在书写和组织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的讨论中，我首先是一名译者。这也是过往的一些翻译项目，比如关于农民工和富士康的书籍的翻译，又比如一汽-大众中国工厂临时工公开信的德语翻译，和这次线上讲座有交集的地方。¹它们都尝试为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观点开辟空间，否则这些观点可能因为语言障碍而

¹ 见：<https://www.gongchao.org/de/aufbruch-buch>; <https://www.gongchao.org/de/slaves-buch>; <https://tinyurl.com/whpuf4a>。

被忽略，或因为主流话语没有为其留有空间、而无法被听见。对我来说，翻译的实践，对于创造这样的空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儿的一部分人十五年前开始就参与到与这些议题相关的工作中。当时的话语环境跟如今非常不一样。如今由于地缘政治矛盾的升级，阶级关系往往被模糊。当时在讨论中国议题的公共论述中，对于边缘人群，比如农民工和女权行动者等，可以说有更多的空间。然而，这群人往往被描绘成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在血汗工厂中工作，生产中国制造的产品。我进行翻译工作的一个关键动力便是为了帮助呈现另一个角度——一个基于阶级的角度，将这群人放在论述的中心，同时揭示这个《受害者论述》既不正确，也对理解政治形势于事无补。

为了避免我们陷入家长式的立场，或者一个解释中国事务的局外人的位置中，维持、培养、扩大加深我们与中国的行动者的联系，非常重要。

Jule Pfeffer (JP): 我认为，参与到中国的议题和行动的时候，必须反思自身的位置。我是一名白人女性，有足够的特权到其他国家旅游、居住，并可以随时离开。因此，有时候，在发表对中国的看法时，我有所迟疑。我并不希望为人解难，或抢走别人的话语空间，更糟的是，以中国专家自居，或者以一个局外人的位置重复撰写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的书。和 Daniel 一样，我希望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让我们接触到别人和别人的经验。

我尝试传递比我更博学的女性的声音，传播她们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特别是让德国或欧洲的左翼人士听见。以此尽量敏感地处理围绕着我的政治结构。

Ralf Ruckus (RR): 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早期参与到德国的左翼政治之中。在七十年代，阶级观念森严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主流，它们尝试《教育》工人阶级。在八十年代，我们部分人批评这种手法，并主张《第一人称》政治。这种政治不让其他人代表你，你也不能代表他人。当你听说有冲突或抗争时，应首先接触参与其中的人，并问他/她们有何想法。你可

以告诉他/她们你的意见，但他/她们应有权力决定自己想做什么。

我在 2000 年代中以左翼行动者和时薪工人的身份进入中国，希望改变中国的状况，推翻剥削和歧视的情况。例如，当我与富士康的工人见面时，当时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乡村的女性农民工，她们并不把我看成是记者或学者，因为记者和学者往往只对写文章感兴趣。这些人和其他的农民工以及中国的左翼行动者一样，他/她们只会读说中文，并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出国。这些原因包括：缺乏资金、没有签证、家人的期望、无法辞职等。

因此，对我而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从中国工人和女性*的抗争和经验中能学会什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语言，更翻译出不同角度、想法、或盼望，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好好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十年时间从事翻译，最起码翻译工人、行动者、左翼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文宣、文章和书本，从中文或英文翻译到其他几种语言里。这些翻译大部分能在 gongchao.org 上找到。

DR: 王星，你如何看待你与中国草根行动的关系呢？翻译这个工作于你有何意义？

王: 我对中国劳工议题产生兴趣时，第一件从事的事也是翻译。当时我不在中国读书，但义务参与了中国劳工新闻翻译计划，将中国劳工的新闻和故事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我跟同伴们一起找出关于劳工情况和抗争的文章进行翻译，再加上我们对背景的解读和分析。

我必须指出，当时是 2000 年代晚期，关于中国工人的英文新闻和分析还很罕见。现在，全球对中国工人的情况越发感兴趣。当时，我们希望将这些故事带给全球读者，尤其是那些投身工会活动的人，也希望为研究劳工议题的学者和学生带来自信。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翻译由中国工人和行动者所写的文章。我们的翻译有很多读者以电邮的形式订阅，并有数名帮我们专职进行翻译的志工。他/她们中有一些人本身是经验丰富的行动者，或者在支持中国工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时移势易，现

在国际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此议题的文章和更全面的报道，我们的翻译工作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了。然而，我仍然进行双语双向翻译，有时候与他人合作。

2010 年左右，农民工在中国的劳工抗争爆发，产生了新一代学生和研究者，他们来自中国、研究中国，并以中英双语写作。在此之前，关于中国劳工议题的英文著作主要来自香港、澳洲、美国、英国的研究员书写。自 2010 年爆发劳工抗争之后，逐渐有更多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对劳工议题产生兴趣，为论述带来中国观点。也因为他/她们与此议题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更丰富。但是，他/她们也面对审查制度的掣肘。

当然，我们全都不是工人，也意识不到身为学生的我们与工人的经验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回想过去，我们当时过分将工人视为研究对象。这现象现在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起因来自中国工人自身发起罢工行动，激发我们所有人将工人的观点和经验置于我们研究的中心位置，而不再由我们代表工人说话。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尝试邀请工人和行动者在国内国外演讲，以改变他/她们被研究者代表的现象。但即便在疫情发生前，这仍然很难达成。

II. 重新思考实际团结行动

DR: 正如本文集中收录的数场座谈会和讨论的内容所示，中国现在面对着越发严苛的政府压迫。这对实行团结行动有何影响？团结工作面对什么潜在的危机？有什么过往成功的团结行动，在现在仍可能是可行的呢？

王: 我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因为当我们需要或有人号召国际间的团结时，我经常感到迷失，不知如何是好。有几件必做的事情，例如收集请愿签名、宣读声明、组织讲演、联系媒体。承认我们不一定能知道这些行动能否支持我们想支持的人，是很有帮助的。以前，我会问那些很有组织团结工作经验的人，这些行动是否有效。他们回答说，这些工作总归是有帮助的。但当我追问他们，这些工作到底能帮到些什么，我不一定能得到清晰的答案。我曾经感到气馁，但现在我开始理解这

些团结工作往往能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帮到忙，并且有时候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些行动带来的积极成果。

这些年来，我也意识到精神上的支持虽然不一定有实质的功用，但在某程度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支持有着深层的价值，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她们并没有被遗忘，仍有人积极地支持他/她们。必须承认的是，今天我们处于劣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也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尽量参与团结行动。我从别人身上学到，行动可以很有创意、多种多样。但是，要是不向自己坦白承认这些工作多么费劲才能建立力量，我们就只是机械式地进行工作，甚至在无法立刻见到成果时堕入绝望之中。

DR: 谢谢你的分享。到底某种团结行动是否有效，确实很难说。我在想的主要是，针对某些行动者的压迫或对罢工和大众抗议所作出的回应。例如，2015 年女权五姐妹遭到拘捕之后，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声明作为回应。类似的声明也出现在 2021 年打压送递员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很难知道这些声明是否有效，也很难知道什么类型的行动才有效、而什么样行动无效。

和这些个案相关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创造或维持沟通渠道。关于压迫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受影响的人到底：（一）是否希望公开他/她们的个案？（二）是否喜欢公开他/她们个案的人；和（三）他/她们是否支持已经采取的团结行动的形式？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往往无法通过和受打压的人直接沟通来得到解答，而是需要依赖二手资讯，例如认识当事人的中间人或其亲密的朋友，依靠他/她们来往地传递讯息。我觉得那很难，特别是有些时候，中间人认为这些个案应该被公开，但其他人不同意。

JP: 我认同 Daniel 所说的。要弄清楚当事人希望向外公开哪些内容、又不希望公开哪些，找到界线是很重要的。有一次，在我们德国的政治组织中，我们与另外一个组织合作。我们的组织中有来自东亚背景的人，而另一个组织希望这些人能出来谈谈德国的反华种族歧视现象。但那并非我们的主要工作议题，因此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能推荐一些更有能力谈论这个议题的组织。那个组织给我们的印象是想要一个东亚面孔作为门面，来

谈论种族主义。谨慎仔细地沟通、不简化事情，不利用别人提出某些声明或议题，这是很重要的。

只为了作门面功夫、而不顾别人意愿，把别人推到台上，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我们身在德国的左翼，仍有需要让有色人种进入讨论之中，让台上出现更多女性、更多非顺性别，即更多 FLINTA 人士。²要是他们/她愿意的话，应让他/她们多多分享意见和经验。我认为目前我们所做的仍然不足。

RR：多年前，我在德里做了一场关于中国工人情况的演讲。我和来自印度其他地区的农民工聊天，他们为一所位于德里的美国企业工作，当时正在进行罢工。我们谈到团结行动和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如何支持他们。他们说，要是他们在抗争或罢工，只要他们仍然拥有控制权，那么身在欧洲或美国的人就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必须是领导抗争的人，其他人只能支持。但要如果他们并没有在抗争，其他人却在做些什么来支持，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改变，工人不再处于主动领导的位置。

重点是，要是我们已经为在全球供应链中劳动并遭剥削的工人创造出连结的渠道，我们就能帮助传播他/她们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我们能帮助他/她们为自己争取。我们能帮助他/她们，让更多人看到他/她们的抗争。但要是我们没有任何连结，不尊重他/她们、试图代表他/她们，不听他/她们的故事，不让他/她们掌控运动，那就是家长式的做法，家长式的逻辑是：来自欧洲的《好人》帮助其他地方的《悲惨的人》。

这里就延伸到了另一个论点。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团结这个词。你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行动，例如支持被囚禁的人士或被指控违法的人士等。在罢工的情况下，我们或许需要考虑当事人目前是在被媒体攻击还是被关在牢里，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做不同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例如，人们或许需要钱或律师或其他类型的物质支援。我想我们都同意，有能力的人应该组织起来提供这些支援。但一谈到政治支持，事情就复杂起来了。就像是德里的工人需要别人给在美国的母

² FLINTA 是一个常用的简称，代表非顺性别的男性，包含女性、女同性恋、间性人士、非二元性别者、跨性别人士、无性别人士。

公司施加一些政治压力，或如何组织团结抗争，例如当一些工人罢工、另一些工人也罢工以示支持。我有幸能在波兰的亚马逊亲眼目睹这种工人对工人的支援。在德国亚马逊货仓有工人发动罢工，于是波兰亚马逊货仓工作的工人也策动罢工。以抗争支援抗争是很罕见的。人们冒着失业的风险来表明他们同样支持在另一国家同一企业工作的工人。³

最后，我想对团结这个词提出另外一点分析。团结行动假设了你为其他人做一做什么。如果我们把对于一个犯人的支持称为《团结行动》，我没有意见。因为他们身在监狱，我们对此有所行动。但当我们谈到劳工抗争时，我们更应该称其为《协作》，甚至《集体抗争》。另外，其他的情况也可以这样说，例如针对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抗争。

DR: Jule 刚刚谈到象征代表的问题，如何提升反抗者的可见度是很重要的。说到关注赋权和提升可见度的实际团结行动，一些较为简单的事情，例如翻译女权主义者、工人和其他人的采访，也是很重要的。邀请这些人进行演讲和辩论，并提供相关的基础架构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一类的支援应该继续下去。这些形式的实际团结行动同样有助于建立互信，对于支援未来的抗争极其重要。建立连结，提升反抗者的可见度，把人们团聚起来——这些在目前这个罢工和运动的低潮时期尤其重要，因为这为这些行动建立基础，让我们自己和他人都能参与到团结行动之中。

除了支援抗争行动外，这些工作对于抗衡由于地缘政治而被不断炒作的反华论述也非常重要。这些论述通常不是基于与基层的工人和行动者的对话之上。建立这些连结也有助于介入现在出现的辩论之中，为底层的观点创造空间。

王: 我同意逮捕和罢工往往引发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团结形式，有时候，两者同时发生。我也喜欢你提出的建立长期支援和团结的架构这个观点。我认为这对于底层的劳工抗争而言

³ 关于这场团结罢工行动的简短报道，可见于有 Ralf Ruckus 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发表在 Jacobin 杂志的文章“Confronting Amazon”。这篇文章的链接如下：<https://tinyurl.com/3d48t8zf>。

尤其关键。做这些事情让我们更能够为将来的抗争升级做好准备。现在，我们处于中国工人抗争的一个周期终结的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认为首先应理解最近的这个周期，拉开一些距离，用批判的目光来审视。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以前做出的回应？当下一个周期的抗争出现时，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现在是反思的时刻，就让我们集体进行自我评估。最重要的是，耐心地建立，更新关系和网络。团结的建立是长期的计划。

底观中国

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

编 / 工潮, 柏林, 2023

<https://www.gongchao.org/cn/diguan-zhongguo>

工潮 [gʊŋ'tʃɑʊ]